

当代外语教育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主编 杨学前

(第七辑)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外语教育 . 7 / 杨学前主编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 2023.3

ISBN 978-7-119-13148-1

I . ①当… II . ①杨… III .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 ①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49966 号

出版策划: 王京强

责任编辑: 施化敏

当代外语教育 · 第七辑

主编: 杨学前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6179 (编辑部)

印 刷: 三河市悦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13148-1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外语教育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顾 问 （按姓氏音序排列）

申 丹（北京大学）

石 坚（四川大学）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清华大学）

编委会主任 熊沐清

编委会副主任 杨学前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章云（北京外国语大学）

封宗信（清华大学）

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

刘玉红（广西师范大学）

刘正光（湖南大学）

王俊菊（山东大学）

文 旭（西南大学）

闫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学前（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邓颖颖（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胡安江（四川外国语大学）

刘 锋（北京大学）

刘志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

温宾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熊沐清（四川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南京大学）

杨 毅（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主 编 杨学前

执行主编 邓颖颖

常务副主编 符长青

编辑部主任 孙 博

编 务 唐珍珍 黎 凝

地 址：海南省文昌市教育路 178 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邮政编码：571321

电子信箱：ddwyjy@hncfs.edu.cn; flvedu69@163.com

内容提要

《当代外语教育》是一部紧密追踪世界外语教育教学研究动态，全面反映中国外语教育和外语职业教育研究最新成果的学术性文集，其目的在于开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对话，推动和促进国内的外语教育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语教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目 录

名家特稿

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英语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姜淑芹（1）
---------------------------------	--------

专家笔谈

如何唤醒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	蒋 花（10）
---------------------	---------

外语教育研究

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国内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

回顾与展望 ·····	唐友军 马晓梅（15）
-------------	-------------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障碍

——以西部某普通高校为例 ·····	王建梅（26）
--------------------	---------

外语教学研究

文化学理论框架下的德语国情教学理论与实践·····	郭 祺（33）
---------------------------	---------

基于语料库方法的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及其教学研究·····	余 荃（41）
-------------------------------	---------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实证研究·····	申慧丽（50）
---------------------------------	---------

“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下专业英语综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贾秀丽（57）
----------------------------------	---------

语言研究

- 英语语调可视化研究综述····· 周晓凤 刘 畅 (63)
-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英语新闻语言研究综述····· 涂 洁 陈风华 (72)
- 基于俄语国家语料库(НКРЯ)对俄语前置词 *на* 的研究 ··· 李 丹 孙 锐 (82)

文学研究

- 生态批评的方法论反思····· 邹 艳 (91)
- 《柑橘与柠檬啊》的战争创伤与伦理反思····· 吕春巧 刘胡敏 (99)
- 《儿童时光》: 海尔曼的自传式书写····· 方 方 (107)

翻译研究

-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研究····· 刘 岩 王锦博 (115)
- 概念整合理论下《废都》中本源概念英译的认知过程研究·· 周慧敏 刘 彬 (127)

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

- 占语前缀 *pa-* 的来源研究 ····· 黄先民 (140)
- “西风东渐”: 欧化潮流影响下的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 ····· 朱炬宇 (153)
- 老挝革命爱情小说《夜宿深林》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 杨雅竹 (163)

书评与动态

- 翻译与技术的深度交融
- 《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述评 ····· 宋 杰 (170)

Contents

Language Training, Textu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Exploring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nglish Majors *JIANG Shuqin* (1)

How to Stimulate English Learning Enthusiasm of College Students *JIANG Hua* (10)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English Undergraduate Thesis

in the Context of New Age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TANG Youjun MA Xiaomei* (15)

Language Barr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 Taking a Regular University

in 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WANG Jianmei* (26)

German Cultural Lear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Studies: Pedag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GUO Qi* (33)

A Corpus-based Study on High-frequency Binary Lexical

Collocations in German and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YU Quan* (41)

An Empirical Study of Blended Teach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SHEN Huili* (50)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of Integrated

Courses for Professional English Based on the Trinity

Educational Concept *JIA Xiuli* (57)

The Review of English Intonation Visualization *ZHOU Xiaofeng LIU Chang* (63)

An Overview of English New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U Jie CHEN Fenghua* (72)

Research on Russian Prepositions <i>на</i> Based on the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НКРЯ)	LI Dan SUN Rui (82)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Eco-Criticism	ZOU Yan (91)
War-induced Trauma and Ethical Reflection in <i>Private Peaceful</i>	LV Chungqiao LIU Humin (99)
<i>The Children's Hour</i> :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Lillian Hellman	FANG Fang (107)
A Study on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Works of Southwest Minority Writers of China in Japan	LIU Yan WANG Shibo (115)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Indigenous Concepts in <i>Ruined City</i>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ZHOU Huimin LIU Bin (127)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Prefix <i>pa-</i> in Cham Language.....	HUANG Xianmin (140)
Vietnam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isation Movement	ZHU Juyu (153)
A Study 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Lao Revolutionary Love Story <i>Staying Overnight in the Forest</i>	YANG Yazhu (163)
Deep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A Review of <i>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i>	SONG Jie (170)

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英语专业 核心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姜淑芹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 要：英语专业是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学科。英语专业核心能力的提高应重点夯实语言基本功，培养思辨能力和基础科研能力，使学生未来能够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其需要的方向性技能。实践表明，以文学文本为阅读材料，对学生进行以文字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以文本为核心的思辨能力培养和以文献为核心的研究能力培养具有可操作性与实效性，值得推广。

关键词：文字；文本；文献；英语专业；核心能力

Language Training, Textual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Exploring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nglish Majors

JIANG Shuqin

Abstract: English is a discipline with both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func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e competences of English majors should focus on consolidating basic language skills,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so that students can develop the skills they need in specific practice in the future.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it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through reading literary tex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abili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exercise. This mode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language; text; literature review; English majors; core competencies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英语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以《英语短篇小说》为例”（编号：2132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姜淑芹，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翻译研究。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专业教育经过外语热和复合型人才发展的浪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学界很多专家如何其莘（2008）、胡文仲（2009）、戴伟栋（2018）、石琳霏（2020）等都曾撰文总结并反思外语人才培养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从2010年左右开始，外语专业尤其是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开始显现，如学生的语言能力差强人意，思辨能力较弱，创新精神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本科毕业生找工作难，英语专业开始成为就业的“红牌”专业。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曾在2018年提出拷问：“英语专业是不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发表文章，英语学界掀起了一场学科定位与发展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英语专业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展开。樊丽萍（2018）、蔡基刚（2019，2020）等认为英语专业应该强调工具性，以专门用途英语理论为指导继续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文旭（2018）、郭英剑（2019）和张旭春（2020）等强调必须回归英语专业的人文性，努力进行“全人”教育。语言类专业天生具有工具与人文双重属性，关于二者的争论几十年来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在近期“双一流”“新国标”和“新文科”等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争论显得尤其激烈。众多讨论主要都是理念层面的，但正如张剑教授（2020: 1）所指出的，“英语专业的改革和探索进入了新阶段，即实施阶段。应该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做出进一步努力，探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细节，深入课堂，改革具体的教学方法，培养思辨能力，宣传最佳实践，为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提出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本文试以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短篇小说》阅读课程为例，探索英语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课堂实操可行性路径。

1. 英语专业的核心能力

什么是英语专业的核心能力？从理论上讲，英语专业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观点得到了外语界大部分专家的认同。张绍杰（2019: 6）认为通过学术争鸣，我们对于外语学科的性质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即外语学科具有“基础性、人文性和跨学科性，人文性是外语学科的本质属性，语言、文学、文化是其基本内涵，但工具性不是外语学科的属性，只反映出外语学科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征。跨学科性体现在外语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基础性其实指的就是外语学科的工具性。在目前的时代语境下，掌握了外语这个工具，学生才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对小语种专业来说，实现工具性功能就已经能够满足当前的国家需求，而对于英语专业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人才培养的基本特点是博雅教育，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思辨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为跨学科学习和

工作提供可能性,这正是教学大纲里提倡的厚基础、宽口径的内涵。

传统的英语专业教学过分强调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学生的综合英语运用能力仍然很差,且严重缺乏专业知识和能力。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英语专业学生通常只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与丰富性方面欠缺很大,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的高级思维能力很弱,几乎完全不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往往还不太有文献检索的能力,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已经开始撰写学术论文。而实际上英语专业学生的心智在入学时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因为语言能力欠缺无法表达深奥的思想而使其思辨能力逐渐退化,反过来因为教学中研究性内容的缺席使其语言能力难以提升,形成恶性循环。黄源深(1998)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即传统的英语教学过分强调语言的孤立记忆与理解,忽略了综合思辨与逻辑训练,由于课程设置对学生的智力挑战度不足,阻碍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发展,造成了“思辨缺席症”。经过4年的学习语言水平没有达到质的飞跃,各种复合类的专业知识也都只是浮光掠影地学了一点,最后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

针对上述问题,孙有中(2017)、张剑(2020)等提出知识与技能协同发展的理念,提倡语言教学与知识教学的融合,努力实现从传统的语言教学到语言与知识协同发展的转变。目前在实践层面提高英语专业核心能力的探索主要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思辨性能力培养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语言技能与人文教育双壁合一体系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141分类卓越培养体系。北外比较重视传统的人文素养提升,上外比北外更加强调知识拓展,广外则在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体现新文科特色的跨学科课程。三大主流外语院校的改革充分体现了各校的特色,也体现了2020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根据张剑(2020)的统计,北外2007年的培养方案中技能型课程占76.4%,而2016年的课程设置中技能型课程仅19门,知识型课程达到60余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语专业以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但蔡基刚教授在实践层面提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他认为大部分高校根本不能开设出支撑英美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例如“中世纪文学、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乔叟研究、莎士比亚研究、欧洲语言和文学、悲剧研究、文学批评、现代主义与短篇小说、后殖民主义文学、美国文学、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等”(蔡基刚,2019:2),因此强调人文性的知识类课程都只是皮毛,系统的英语专业知识只能是空话。全国高校共有944个英语专业点,能达到北外师资和生源水平的院校凤毛麟角,大部分学校开设不了上述众多的方向性课程,学生的语言能力也很难理解这些专业方向性课程。

提高英语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突破点不在于增加方向性课程,高校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覆盖国家需要的各个领域的课程。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只有在实践岗位上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大学教育培养的是学生的基础核心能力和开阔的胸怀与视野,使学生掌握进入其他领域的敲门砖。郭英剑(2019: 18)认为英语专业的核心素养是能用外语去言说和写作,“反映我们的阅读与思考,体现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表达我们的真知灼见,展现我们的世界眼光,传播我们的人文情怀,既可以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也可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英语专业核心能力的提高应重点夯实语言基本功,培养思辨能力和基础科研能力,使学生未来能够在具体实践中发展其需要的方向性技能。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宏观的认识和理念落实到课堂。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拓展能力?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课程改革选择以《英语短篇小说选读》为突破口,探索出了“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的课堂教学模式。

2. 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模式课例实践

《英语短篇小说选读》课程是英语专业的经典课程之一。在顺应市场需求,增加实用型课程的大潮中,“无用”的文学类课程被大幅压缩,很多学校在大学三年级才开设少量的文学类课程,基本上也以文学史概论为主,缺少文本细读类课程。在回归英语专业人文性的大方向指导下,教学中应该大量阅读英文经典作品。文学能够陶冶情操,启迪人生,文学经典阅读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此外,文学课程还能够实现多维能力培养,因为文学语言是一国语言最精华的表现,阅读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一门语言的精髓,为学好其他专业和使用表达打好基础。同时,细读文学作品还能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即思辨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林斌(2019: 4)认为,文学阅读的功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上,文学‘功用’主要是通过文学阅读提高语言感知能力,增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在隐性层面上,‘功用’是指通过文学阅读提高学生情感修养水平,在文学阅读中贯彻于提炼人文精神”。她还指出,文学材料具有不同于语言学、英美文化、跨文化交际等其他类教学材料的文体特殊性,后者无需顾及表达形式而只聚焦于理解内容,而文学性需要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述和传达,语言形式本身也不容忽视。

换言之,在国标设定的英语专业五大方向内,最适宜培养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是英语文学类课程。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容易入门又兼具趣味性和思想性,非常适宜课堂操作。四川外国语大学在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早期在第六学期开设短篇小说阅读作为专业选修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文本分析与研究能力。因为学生接受度非常高,逐渐下调到第四学期,目前已在第一学期开设两年。通过经典短篇小说阅读训练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能力,以“文本”为核心的分析能力和以“文献”为中心的研究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1 以“文字”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

传统的语言教学对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分开进行培养。其中最核心的阅读课基本上是教师列出生词和重点词汇，然后通过例句讲解词意和用法，学生通过仿写例句进行练习。由于各门课分别使用不同的材料，互相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学生往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却只学到了一些分散的知识。使用经典短篇小说作为阅读材料可以综合训练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在给学生进行最基本的词汇讲解和练习之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体会文学语言的美。很多学生的词汇量其实非常大，但他们常常只是背诵词汇的汉语释义，并没有掌握词汇的正确使用方式，更不用说在具体的语境中选择合适的词汇。许多词汇书也提倡联想记忆法，提供词根词缀拓展、同义词反义词拓展等，但如果缺少语境支持，记忆和练习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文学故事情境性非常强，能够提供鲜活生动、富有创造性的语言运用实例，教师可以利用故事的情景为学生深入拓展词汇的准确性与美感。

以凯特·肖邦的经典短篇小说《一小时故事》的词汇教学为例，女主人公得知丈夫意外去世的消息后，一言不发地进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

There stood, facing the open window, a comfortable, roomy armchair. Into this she sank, pressed down by a physical exhaustion that haunted her body and seemed to reach into her soul.

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对上文中的 *sank* 一词进行深入地探讨，如作者为什么没有使用 *sit* 或者 *fell* 来替代。分析可知，*sink* 的基本含义是下沉，还可以指人由于心情沮丧或筋疲力尽而坐下 / 倒下的含义，在上述语境中的使用有很深刻的内涵。下文提到 *physical exhaustion* 且使用 *pressed* 这样表达强力的词，结合语境，学生很容易掌握 *sink* 的这层含义极其适合使用的情境，并且因为有故事情节作为背景，记忆也会比较长久。

理解 *sink* 一词在课文中的含义之后，教师进一步对词汇的拓展使用进行解读，如列举出常见的使用语境，引导学生练习 *sink* 在不同情景下的表达（如 *the ship sank*, *sinking ship*, *sink deeper*, *slowly sinking*, *sink in* 和 *heart sank*, *sinking heart*, *sink further*, *rapidly sinking*, *sink down* 等）。词汇拓展练习可以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口头练习，也可以组织小组讨论，还可以进行课后写作和翻译练习，组织方式灵活多样，使学生真正在学中做，在做中学。通过文学阅读不仅使学生能够理解鲜活生动的语言，还富有实践性，为学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提供丰富多样的实际案例，展现语言运用的诸多可能。

2.2 以“文本”为核心的思辨能力培养

著名的布鲁姆认知分类金字塔把人的认知能力分成 6 个层级，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上文提及的词汇讲解可以说完成了最基本的记忆和理

解，拓展练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应用，也就是传统的精读、口语、写作、翻译等课程达到的效果。那么如何超越初级认知，走向高级认知的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呢？在学生理解文本语言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带领学生学会细读文本。文本细读是文学阅读的核心，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引导学生寻找文本证据，归纳分析证据，最后形成观点，而这正是思辨力形成的过程。

继续以上文中分析的 sink 为例，教师可以继续引导学生挖掘，为什么主人公会疲惫到筋疲力尽？她是被什么 pressed 至此？仅仅是因为突然得知丈夫死亡的消息吗？那不应该是惊讶大于疲惫吗？带着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寻找文本中同类的表达。细读文本后可以看到后文中有 bend, impose 等同义词汇，可以初步总结出丈夫对女主人公的压制。但这一判断准确吗？有没有更多的文本细节来佐证？学生通过继续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描写女主人公独处时的景色非但毫无死亡气息，而是充满了春的生机与活力，如作者用到 new spring life, delicious breath of rain, a distant song, countless twittering sparrows, blue sky 等具有生命力的表达，而后还非常直白地用了“free, free, free!”这样的字眼，明确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丈夫死后感到的自由气息，印证了丈夫对妻子的压制。学生还可以从周围亲戚和朋友的视角看到作品中暗藏的压迫关系。例如，女主人公开头是没有名字的，直到她自己在房间里完成了自我觉醒后才出现了名字；主人公一开始是沉默的，有了名字之后开始勇敢地拒绝他人的帮助；建立起自我身份之后她跟周围人的空间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等。这便是在细节之间建立联系，即锻炼分析能力。

在本篇小说的教学方案中，教师还可设计多个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细节，包括情节发展、主题呈现、用词技巧、艺术烘托等各方面。问题以由前到后、由浅至深、由具体到宏观的方式呈现。

在课后练习环节，教师设计了3个板块：learning to understand the text（理解文本）、learning to analyze the text（分析文本）和 learning to make arguments（提出论点），其中，理解文本部分仍然是针对基础的文本细节，分析文本和提出论点部分则涉及高阶的认知能力。分析文本部分教师设计的问题为：Write down the main qualities of each character in the following chart. Use specific textual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claims.

通过文本证据形成对人物判断的练习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基础。学生会靠证据和事实说话，而不是凭个人感觉做出判断。在此基础上，进入评价和创造阶段的练习，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例如：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is story? For each theme, provide textual evidence as well as cultural evidence. Cultural evidence here mean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story's creation, as revealed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sources. 通过此项练习，学生开始走出文本，涉及作品的文化背景知识，进入到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第三点，即研究能力的培养。

2.3 以“文献”为核心的研究能力培养

英语专业学生普遍缺乏研究能力,对此教师们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过程中感受颇深。束定芳(2015: 5)指出,“英语专业的学生被认为是高校文科类专业中最不会写文章、做研究的人”。这也是长期以来只重视语言技能的训练带来的后果,甚至有些人认为英语专业本科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英语技能,学术研究是研究生阶段才需要做的事情。朱文娟(2013)的调查表明,造成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漏洞百出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普遍缺乏查阅和评价资料的能力,他们普遍不喜欢用英语写作,授课教师也很少布置学术写作任务。如前文所述,实际上英语专业学生的心智在入学时与其他专业学生一样,因为语言能力欠缺无法表达深奥的思想而使其思辨能力逐渐退化。用于语言技能教学的材料通常思维层次比较低,例如问路、购物、旅行等话题,阻碍了学生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发展。研究能力的培养与思辨能力的培养本质上是一体的,鼓励学生质疑、批判、发表独立见解就是在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性习惯。“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不仅可以为他们撰写毕业论文以及将来进行学术研究做准备,还可以全面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其一生的成功奠定基础”(鞠玉梅, 2021: 109)。

上文举例的短篇小说教学中组织学生分析文本细节,形成自己的观点虽然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但仅限于文本内的小范围分析。真正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打开学生的视野,形成与作品创作背景和其他研究者的对话。这就需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文献处理能力。文献处理能力包括文献检索能力和文献分类总结能力。在信息化极其发达的今天,学生掌握快速检索和分析文献的能力尤为重要,而英语专业很多学生到大四要撰写毕业论文才知道中国知网的存在,更不用说使用英文文献数据库。在短篇小说阅读课程中,教师在分析完文本内信息后,会组织学生阅读相关的背景材料,搜集关于该作品的现有研究,并且要求学生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总结分类,画出思维导图。以《一小时故事》为例,组织学生归纳总结了现有研究的四大方向,包括两性关系、生存主题、艺术特色和翻译策略,因内容过多,此处不一一列举细节。学生在搜集和阅读研究论文的过程中增加了阅读量,锻炼了分类整理文献的能力和用英文写作的能力。不仅如此,对比之后学生还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下一步提出创新思想打下基础。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根据教学时间和学生精力,可以只选取某个方面组织学生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或者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团队合作,培养协作研究的能力。

文学作品能够提供丰富的文化样例和思想观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和思考,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培养学生跨文化语言能力、文化情感能力和文化态度、跨文化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罗良功, 2021: 9)。以文字为核心的语言能力培养,以文本为核心

的思辨能力培养和以文献为核心的研究能力培养是密不可分、循序渐进的一体化核心能力培养模式。语言能力是基础,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核心。采用短篇小说为教学素材,能够使学生在有趣的故事中由被动的语言技能操练者和学科知识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科学研究者,带着学习兴趣和探究激情养成研究型的学习习惯,塑造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形成这些专业核心能力之后,学生再学习任何方向性的课程都会比较轻松,接受度和创新度都有所提高。

3. 结语

我国英语专业的定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外语人才培养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后来又经过了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2018年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已经进入回归人文本位的创新发展阶段,既要贯彻坚守人文本位又要体现跨学科特性的原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把语言技能和人文能力融合到一起,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文学课程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很好地提升英语专业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写作能力。文学还具有天然的跨学科优势,可以与科学、艺术、历史、经济、法律等各个学科相结合。通过文学课程对学生进行文字—文本—文献三位一体的核心能力培养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短篇小说阅读课程实践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随着学生能力的提高,教学内容可以逐渐拓展到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其他文本,进而扩展到文化、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商务、法律甚至是自然学科等方向性的内容,实现固本创新,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参考文献:

- [1] 蔡基刚. 外语教育政策的冲突: 复合型人才还是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1-6.
- [2] 蔡基刚. 高校英语专业定位的挑战与颠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专业教学指南》颁布思考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6).
- [3] 戴伟栋. 高校外语专业 40 年改革历程回顾与展望 [J]. 外国语, 2018(4): 101-105.
- [4] 樊丽萍. 大学英语缘何上了专业“红牌榜” [N]. 文汇报, 2018.
- [5] 郭英剑. 论外语专业的核心素养与未来走向 [J]. 中国外语, 2019(1): 15-19.
- [6] 何其莘. 近三十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回顾与展望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6): 427-432.
- [7] 胡文仲. 建国 60 年来我国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 [J]. 外语界, 2009(5): 10-17.
- [8] 黄源深. 思辨缺席症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8(7): 1-6.
- [9] 林斌. 文学阅读的专业内涵及教学策略——也谈外国文学教学的人文思想渗透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9(1): 1-8.

- [10] 罗良功. 新时代英语专业文学课程的多维能力指向 [J]. 外国语文研究, 2021(6): 6-13.
- [11] 鞠玉梅. 应对读写危机和思辨缺席: 加强英语专业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 [J]. 外语教学研究, 2021(6): 108-118.
- [12] 石琳霏, 姜亚军. 中国英语教育四十年反思及其对新文科背景下英语专业建设的启示 [J]. 外语教学, 2020(3): 61-66.
- [13] 孙有中. 人文英语教育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6): 859-870.
- [14] 束定芳. 高校英语专业“复兴”之三大路径 [J]. 中国外语, 2015(5): 4-8.
- [15] 文旭, 滕超. 英语专业“全人”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6): 38-40.
- [16] 张绍杰. 改革开放 40 年外语人才培养 [J]. 中国外语, 2019 (1): 4-10.
- [17] 张剑. 语言与知识的悖论: 如何培养英语专业高层次人才 [J]. 外国语文, 2020(5): 1-7.
- [18] 张旭春. 《国标》与《指南》框架下英语专业改革刍议 [J]. 外国语文, 2020(5): 8-13.
- [19] 朱文娟. 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问题及创新对策 [J]. 宁夏社会科学, 2013(5): 149-153.

如何唤醒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

蒋 花

(四川外国语大学 出国培训部, 重庆 400031)

谈及英语教学,每位英语老师都会有感而发、侃侃而谈。但今天,作为一个有近30年教龄的英语老师,我将探讨如何唤醒一位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和动机。一般而言,由于各自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在学校的学习氛围以及人生规划等因素,步入大学以后的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态度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3类:第一类学生学习动力很强;第二类学生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第三类学生由于受抖音、游戏等的诱惑,对英语已经失去兴趣了。整体而言,普通高校中由于生源和学习氛围等原因,后两类学生人数较多。一项对福建龙岩学院的调查研究显示:“非英语系在校大学生对英语的态度不够认真”^①。态度意味着学习动机,而大学生们英语学习动机减弱已是不争的事实。调查还显示,虽然他们“肯定了英语的实用价值,对英语的学习有一定的动机,但是常常由于对自身英语水平不够自信,长此以往陷入消极循环”^①。英语专业的学生同样存在着英语学习动机衰退的现象,“英语学习动机衰退现象不仅在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中广泛存在,也是英语专业大学生普遍面临且亟待解决的问题”^②。综上所述,大学生特别是普通高校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衰退已成为现实,严重制约着国家对外语人才的培养。

为何如此?在解释缘由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动机的含义。动机一词源自心理学,指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也指激发人的动机的心理过程。就学习而言,“学习动机是一种情感和认知的唤醒状态”^③。可见,对于英语学习而言,如何唤醒大学生的情感和认知状态尤为关键。造成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减弱的原因较多。一项以山东某地方性大学英语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影响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衰退的因素有以下7种:学生自信心因素、英语学习策略因素、对英语文化的态度因素、教师因素、教材因素、教学环境因素和同伴因素”^③。在这7种主要因素中,至少前5种和教师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另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导致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衰退的所有因素中有65.3%都与教师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因此教师在动机衰退问题的解决过

作者简介:蒋 花,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出国培训部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研究。

程中担任着不可替代的角色”^②。那么教师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教师的情感唤醒不可忽视，因为“学习动机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情感因素之一，在英语教育教学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具体来讲，对于学习动机弱且学得不太好或较差的学生来说，只要教师愿意利用课外几分钟走近学生，对其进行单独辅导或交流，或者只要教师愿意发现学生的优点并加以引导和表扬，则可以较好地解决此问题。

教师应特别关注差生。由于中国的大学老师基本没有固定的答疑时间，而且有些学生由于性格或面子等原因也不太愿意主动找老师解惑，特别是差生，几乎不会主动找老师讨论学习问题，造成的结果是：如果没人主动接触他们，和他们谈论学习问题，他们会越来越自我封闭，越来越不自信，学习英语的动机进而逐渐衰减，甚至开始讨厌英语。他们对英语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如只要能及格、能毕业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但是此时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自信心的衰退和对英语的厌恶，他们的成绩会越来越差，甚至对某些学生来说，及格都成困难，更别提毕业了。因此，如何扭转这种恶性循环是首要任务。

本人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幸几次亲身实践了“表扬或课外交流”的神奇之处。最近一次是在 2021 年 12 月，我在上课时不小心打翻了水杯，课桌和讲台撒满了水。正准备寻找纸张收拾课桌和讲台时，第一排的一个学生已经拿出一包纸，帮忙清理现场了。看到地上的水还没收拾，他又立刻冲到厕所去拿拖把帮我收拾讲台。我当时非常感动，也很意外，原因如下：第一，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这个班学生家境普遍较好，但毛病也很多，如学习动力不足，经常迟到、缺课、不完成作业。为此，任课老师头疼不已。第二，我完全没料到这位学生会挺身而出，因为他上课经常迟到，而且上课时经常请假去卫生间，作业也很少完成。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对该学生产生了某种偏见，所以教学只是尽责而已，情感上并没有太多投入。但该学生的举动立刻改变了我对这类学生的印象。于是，我当着全班表扬了该生：“xxx 同学很棒，人品高尚，绝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自此以后，不仅我对这位学生 and 这个班上的其他学生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位学生自己也在悄悄发生改变，或许他能感受到老师对他的欣赏。之后上课时他明显比以前认真，也开始完成作业了，每天坚持打卡记录他背了多少单词，甚至春节期间都在学习。后来他成绩有明显提高，平时参加雅思阅读模考，他的分数一般在 5 到 5.5 之间，可他在春节前参加雅思正式考试时，阅读提升到了 6.5 分，听力、口语和写作均在 5-5.5 分之间，进步很大。新学期开学后，他又参加了一次雅思正式考试，阅读考到了 7 分，听力、口语和写作都是 5.5 分，总分 6。他成绩提升很快，让人惊喜不已，也开始让我思考这背后隐含的意义和老师该如何对待像他这样的学生。他们这样的孩子，不同于正规本科生，由于家庭环境好，从未有过生活方面的压力，小时候父母比较溺爱，学习动力不足，或由于各种原

因，逐渐养成了一些毛病，比如迷恋打游戏、懒惰等，一般上了高中后成绩越来越不理想，高考失利后，家长只好安排他们先考雅思然后出国深造。更重要的是，据我观察和收集到的信息，这些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可能从初中开始，他们就很少得到老师或家长的肯定和表扬，被批评则是常态，因此他们非常希望有人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并肯定他们的长处。班上还有一位学生，英语基础很差，但我偶然发现他对历史很感兴趣，且掌握了不少历史知识，于是一有机会我就会在班上表扬他的历史水平。此后这位学生在课堂上表现非常好，从不缺课、旷课，而且参加雅思正式考试时的阅读成绩最好。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一个老师能充当伯乐，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并肯花时间来肯定和鼓励学生，他们一定会有所改变。他们在家长那里得不到认可和鼓励，但会在老师这里找到外部动力，这就是一个奇迹。作为英语教师，了解自己学生的特点并不吝表扬，学生的英语成绩提高将不再是难题。

以上案例针对的是计划外的英语差生，现在谈谈面向计划内英语专业学生的教学经验。作为正规大学生，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从小都是班上的佼佼者，一般来说受表扬较多。但进入大学后，由于手机、电脑不再被家长和老师的严格管理，很多同学思想开始放松，特别是一年级新生，容易被抖音、游戏等迷惑，对学习的热情逐渐消退；还有部分学生本来对学习不感兴趣，参加高考是无奈之举，上了大学后开始秉承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及格就行；还有的学生由于不喜欢所学的英语专业，又无法转到别的专业，因此对英语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还有的学生因为个人原因，如不喜欢某个老师的授课方式，或失恋等原因，暂时对学习失去兴趣。在这几类学生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由于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特别有主见，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看法很难改变。但对第三类和第四类学生，任课教师完全可以帮助他们重新燃起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大约 20 年前，我就遇到过一位属于第四类的学生。当时我担任他们班的精读课老师，这位学生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交上来的作文一塌糊涂，如果作文总分 15 分，他最多得 2 分。彼时他们班即将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我很为他担心，便想具体了解他的情况并帮助他。这位学生每次都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我没有贸然行动，而是首先向他的同桌了解情况。同桌说他对英语没兴趣，讨厌老师，喜欢自己在手机上玩游戏。了解情况后，每次课间休息，我都拿着他的作文，一个单词、一个句子地指出他的问题，开始几次他表现得很冷漠，但是我坚持一下课就去找他。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的作文有了进步，对老师的态度也有了好转。再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会对我笑了，作文也终于不再让我焦虑了，后来他还主动告诉我他不喜欢老师、不喜欢英语的原因。原来，小学时因为淘气被老师打过耳光，此后，他一直仇恨老师，从不愿意给老师好脸色。因为不喜欢老师，学习英语也没动力。该学生从排斥老师到对我敞开心扉，到燃起对英语的兴趣，期间大概有两

个月时间。之后，我坚持每次课间给他讲解英语，这位学生的英语成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并在那个学期以比较不错的成绩通过了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此外，该学生的性格也越来越外向，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四川省一所高校担任英语教师，口碑不错。每次想起该学生，我都很庆幸自己挽救了一个好孩子，也在反复思考英语教师的职责和教学方法。我认为在不断更新完善教学资料、提高专业素质、丰富教学方法、提高个人魅力的同时，老师对学生毫无保留的付出、特别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接纳和认可定会感染、打动学生。

笔者的一个学生偶然谈到大學上词汇课的情形，说一开始很不喜欢这门课，因为教授这门课的是位快退休的女老师，课堂比较枯燥。但是有次她和这位老师在课间闲聊时，老师帮她整理了眼前的碎发，让她以后觉得词汇课也不是那么枯燥了。可见，老师只要愿意在课间花几分钟和学生交流，大部分同学至少不会因为反感老师而厌恶一门课程。我还记得大学刚毕业留校时，被分配到化学系的一个班讲授英语课。当时本科生要求通过非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专科生要求过三级考试，因此每个英语老师面临的压力很大，担心教不好会影响学生的毕业。由于我刚刚留校，缺乏英语教学经验，但是会想尽办法让课堂有笑声，所以我在课上所举的例子几乎是学生们喜欢的。更重要的是，我那时年轻，只比学生大几岁，课后经常和他们打成一片。一年后，他们班的非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居然是当时全校所有班级通过率最高的班级。听到这个消息，开心之余，我也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历年来这个系的通过率都较低，一开始没有老师愿意接手这个班。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成功”，发现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课后时间，和学生们成了朋友，学生们因为喜欢老师，才对英语学习燃起了兴趣。相比其他经验丰富、学识涵养极佳的优秀老师，我除了年轻、热情、接地气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优势。

综上，我认为：大学英语老师唤醒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可能比使用任何教学手段都有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已是大学生，一般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很多时候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就能较好地掌握英语，因为英语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学好英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当学生对英语燃起了学习热情，英语就不再是障碍。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的学习会事半功倍，视野也会更开阔，知识结构更完善。第二，在上述基础上，如果学生认可了老师，或被老师打动了，或主动从情感上接受了英语，内动力会驱使他们主动学习。在唤醒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方面，我并不认为老师在课堂上大谈特谈英语的重要性就可以解决此问题，因为对英语不感兴趣的那部分学生就算接受老师的观点，行动上也比较困难，即使希望自己能学好，也没有太多情感参与。因此，我认为，唤醒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需要从情感入手，如果能让学生的情感参与其中，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课间主动走下讲台，帮助需要帮助的少数

同学，多发现学生的优点，不吝表扬。只要英语老师真心愿意接纳同学，全情投入教学，正常情况下同学们至少会被触动，这就意味着有情感参与。如果老师坚持下去，同学们的情感也会持久，奇迹也会慢慢发生。

注释：

- ① 沈一丹等：基于 ABC 模型的非英语系大学生英语态度研究 [J]. 海外英语，2021(16): 12-13.
- ② 刘静：英语专业大学生动机衰退现象研究 [J].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5): 96-99.
- ③ 李金媛：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衰退研究 [D].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1.

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国内英语本科毕业论文 质量研究：回顾与展望

唐友军^{1&2} 马晓梅¹

(1.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青岛滨海学院 文理基础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55)

摘 要: 在聚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新时代教育背景下,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专业教育的最后一个核心环节, 因此毕业论文质量成为研究重点。综合分析中国知网导出的最近 20 年 (截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 的 188 篇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文献, 结果表明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虽基础深厚, 涉及多种类型学校 (外语院校除外), 但文献分布比例失调, 实证研究居多, 综述研究以及引介性研究偏少, 缺乏理论基础, 教学反拨作用不明显, 缺少后验效度。进一步系统分析显示, 英语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不仅是本科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 更是一项涉及导师、写作课程指导教师、学生、目标论文、写作环境等要素的系统工程, 是指导教师为学生英语毕业论文写作“搭架子”的动态评价过程。基于系统动态干预教学的视角, 本文提出了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夯实理论基础, 构建评分量表, 提升后验效度, 切实全面构筑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关键词: 英语本科; 毕业论文写作; 评分量表; 系统动态干预教学; 质量监控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English Undergraduate Thesis in the Context of New Age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

TANG Youjun MA Xiaomei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ra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夯实理论基础 构建评分量表——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教学改革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18SD0108A)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语认知诊断测评模式构建及有效性论证”(项目编号: 17BYY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唐友军, 男,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青岛滨海学院文理基础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英语教育研究。

马晓梅, 女,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二语习得与语言教育研究。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sis writing is the last core link of 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 the quality of the thesi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188 English undergraduate thesis quality research documents exported from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in the last 20 years (as of September 23, 2019)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English undergraduate thesis quality research has a deep foundation and involves many types of schools (except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s), the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is disproportionate,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predominating and review research as well as cited research being rare, lack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teaching. Further systematic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graduate English thesis writing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but also a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instructors, writing course instructors, students, target thesis, writing environment, and other elements, and is a dynamic evaluation process in which instructors “build the framework” for students’ English thesis writ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and dynamic interven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building the rating scale, improving the posterior validity, and practically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English; thesis writing; rating scale; systemic dynamic intervention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0. 研究背景

我国已经步入到教育大国的新时期,也踏入了追求质量的新时代,重拾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性愈发举足轻重。根据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2015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监测和保证体系。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全文八次出现“振兴本科”。文件要求狠抓本科教学,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自2007年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本科教学,全面提升发挥本科基础教学作用意识,尤其是近两年,全国高校普遍关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得以彰显,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然而,在高等教育宏观环境越来越优化的背景下,作为微观环境的学术论文写作质量监控体系却显得相对滞后。最近几年,涉及论文学术诚信事件频发。这些事件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学术诚信,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我国论文质量监控体系构建依然任重而道远。博士、硕士属于高层次人才培养范畴,其毕业论文质量的监测尚需完善,那本科毕业论文又该如何呢?

我国本科毕业生数量庞大,导师数量有限,一个导师往往指导多个本科学

生,加上教师本人的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学生的毕业、就业、升学、考试等因素,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很难得到保障。同时,我国本科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被检测的概率非常低,主要以教育部新上本科院校教育教学质量检查以及本科教育教学合格评估抽查为主。英语本科专业属于大众专业,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该专业,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毕业论文需要用目标语进行撰写,英语既是学习目标语,又是学习的工具,其写作质量更难检测,更需要加强质量监控和研究。

1. 宏观评述

1.1 相关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及趋势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属于语言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体现本专业学生大学近4年的二语习得效果,一直受到广大英语教师以及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结合中国知网数据,从2000年至今近20年期间(截至2019年9月23日),相关的中文文献达到188篇,总体发文趋势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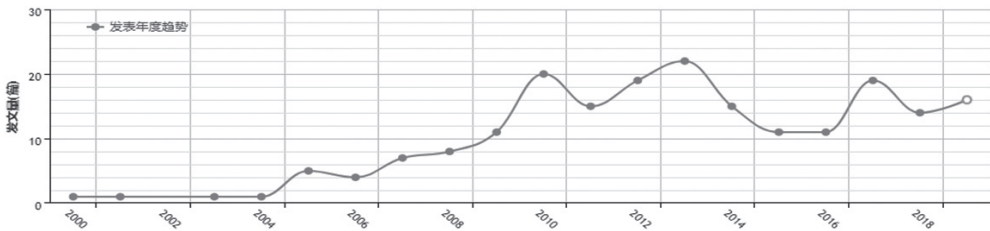


图1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研究文献年度趋势图

结合图1以及表1所示,在近20年期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至2014年增长迅猛,2013年达到顶峰,共22篇,2019年共计19篇。总体而言,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依然是研究热点,一方面说明发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表明老问题依然存在,缺乏后验效度。从研究主题来看,涉及的主题较多,研究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基础深厚,涉及不同的本科英语专业方向、学校类型、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1.2 文献研究类型分布

本研究将从中国知网导出的188篇相关文献就本科英语专业方向、涉及的学校类型、文献主题以及文献的研究方法共4个维度进行了分布分析。分析显示,国内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基础深厚,但存在比例失调、分布严重不均的现象。

1.2.1 英语专业方向

国内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研究涉及的文献共188篇,其中明确指

出研究专业方向的有:英语教育5篇(如:姜雪,2015等)、英语翻译2篇(如:许勉君,2013等)、商务英语7篇(如:曹赟,2019等)、英语文学方向5篇(如:韦哲、李昊宇,2017等),其余文献研究对象均为传统的英语本科专业,共169篇。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英语本科专业,这些文献基本能够代表目前我国英语专业本科论文写作质量的总体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文献分布特点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本科英语专业以及相关方向的毕业论文质量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2.2 学校类型

根据188篇文献的题目统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研究涵盖了除外语类高校之外的国内各种高校。关于新建本科院校的有9篇(如:张浩,2018等),关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有7篇(如:王万荣,2018等),关于电大教育或开放教育的有8篇(如:宁春燕,2018等),关于独立学院的有4篇(如:谢婷、刘庆婕等),关于师范类院校的有2篇(如:廖爱秀,2017等),关于民办院校、高职院校以及农林院校的各有1篇(如:楼毅,2014等),关于民族院校的有2篇(如:卢玉娜等,2014等),关于理工类大学的有2篇(如:杜木英等,2012),关于地方本科院校的有7篇(如:李清,2017等),其它没有明确学校类型的文献144篇(如:汪桂芬、明冰霜,2018等)。除了外语类院校的英语本科专业外,其他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尤其是独立院校、新建本科院校、民办院校的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质量提高工作任重而道远。

1.2.3 文献主题

相关的188篇文献都与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研究有关,但各自的主题侧重点不一致,角度不尽相同,突出质量监控与管理的有90篇(如:张奕、王健,2005等),关注写作质量提升的有47篇(如:侯彤,2006等),凸显学术研究的有41篇(如:滕建娇,2008等),将质量监控研究与教学反拨结合起来的文献只有9篇(如:朱海霞,2018等),注重学生思辨能力提升的只有1篇(李莉文、刘雪卉,2018)。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研究,主要是对写作质量进行监控和管理,力图全面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基于此,该文献主题分布符合研究者的期望,质量管理与监控文献比例居多,提升写作能力与学术能力位列第二、三位。但写作过程中,学生思辨能力提升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关键,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同时,研究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目的是为了地更好地提升英语专业教学效果和质量,为教学提供积极的反拨作用。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该领域的教学反拨作用不明显,所占比例偏低,投入的精力不足。

1.2.4 研究方法

常规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质性研究、量化研究、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

究、综述研究以及引介性研究等，其中前3种方法属于实证性研究，后两者则归属非实证性研究。综述研究文献只有1篇，即张金福老师（2017）的“国内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述评”；引介性研究文献也只有1篇，是李娜老师于2014年发表的论文“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分析性评价体系研究”，详细介绍了分析性评价在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评价中的应用。这两篇论文都属于非实证性研究，仅占188篇论文中的1.1%，其余98.9%都是实证性研究。在3种实证性研究方法中，质性研究比例最高，达到了122篇（如：修杨，2018等），量性研究9篇（如：许展，2017等），实证研究23篇（如：王青，2014等），质性与量性结合的研究32篇（如：顾佩娅等，2010等）。实证性研究与非实证性研究比例严重失衡说明目前的主流研究范式依然是实证性研究。但从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的长远科学性和系统性而言，需要适当增加综述研究，以期获得更多与时俱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2. 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微观分析

基于文献分布的宏观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研究基础深厚，涉及除了外语类院校的其他各类型高校，但相关文献涉及教学反拨作用内容的不多，聚焦静态研究而忽略了教学与科研的延续性。此外，宏观研究表明，主流研究范式依然是实证性研究，需要适当增加综述性研究的比例。下文继续从归纳文献中提出的问题以及策略方法、理论基础和视角以及论文写作质量系统要素等微观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当前文献的贡献、不足和研究启示。

2.1 问题归纳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

在与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研究相关的188篇文献当中，相当多的论文标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当前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对策。

从2007年到2018年期间，每一年都有相关论文陈述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问题以及相关对策，由此看出，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问题存在普遍性（外语类院校除外）。同时，众多作者代表了各自的立场和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不同理解，也表明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标准因人而异，不同的导师代表着不同的标准，因而学生缺乏规范的标准引领。为了获得更加直接的数据，本文采取文献抽样的方式，分别从2007年、2013年和2018年3个年度各抽取2篇文章进行仔细分析，探究涉及开端、中期以及近期3个时间段的论文问题与对策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和特质，分析其效度和信度，结果显示：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监控研究聚焦问题，突出问题解决的办法和策略，主要问题有：论文的基本格式不规范（欧荣，2007；冯雪红，2013）、语言表述欠规范（欧荣，2007；高全孝，2007；冯雪红，2013；张印、郭大光，2013；张

浩，2018；宁春燕，2018）、论文创新度不够（冯雪红，2013；张印、郭大光，2013；张浩，2018；宁春燕，2018）、抄袭现象相对普遍（欧荣，2007；宁春燕，2018）、选题欠科学（如：张印、郭大光，2013等）等等。这些抽样文献说明从2007年到2018年，英语本科毕业论文一直存在着很多写作质量问题，相关研究者虽然也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和策略，但从历时角度而言，效果不佳，缺乏后验效度。

2.2 研究文献所涉及的理论和视角

科学研究注重理论基础和支撑，研究者往往基于特定的视角进行主题研讨，即研究离不开特定的理论框架。结合188篇文献中研究者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分析发现：

绝大多数的相关文献涉及研究者的经验总结和归纳，共171篇；有特定研究视角的共13篇，如基于语料库视角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研究的相关文献有许展（2017）的“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摘要问题研究”、孙用常等（2017）的“基于语料库的学术文章和本科毕业论文摘要的语类对比分析”以及陈燕等（2014）的“基于语料库的英文摘要文体特征分析——以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为例”。此外，还有生态学视角（姚俊，2010等）、语篇分析视角（焦俊峰、高丙梁，2011等）等；而具备明确的研究理论基础的文献仅有4篇，分别是王新博（2018）的“ELM理论对英语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的启示研究”、李芳（2012）的“语篇功能角度分析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陈正伦等（2011）等人的“英语本科毕业论文网络指导的建构主义策略设计”以及陶丹丹（2010）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认知过程与成绩的关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研究基础深厚，但相对缺乏理论基础。

2.3 系统要素分析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一个系统过程，涉及毕业论文指导导师、毕业论文写作课程指导老师、论文、论文作者、写作环境等系统要素，而论文又由标题、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正文、结尾、致谢、参考文献等系统组成部分构成。结合论文涉及的基本系统要素，对188篇文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文献中涉及论文构成系统要素比例分布严重不均，“管理监控”的文献依然占了近一半，其次是“正文”28篇，“摘要”15篇，“选题”“导师指导”和“课程指导”各14篇。这些都是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监控的研究热点和关注点，而剩下的论文系统要素研究文献数量偏低。“写作环境”的研究只有4篇（如：王青梅，2015等），研究论文“作者”的只有2篇（如：汪桂芬、明冰霜，2018等），研究“参考文献”“答辩”“文献综述”以及“结语”都只有1篇（如：喻杰、阳捷，2014等），“致谢”“开题”“关键词”几乎无人关注。

3. 英语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内涵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与其他非语言专业论文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语言既是书写的工具，又是输出的结果，因而成为被研究的对象，但鲜有人研究其本质属性。众多的研究者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看作该专业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论文写作结束意味着教学任务的完成，这是一种静态的视角。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结束并没有为指导教师、写作任课教师提供真正的教学反拨作用，论文写作教学研究依然需要从头开始。那么，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除了是核心教学环节，还具备哪些本质属性呢？

3.1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是一项系统工程

如前文提及，英语毕业论文写作不仅是英语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更是一项系统工程，由论文写作任课教师、论文指导导师、学生、论文、环境等要素构成。这些系统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学生的最终毕业论文。对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和教学的研究离不开对这些系统要素的研究。提升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首先要提升各个系统要素的质量，如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导师责任心；完善评价体系，加强管理，提高淘汰率，提升学生的重视度；充实学生论文档案材料等等，切实、全面、科学提高论文写作质量的系统效度。

3.2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指导属于动态评价过程

与传统的班级教学方式不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基本上是导师面对面与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从论文的选题、开题到学生论文的实际写作，整个过程都离不开导师的帮助和指导。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导师给学生“搭架子”的过程，通过对话互动、反馈、干预等方式实施动态评价，整个指导过程是社会文化理论核心思想的体现，尤其是动态评价理论的集中体现。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尤其是初级学术写作能力逐步得到动态发展，其潜在能力得以激发。对学生初级学术写作能力的评估，首先离不开对其独立写作能力的测评，更离不开经过互动干预之后的能力发展量化测评，全面体现了英语本科毕业论文的动态评价特色。

3.3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属于时间相对宽裕的特殊测试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撰写是检测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尤其是写作能力的关键体现，关系着学生是否能够合格毕业，是一项在时间上相对宽裕的特殊语言能力测试。传统的论文指导属于总体宏观性指导，导师根据学生的论文写作稿给出修改意见，最后给出大致分数，主观性较强，缺乏细致诊断反馈，学生并不是非常清楚个人的英语写作能力。基于论文写作构想的研究，构建量表并通过量表对学生的初稿和终稿进行动态评价，导师既可以计算出学生的独立写作能力值以及写作能力潜能值，也能归纳出学生写作的优势和不足，

给出诊断性反馈。

3.4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是为未来提供教学反拨的过程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是学生大学4年的语言学习综合能力，尤其是初级学术写作能力的最终体现，论文的提交意味着学生阶段学习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英语写作教学工作的结束。英语指导教师以及论文写作任课教师应当及时总结和反思，根据学生的终稿通过评分量表进行认知诊断测评，总结归纳学生的写作优势和劣势，及时反馈给同行，为未来的论文写作教学提供积极的反拨作用，这也是教师参与论文写作指导的基本功能之一。

4. 未来研究方向

相关文献为未来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研究基础，涉及众多的论文写作和指导系统要素，但也存在着研究基础理论薄弱、后验效度不高、教学反拨作用不明显等特征。结合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本质属性，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如下：

4.1 夯实理论基础，丰富研究视角

英语本科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属于初级学术写作能力范畴。总体而言，学生的学术写作能力有限，需要课程指导教师、论文指导教师进行帮扶，通过互动或者干预等方式挖掘学生的独立写作能力，开发潜能，为其“搭架子”。要提高指导效果，导师和任课教师需要借助社会文化理论，尤其是动态评价理论来作为自己教学以及指导的理论基础。英语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还是一个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必须符合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认知规律，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分析二语习得过程，提升习得效果。论文写作过程还是一项时间相对宽裕、环境相对宽松的语言测试，需要“出题者”和“组织者”认真研究认知诊断测试理论，从构念提炼、构建矩阵、模型应用等环节提升测试的信度和效度，积极为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提供反馈及反拨。

4.2 分类构建评分量表，提供论文写作标准，突出论文指导评价的公平公正

不同的教师对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标准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视角不同，观点自然也难一致。指导教师不同，标准同样也存在着差异，被指导的学生更难获悉优秀毕业论文的标准。构建评分量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为指导教师和学生提供论文写作标尺，根据评分量表中的描述语，寻找各自的差距，努力达到描述语中的要求和标准。虽然毕业论文属于较长的写文本，测评的时间相对较长，信度和效度很难保证，但基于不同类型的毕业论文，分别建立评分量表（根据英语专业方向构建，如文学方向、翻译方向、语言学方向、翻译报告等等），统一评分尺度，加强评分培训，依然能够有效提升评分的效度和信度。标准的引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是优秀论文评选的关键。

4.3 强化教学反拨作用，为未来毕业论文写作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课程的开设是为了提升学生的论文写作质量，但受课时、学生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课程的效果总体不高，需要进一步改革。而改革需要教学反馈和反拨，尤其需要高质量的教学反拨。通过评分量表对学生的写作论文进行测评，能够有效发现学生写作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反映出写作构思的特征，如学生的论文形式、论文内容、论文组织等等，然后开展系统教学干预，开展动态评价，最后通过终稿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对于解决不了的共性问题，需要及时反馈给论文指导课程教师，为未来的教学提供参考数据，群策群力，共同解决共性问题，切实提高后验效度。

4.4 系统构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监控体系，全过程提升写作质量

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涉及选题、开题、论文写作、论文指导、论文答辩等主要阶段和过程，需要确保每一阶段的质量，实施全过程监控，加强管理。每个阶段注意事项包括：师生双向选题；师生协商开题；导师构建学生论文写作文本库，并构建评分量表；利用评分量表对学生的论文进行评价指导；学生主动提供查重查新报告；指导教师根据不同版本的论文评价结果提出教学反拨报告。最终全面构建论文写作测评档案，内容包括：不同阶段的论文；不同阶段的评分量表（含评分结果）；开题报告；答辩记录以及查重查新报告。

5. 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在国家日益重视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本科专业教学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毕业论文写作及其质量成为关注的焦点。英语专业因其语言专业和工具的双重属性以及特殊性，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献颇多，但总体而言，研究的理论基础不足，解决问题的效度不高，评分尺度不统一，监控力度不够。基于英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兼有教学重要环节、动态评价过程、特殊语言测试、教学反拨属性等特点，本文提出了夯实理论基础，分类构建评分量表，强化教学反拨效应，全过程强化质量监控体系构建的设想，希望能够真正解决目前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中存在的问题，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 [1] 曹赞.“新国标”指导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改革初探[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9,40(03):121-123.
- [2] 陈燕,孙颖,王晶.基于语料库的英文摘要文体特征分析——以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为例[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01):95-97.
- [3] 陈正伦,杜平,汤平,罗兴贤.英语本科毕业论文网络指导的建构主义策略设计[J].赤峰

- 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07): 186-189.
- [4] 杜木英, 阚建全, 张甫生. 国际化背景下工科 ESP 教学中的本科毕业论文英语摘要教学实践[J]. 广东化工, 2012, 39(18): 142-143.
 - [5] 冯雪红.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现存问题分析[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3, 31(01): 118-120.
 - [6] 顾佩娅, 张烨, 古海波.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课研究性教学设计与实践[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0(04): 44-51.
 - [7] 侯彤. 提高英语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几点措施[J]. 辽宁教育研究, 2006(06): 103.
 - [8] 姜雪. 英语教育方向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对策[A]. 北京中外软信息技术研究院. 第二届世纪之星创新教育论坛论文集[C]. 北京中外软信息技术研究院: 北京中外软信息技术研究院, 2015: 2.
 - [9] 焦俊峰, 高丙梁. 从学术论文的语篇特点谈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以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为例[J].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7(01): 57-61.
 - [10] 李芳. 语篇功能角度分析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D]. 南昌大学, 2012.
 - [11] 李莉文, 刘雪卉. 教师反馈与思辨能力培养的个案研究——以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为例[J]. 外语界, 2018(06): 20-27.
 - [12] 李娜. 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分析性评价体系研究[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4(03): 102-103.
 - [13] 李清. 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翻译实践报告”毕业论文模式探究[J]. 文教资料, 2017(31): 162-164.
 - [14] 廖爱秀. 英语专业六年制免费师范生本科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一体化模式探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为例[J]. 文教资料, 2017(20): 225-226.
 - [15] 楼毅. 教育生态学指导下民办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课程设计与实践[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03): 3-4+108.
 - [16] 卢玉娜, 谌婷, 彭雁萍, 海娜.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现状分析及策略[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4(05): 76-79.
 - [17] 宁春燕. 电大教育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题及对策分析[J]. 云南开放大学学报, 2018, 20(01): 88-91.
 - [18] 欧荣.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7(01): 137-139.
 - [19] 孙用常, 石慧敏. 基于语料库的学术文章和本科毕业论文摘要的语类对比分析[J]. 铜仁学院学报, 2017, 19(10): 119-122.
 - [20] 陶丹丹.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认知过程与成绩的关系[J]. 宜春学院学报, 2010, 32(10): 132-134.
 - [21] 滕建姣.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研究[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1): 205-206.
 - [22] 汪桂芬, 明冰霜.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反馈实证调查[J]. 武汉商学院学报, 2018, 32(05): 90-93.
 - [23] 王青. 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的调查与思考[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0(05): 103-105.
 - [24] 王青梅. 论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剽窃现象及应对策略[J]. 太原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03): 168-170.
 - [25] 王万荣. 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现状与改革[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18, 31(23): 180-181.
 - [26] 王新博. ELM理论对英语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的启示研究[A]. 东北亚外语论坛(2018 NO.5 总第9期)[C]. 沈阳东师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4.

- [27] 韦哲, 李昊宇. 河套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文学方向毕业论文现状分析 [J]. 河套学院论坛, 2017, 14(04): 57-59.
- [28] 谢婷, 刘庆婕. 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翻译报告写作模式实践与研究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21): 105.
- [29] 修杨.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常见语言错误分析——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为例 [J]. 海外英语, 2018(03): 170-171.
- [30] 许勉君. 由选题和理论框架谈英语专业翻译方向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改革 [J]. 英语广场 (学术研究), 2013(12): 56-58.
- [31] 许展.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英文摘要问题研究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6(10): 59-61+76.
- [32] 姚俊. 英语论文摘要的语篇模式与作者介入——英语本科毕业论文摘要的实证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0, 31(04): 29-33.
- [33] 喻杰, 阳捷.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问题研究 (英文) [J]. 海外英语, 2014(19): 109-111.
- [34] 张浩.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问题探究及指导对策 [J]. 河套学院论坛, 2018, 15(01): 61-63+69.
- [35] 张金福. 国内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述评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3(11): 130-131+137.
- [36] 张奕, 王健. 构建多维立体化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管理体系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5(09): 71-72.
- [37] 张印, 郭大光.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常见问题分析及对策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3, 32(04): 173-174.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EB/OL].[2019-9-23].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734/200507/8296.html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 [EB/OL].[2019-9-23].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09/t20180903_347079.html
- [40] 朱海霞. 商务英语本科毕业论文对教学的反拨效应 [J]. 海外英语, 2018(07): 9-11.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障碍

——以西部某普通高校为例

王建梅

(重庆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 以我国西部一所普通高校为例, 分析说明语言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化之路的一个主要障碍。对此提出解决措施: 重视大学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 在研究生层面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切实可行; 根据留学生入校语言测试水平实施分类和分级教学。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 语言障碍; 学术英语; 专业英语; 留学生

Language Barr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 Taking a Regular University in 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WANG Jianmei

Abstract: Taking a regular university in west China as an example, it is indicated that insufficient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both Chinese students and overseas students becomes the major barrier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as the countermeasures, EAP and ESP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urthermore, classified and graded teaching could be practiced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overseas studen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more applicable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regular universit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anguage barrier; EAP; ESP; overseas students

0. 引言

高等教育自古以来就具有国际化的特性。尽管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和定义一直争议不断, 尚无定论, 但普遍认为其实质性内容是教育理念国际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障碍研究”(项目编号: 2019YBYY)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建梅, 女,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外语教育研究。

师生国际化、教育资源国际化、专业设置和课程国际化（王建梅，2019）。国外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早，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高。国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有教学及课程研究、对文化及认同感的研究等（魏静、魏延辉，2015）。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自我国加入 WTO 以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大多讨论思辨认识、进行文献梳理、做出事实性描述等。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中语言障碍的研究较少。然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方高校，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语言障碍。一方面，高校学生和教师用英语学习和授课的能力有限，即使大量引进优秀外籍教师来华工作，但大多数学生听不懂纯英文授课，许多教师的科研合作也因为语言障碍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高校来华留学生也遇到听不懂课、跟不上教学进度的困难，主要原因之一仍是语言障碍。因此，我国高校走国际化之路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语言问题。本文以我国西部一所普通高校（文中称为 N 大学）为例，分析国际合作办学中方学生以及来华留学生在学中的语言障碍，同时探析解决途径。

1. 研究内容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了解我国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并探讨如何改进和解决这些问题，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研究小组针对西部 N 大学的国际学院本科生、留学生和在校研究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这 3 组研究对象学生在校学习过程中的语言困难。

第一组为该校合作办学的中方学生。2019 年 12 月在 N 大学国际学院本科生中进行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了国际学院一年级至四年级学生，有效问卷 386 份。该校国际学院由 N 大学与韩国科学技术院（英文简称 KAIST）合作办学，学生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两个专业的本科生，授课教师主要来自中国、韩国、美国和英国，教学使用语言为英语。

第二组为 N 大学的来华留学生。2020 年 1 月对该校 84 名来华留学生进行了关于在校学习期间语言障碍的问卷调查（问卷为英汉双语），有效问卷为 78 份。该校留学生来源地主要为孟加拉国和越南，极少数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第三组为 N 大学在校研究生。2019 年 12 月在 N 大学研究生中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 619 份，其中，男生 416 人，女生 203 人，理工科学生占比为 64.85%，文科学生占 35.25%。81.89% 的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 425 分以上，38.65% 的学生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 425 分以上。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为了广泛、深入地研究普通高校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障碍，本研究采用了问

卷调查量化研究和半结构访谈为主的质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了解我国西部一所普通高校国际联合办学中学生的外语(英语)学习、课程设置、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情况,探寻国际联合办学中的语言障碍。与此同时,以该校本科来华留学生为例,分析观察在其专业课(英语、汉语讲授)学习中是否存在语言障碍,最后以该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为例,探寻有效克服国际交流中语言(英语)障碍的途径。此外,从前面3个问卷调查对象中随机挑选部分学生对其进行访谈,访谈主要针对问卷内容以进一步了解学生的相关问题。

1.3 研究假设

- (1) 外语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的一个重要障碍;
- (2) 加强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是提高我国普通院校学生学术交际能力、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 (3) 改进英语和汉语教学是提高来华留学生教学质量的保障。

2. 结果及讨论

2.1 中国学生“走出去”的语言困难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两部分,一是“请进来”,二是“走出去”。“请进来”指吸引国际学生(留学生)来我国高校学习,“走出去”指让中国的学生融入国际化教育大舞台。

近些年,随着中小学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我国高校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均有明显提升,但与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或进行学术交流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教育欠发达的西部普通高校,学生英语学术交际能力不足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制约因素。如本研究中第一组调查所示,N大学与韩国KAIST合作创办的“两江国际学院”是我国西部普通高校较典型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自2015年9月开始招生以来,根据合作办学协议,学生入校以后本科4年所有专业课程均由韩方教授全英文授课,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由中方、韩方和英美外教进行英文授课。如果学生希望进入韩方学校进行交换学习,则在大二结束之前要参加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至少要达到80分或6.0,同时专业课成绩满足要求并通过韩方教授的面试。若交换生毕业时能完成英文论文撰写并通过英语答辩则可获得中韩两校的本科学位。这就要求学生有良好的学术英语交际能力。在多年的实践中,绝大多数学生一直深受语言(英语)障碍之苦。调查显示,82.65%的学生认为在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学习中,英语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个主要因素;认为外教用英文讲授的专业课程难度很大的学生比例为68.14%;有一半以上学生(55.18%)不习惯外国教师的授课或讲座,他们跟不上进度,也不会记笔记;大多数学生(76.68%)认为用英语做学术陈述或讨论有困难;认为用英语写小论文、文献综述等有困难的学生占72.8%。与此同时,外籍教师也为学

生英语能力不足而焦虑。结果是只有极少数学生能获得中韩双学位。同样,在对N大学研究生进行的有关英语学习和应用调查中,回答能否听懂全英文学术讲座时,54.1%的学生表示基本听不懂,15%的学生完全听不懂。

由此可见,外语(英语)是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障碍。大多数学生在以英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环境下感到交流十分困难,学生入学的英语基础普遍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因此,大学期间的英语教育对实现我国师生的国际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2.2 来华留学生的语言困难

近年,“一带一路”沿线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主修理工类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也在上升,但很多情况下由于语言的障碍,难以实现教学目标。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西部普通高校能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的师资匮乏,特别是实验课师资全英文授课能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西部普通高校来华留学生大部分来自世界教育水平较弱的地区,英语并非其第一语言。此外,由于我国高校质量评估指标之一是在校来华留学生数量,因此很多西部高校过度追求数量,对来华留学生入学选拔标准(包括语言要求)较宽松,有些甚至凡是申请即可被录取(翟雯,2021)。结果导致来华留学生英语或汉语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学生能用英文或汉语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交流,但其英语、汉语能力很难达到学习专业知识的水平,严重影响教学质量。例如,在N大学第二组调查中,55人来自孟加拉国,16人来自越南,3人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来自孟加拉国的学生全部在N大学学习电子和计算机工科专业,教学语言为英语;16名越南学生、3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学生在N大学学习汉语,教学用语为汉语(有时教师用简单英语辅助教学)。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孟加拉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时间均在10年以上,但他们的汉语基础普遍不好,只有1位学生来中国之前学习汉语超过1年,其他学生的汉语基础基本为零。因此,这部分学生的课堂教学、课本、作业、考试用语均为英语。但实际情况是,只有少数学生(32%)能完全听懂英语专业课,尽管大部分学生能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或阅读英文文献,但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较弱。来自越南的学生中虽有80%以上来华之前已学习汉语5年以上,但水平差异较大。这部分来华留学生的课堂教学、课本、作业、考试用语均为汉语。同样,当用汉语学习专业知识时,他们普遍反映跟不上老师的授课,其原因之一就是语言困难。以上两个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实例反映了我国西部普通高校国际化之路“请进来”中较典型的语言问题。

3. 解决措施

3.1 加强高校的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在普通高校始终是一门学习时间长(两年四学期)、学分高(12-14

学分)的公共必修课。但大多数普通高校学生听不懂国际优秀教师的英语授课,大多数国内教师也不能用英语给国际学生授课。“当前我国高校国际化课程总量不大,课程面较窄,其中主要原因是外语水平,特别是专业外语水平不高”(陆小兵、王文军、钱小龙,2018)。解决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改革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加强学术英语(EAP)和专业英语(ESP)的教学。因为EAP和ESP教学可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本研究第三组问卷调查中,学生(75.6%)普遍认为有必要在大学期间开设ESP和EAP课程,并且有82.1%的学生需要使用与其专业学习相关、并能突出其学科特色的学术英语教材。因此,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应该从“提高学生英语基础”的通用英语转向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课程建设基础。并且,通过EAP和ESP学习,学生能培养良好的学术意识,知晓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提高学科专业英语的交际能力,为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做准备,也更有助于实现中国高校的国际化。

3.2 重视推行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需要既有丰富专业知识又能用国际通用语言流畅授课的优良师资,以及有良好外语水平并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但目前我国大多数西部高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少优秀的国际化师资。一方面,普通地方高校全英文授课教师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引进优秀外籍专业教师困难重重。“中国普通高校聘任外籍教师仅占教师总数的0.82%”(黎军、张正娟,2019)。此外,西部普通高校生源不理想,学生入校英语基础与985和211高校的学生差距较大,大部分学生很难实现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然而,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有较好的英语基础、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更高的学术追求,也有更强烈的用英语获取专业知识的需求。本研究的第三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8.8%的研究生最近一年阅读最多的英语资料是学术期刊专业论文,77.9%的学生需用英文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和文章,84%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研究生学术英语的系列课程。而且,研究生对听、说、读、写等各项学术英语技能都有很大需求,对学习与专业知识相关的英语学习有强烈的愿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EAP和ESP课程的教授和学习难度大,包含语言和专业知识的“双负荷”。EAP和ESP教学必须与专业结合,而各专业学科的英语学术交流语言习惯和方式均有较大差别,各学科英语的语篇特点也差异巨大。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A&HCI期刊目录为例,在其收录的5000多种期刊中,95%以上的文章均为英语撰写出版(Hyland, 2005)。此外,不同学科领域的英文论文又有各自不同的语类、语篇、句法结构特点。毕博和格雷基于大型语料库的学术语篇分析发现,人文、社会、自然、科技等学科的英文文献在句法、语法结构方面有很大差异(Biber & Gray, 2016)。对本科生而言,其入校时专业意识

不强,知识匮乏,要同时克服语言和专业的困难,因此直接学好专业英语难度很大。但研究生已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明确的研究方向,大多还参与了导师的科学研究,并大量阅读本领域的最新文献,ESP和EAP的需求和学习主动性更强(王建梅,2020)。另外,很多研究生导师有海外留学经历,具有良好的国际教育视野和能力。因此,从克服国际交流语言障碍的角度来分析,在普通高校研究生教育阶段推广国际合作可行性更大,更切合实际。

3.3 对来华留学生实施分类分级教学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每年人数已超40万。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0)的“来华留学年度报告”,2018年来华留学生超49.2万,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和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作为世界交流通用语言,英语几乎是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对外沟通语言,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重要语言。同时,汉语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目前,全球将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习者近1亿,他们将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学习一门外语会对其文化、民族产生感情(李宇明,2018)。汉语在国际交往,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达到23个,开设汉语专业的高校有5所(王雪梅、赵双花,2019)。来华留学生的母语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英语或汉语学习背景。然而,如本研究第二组调查所示,这些留学生的英语和汉语基础差距巨大,有些认为课堂内容简单、无挑战性,而有些学生因语言问题听不懂授课内容,教师很难组织课堂教学。因此,如果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实施分类和分级教学,可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分类和分层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效率(吕碧霞,2021)。首先,对新来的留学生进行英语或汉语水平书面测试和面试,根据测试成绩和个人意愿编入“英语教学班”和“汉语教学班”,再根据其专业选择进行合理分班。对英语、汉语均达不到专业学习要求的留学生实行“预科语言”学习,合格后方可转入专业班学习。

其次,要特别加强汉语分层教学。来华留学生在我国高校学习汉语有很多优势,如语言环境好,师资力量强,学习资源丰富。但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个体差异大,文化教育背景不同,汉语学习特点也不同。因此教师要精心设计每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课堂上有积极性和成就感,课后有学习主动性。课后辅导和自学是分级教学的重要环节,可通过汉语角、朗读演讲比赛、情景剧表演等活动促进学生汉语水平的快速提高。同时,可开设汉语必修和选修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人兴趣和需求。

最后,克服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语言障碍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培养小语种人才来解决,那样成本高,可行性小,因为我国西部地区小语种资源匮乏,而语言服

务，特别是小语种服务集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来华留学生和教师的国际交流主要语言为英语和汉语，因此，加强英语和汉语的教学效果是克服西部高校国际化语言障碍的重要举措。

4. 结语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总体水平偏低，而西部地区高校的国际化道路尤为艰难，语言是一个重要障碍。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创建一流学科的大背景下，英语成为国际教育和科研交流的主要媒介，大学英语教育应更好地满足学生对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需求。学术英语和专业英语更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施。普通高校可充分利用有限教学资源，在国内研究生教育中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同时，对华留学生可根据其英语和汉语基础，采取分类、分级教学以提高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 [1] Biber, D. & Gray, B. *Grammatical Complexity in Academic English: Linguistic Change in Writ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 Hyland, K.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3.
- [3] 黎军, 张正娟. “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探索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19 (10): 9-78.
- [4] 李宇明. 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J]. 外语界, 2018(5): 2-10.
- [5] 吕碧霞. 来华留学生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提升的实践研究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1(6): 146-149.
- [6] 陆小兵, 王文军, 钱小龙. “双一流”战略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反思 [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 27-34.
- [7] 王建梅. 新加坡双语教育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A]. 当代外语教育.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9(3): 6-13.
- [8] 王建梅. 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EAP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 2020(5): 101-105,116.
- [9] 王雪梅, 赵双花. “一带一路”沿线一流高校外语专业/课程设置研究 [J]. 外语界, 2019 (6): 53-61.
- [10] 魏静, 魏延辉. 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趋势可视化分析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124-128.
- [11] 翟雯.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等院校工科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的问题和对策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2021(1): 73-75.

文化学理论框架下的德语国情教学理论与实践

郭 祺

(四川外国语大学 通识教育学院, 重庆 500031)

摘 要: 本文针对国内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教学改革方案, 设计出适合国内大学德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学国情教学模式。模式以德语国家的回忆形象为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话语能力。研究试图通过对学生问卷调查的分析, 评估文化学国情模式的教改效果并完善教学模式。

关键词: 德语国情教学; 文化学国情教学模式; 问卷调查

German Cultural Lear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Studies: Pedag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GUO Qi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German cultural teach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is essay proposes to reform and design a new model suitable for learning German culture for German majors. With the figures of memory of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 as the teaching content, this model aims to improve the discourse competence of stu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to German learners, this essay also assesses the effect of this reformed model of learning German culture and offers further suggestions to ideal pedagogical models.

Key words: learning German culture; pedagogical model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studies; questionnaires

0. 引言

在德国的对外德语(DaF)领域, 文化学国情教学研究已经发展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郭祺, 2021)。虽然以文化学为导向的两种模式(文化阐释模式和记忆场模式)在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方面有很大差别(Guo, 2020: 81-83), 但因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改项目“文化学理论框架的德语国情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JY19652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郭 祺, 女, 四川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对外德语教学论和德语文学研究。

对文化学进行了系统反思，使得文化学的工作方法和文化概念变得清晰，给国内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用文化学来推进更新或改革的契机。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内德语国情教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文化学的研究思路，设计适合国内德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学国情模式，并进行实践教学和问卷调查，以此来论证、评估和完善文化学国情教学模式。

1. 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研究的问题和改革方向

早在 2007 年出版的《整合国情学》（*Integrative Landeskunde*）一书中，李媛（2007）就指出了国内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的 5 个问题。第一，系统地反思德语国情教学的研究文献少。第二，以事实为教学内容的德语国情课与学生自身经验和未来职业无关，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得不到关注；此外，这种教学法不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三，国情教学缺乏跨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文化的对比流于表面，文化对比的差异点多于共同点，强调单一文化而忽略多元文化，视文化适应为学习目标。第四，国情教材大多未选用日常生活主题，而且主题不涉及新的问题，例如德国重新统一后的问题等，同时也缺乏一些禁忌主题。第五，缺乏有资质的从事国情教学的教师。郭祺（2020）在《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状况和改革方向》一文中对德语国情课程的教学现状（包含教学目标、相关教材以及考试题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以文化学理论为框架，提出了德语国情课程的改革方向。第一，按照文化学跨学科的工作方法，借鉴文化学理论来制定国情课程的教学内容，建构国情课程独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从文化学的文化意义论（*der bedeutungs-und wissensorientierte Kulturbegriff*）出发，把德语国家文化看作“意义系统或象征秩序的综合体”（Reckwitz, 2000: 84），研究学生如何建构德语国家的意义系统，进而形成并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框架。

2. 文化学理论框架下的德语国情教学模式

以文化学跨学科为工作方法，以研究文化的可建构性为目标，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大学德语专业的文化学国情学》（*Kulturwissenschaftlich orientierte Landeskunde im chinesischen Germanistikstudium*）中为高校德语专业学生设计了一个文化学国情模式，即回忆形象（*Erinnerungsfiguren*）模式。此模式利用文化学的文化记忆理论来重建国情课程的教学内容，考查学生如何（重新）建构德语国家文化记忆中的回忆形象，最终达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话语能力（*Diskursfähigkeit*）的教学目标。

文化记忆理论由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发展至今成了文化学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扬·阿斯曼（1988:15）认为，文化记忆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特有的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的存在”，是

“那些塑造我们的时间与历史意识、我们的自我与世界想象”（Assmann, 2006: 70）的经典。回忆形象是文化记忆理论的重要概念，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Assmann, 1992: 52），为群体提供导向和文化认同基础。在实际教学中，回忆形象不仅包括物质层面，如地点、物品、人物等，也包含非物质层面，例如音乐、文学素材、概念、美学形式、具有象征意义的客观外化物等（Guo, 2020: 111）。为确保教学的标准化、稳定性和有效性，必须把握回忆形象的5个选择标准，即熟悉度、现实性、多视角性、多媒介性和对文化形成的重大意义（Guo, 2020: 112-113）。首先，中国大学德语专业学生必须对回忆形象具有一定的熟悉度，目的是激活学生的“前知识”（Vorwissen），使已知的与新学习的内容产生关联。其次，回忆形象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应与现在产生关联，与中国学生当下的生活世界有联系，同时能让中国学生依据当下的观察视角建构。再次，一个回忆形象必须从多重视角来进行观察和阐释，把相似、相关或相反的视角汇聚到同一个话语框架内，展现回忆形象的多重感知及不规则变化性。另外，回忆形象应通过不同的媒介方式被展演和建构。最后，回忆形象应对德语国家的文化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既能给集体成员提供行为导向，也能描述德语国家的自我形象。

文化学国情模式的教学目标不是传递有关回忆形象的信息和数据，而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话语能力。话语能力包括语言运用能力、交际能力和互动合作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参与文化的能力。其中语言运用能力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外语运用能力概念相同，都强调学生“能运用语言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 95）。交际能力和互动合作能力指学生能够与其他同学和教师交换意见、进行讨论、互动合作。此外，话语能力还包括反思能力，学生必须对自己参与话语的过程以及对自己的知识视野进行反思。通过谈论话语、质疑话语、阐释话语、反思话语、重新建构话语，学生能够达到参与德语国家话语以及参与建构德语国家文化的目的。

3. 文化学国情课程实践

在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笔者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教师沙明梅共同合作，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2018级1-4班全体学生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学期（共18周）的以回忆形象为教学内容的教学实践，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话语能力。

3.1 课程设计

按照回忆形象的5个选择标准，共选择出8个德语国家的回忆形象，分别是：Luther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路德和德语）、König Ludwig II. und Bayern（路德维希二世和巴伐利亚州）、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德国国歌）、

Sophie Scholl（苏菲·绍尔）、Wir sind das/ein Volk（我们是这个/一个民族）、das Ost-Ampelmännchen（东德交通信号灯小人）、Döner und Migration（土耳其旋转烤肉和移民）和 Made in Germany und Made in China（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以一学期 18 周为教学实践期，每周安排两个学时的授课实践，具体的教学进度安排如表 1 所示：

表 1 文化学国情课程教学安排

周 数	教学内容
第一周	课程导论
第二周 + 第三周	Luther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第四周 + 第五周	König Ludwig II. und Bayern
第六周 + 第七周	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
第八周 + 第九周	Sophie Scholl
第十周 + 第十一周	Wir sind das/ein Volk
第十二周 + 第十三周	Das Ost-Ampelmännchen
第十四周 + 第十五周	Döner und Migration
第十六周 + 第十七周	Made in Germany + Made in China
第十八周	总结、复习、讨论、反思、问卷调查

由于学生对课程的核心概念如文化记忆、回忆形象和话语能力陌生，因此第一周的两个课时为导论课，用于解释概念、讲解课程安排以及回答学生的问题。每个回忆形象计划两周完成，共 4 个学时。以第一个回忆形象“路德和德语”为例，第二周的两个学时用来处理课堂的学习材料，第三周的两个学时是学生展示其反思成果的时间。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4-6 人），选择任意一种媒介形式，共同完成一个媒介作品（例如思维导图、幻灯片演示、图片、短视频、诗歌、文学作品、小电影、歌曲、数字讲故事等），向其他学生和教师展示并说明这个作品，同时对教师和其他学生的提问进行解答，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和分析。第十八周的两个学时是回顾、总结、评价和反思的时间，以问卷调查和课堂讨论的形式为主，学生和教师针对整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包含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共同进行反思和评价。

3.2 问卷调查研究

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德语系 2018 级学生，共 84 名，其中女生 65 名，男生 19 名。自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他们进入了第三年的德语专业学习。在语言水平方面，

他们具有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达到了德语专业四级的水平;在背景知识方面,他们在一年级的基础阶段已经上过国情课,因此具备基本的关于德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知识。

针对“回忆形象”课程的问卷调查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的问题涉及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目的和德语语言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第二部分针对基础阶段的德语国情课提出问题,包括教学手段、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的比重以及学生所具备的德语文化知识;第三部分是评价“回忆形象”课程的教学准备、教学内容、学习目标(话语能力)、学生遇到的问题、问题的原因以及基础阶段国情课和“回忆形象”课程的比较。第三部分的数据是本文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84份,均为有效问卷。学生对问卷中的问题都做出了判断和评级,没有缺失值。将调查问卷原始数据录入统计软件处理后,具体结果见表2、表3和表4。

表2 评价教学内容(回忆形象)

对教学内容的评价	完全不赞同	不太赞同	比较赞同	完全赞同
教学内容很好理解	2 (2.4%)	12 (14.3%)	48 (57.1%)	22 (26.2%)
教学内容的数量足够	1 (1.2%)	8 (9.5%)	50 (59.5%)	25 (29.8%)
教学内容使我产生了兴趣	3 (3.6%)	12 (14.3%)	49 (58.3%)	20 (23.8%)
我知道很多关于教学内容的知识	2 (2.4%)	24 (28.6%)	49 (58.3%)	9 (10.7%)

表2的数据说明,83.3%(70名)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很好理解,2.4%(2名)的学生不赞同这个说法;89.3%(75名)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足够,不赞同此说法的学生占1.2%(1名);82.1%(69名)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让他们产生了兴趣,仅有3.6%(3名)的学生没有产生兴趣;69%(58名)的学生知道很多关于教学内容的知识,不太赞同这种说法的人数为24人,占总人数的28.6%,有2名(2.4%)学生完全不知道相关知识。

如表3的数据所示,64.3%(54名)的学生在开始时就清楚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不太赞同此说法的学生占30.9%,为26名,完全不赞同的学生人数为4,占总人数的4.8%;59.5%(50名)的学生认为,课程结束后自己的口语或/和书写能力变得更好,不太赞同此说法的人数为31,占总人数的36.9%,完全不赞同的学生人数为3,占3.6%;79.8%(67名)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不同的话语,19%(16名)的学生不太赞同此说法,1.2%(1名)的学生完全不赞同;

72.6%（61名）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与别人讨论，21名学生不太赞同，占总人数的25%，2名学生完全不赞同，占2.4%；76.2%（64名）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反思自己的知识，21.4%（18名）的学生不太赞同，2.4%（2名）的学生完全不赞同；60.7%（51名）的学生认为课程结束后能阐释话语并创造话语，35.7%（30名）的学生不太赞同，3.6%（3名）完全不赞同。

表3 评价教学目标（话语能力）

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完全不赞同	不太赞同	比较赞同	完全赞同
课程开始时，我就清楚教学目标	4（4.8%）	26（30.9%）	41（48.8%）	13（15.5%）
课程结束后，我的口语/书写能力变得更好	3（3.6%）	31（36.9%）	48（57.1%）	2（2.4%）
课程结束后，我能用批判的眼光分析不同的话语	1（1.2%）	16（19%）	55（65.5%）	12（14.3%）
课程结束后，我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与别人讨论	2（2.4%）	21（25%）	54（64.3%）	7（8.3%）
课程结束后，我能反思自己的知识	2（2.4%）	18（21.4%）	57（67.9%）	7（8.3%）
课程结束后，我能阐释话语并创造话语	3（3.6%）	30（35.7%）	47（55.9%）	4（4.8%）

表4 与基础阶段的国情课相比，我更喜欢“回忆形象”课程的原因

	完全不赞同	不太赞同	比较赞同	完全赞同
我不必背太多的信息	5（6%）	16（19%）	49（58.3%）	14（16.7%）
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1（1.2%）	7（8.3%）	57（67.9%）	19（22.6%）
我能分析和批判学习材料	1（1.2%）	27（32.1%）	47（55.9%）	9（10.7%）
我在说和写方面变得更主动	4（4.8%）	33（39.3%）	43（51.2%）	4（4.8%）
我能通过PPT重新构建一个回忆形象	2（2.4%）	15（17.8%）	57（67.9%）	10（11.9%）
我的话语能力得到了提高	0（0%）	32（38.1%）	49（58.3%）	3（3.6%）

从表4可知学生更喜欢“回忆形象”课程的原因。75%（63名）的学生认为在该课程中不必背太多的信息，不太赞同此说法的学生占19%，人数为16名，完全不赞同的学生占6%，人数为5名；90.5%（76名）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完全不赞同的学生占1.2%，人数为1名；66.6%（56名）的学

生能分析和批判学习材料,不太赞同的学生人数为27,占总人数的32.1%,完全不赞同的人数为1名,占1.2%;56%(47名)的学生在说和写方面变得更主动,不太赞同的学生人数为33,占39.3%,完全不赞同的人数为4,占4.8%;79.8%(67名)的学生能通过制作PPT来重新建构一个回忆形象,不太赞同的人数为15,占17.8%,完全不赞同的人数为2,占2.4%;61.9%(52名)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话语能力得到了提高,不太赞同的人数为32人,占38.1%,完全不赞同的人数为0。

本项问卷调查研究的数据表明,第一,该课程教学内容适度,难度适中,结构合理,注重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回忆和巩固已有的知识。第二,教学目标明确,能让学生清晰地了解授课要达到的目的。第三,与基础阶段的国情课程相比,学生更喜欢“回忆形象”课程,因为学生不需要背诵太多的信息和事实知识,他们能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分析和批判教学内容,而且在说和写方面变得更主动,同时他们能用幻灯片演示这种媒介形式来重新构建一个回忆形象,并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和提高自身的话语能力。

3.3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从问卷调查的数据上看,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应着重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塑造学生批判思考能力,提高口语和书写能力以及促进学生的创造能力。具体的改进措施为:第一,教师应在课前把课堂的学习材料提前发给學生,让学生有时间提前预习、查阅单词、理解题目、做好听说写的准备。第二,教师应多采用开放式提问,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还应多创造讨论和辩论的氛围,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融入角色进行思考,训练批判思维。第三,应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学生应学会通过分享自己的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来达到互助学习的目的,同时教师还应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共同完成创造性任务,并对创意成果进行评估和提出改进意见。第四,教师可在课后提供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听力、视频以及文本材料,让学生能对学习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自我调整和自我评价,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第五,教师与学生之间应有更多交流,及时沟通,共同讨论更适合的教学方式和学习策略。

4. 结语

与基础阶段的德语国情课相比,基于文化学跨学科的工作方法和对意义系统的建构而设计的文化学国情课程具有明显的教学优势。其不仅能改变以传递事实知识为主的传统课堂模式,使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结合得更加紧密,还更加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创造者角色,建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以文化学理论为框架的国情教学改革,旨在解决国内高校德语国情课程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构建国情教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实现国情教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重新构造学科机制。文化学国情学模式是专为德语专业学生所设计,

借鉴了文化记忆理论，以德语国家的回忆形象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对回忆形象的（重新）建构达到培养和发展话语能力的教学目标。本文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反映教改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需运用更多的实践和测试来评估和完善文化学国情学模式。

参考文献：

- [1] Assmann, J.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A]. In J. Assmann and T. Hölscher (eds.). *Kultur und Gedächtnis* [C].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15.
- [2]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 München: C. H. Beck, 1992.
- [3]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A]. In J. Assmann. *Thomas Mann und Ägypten. Mythos und Monotheismus in den Josephsromanen* [M]. München: C. H. Beck, 2006: 70.
- [4] Guo, Q. *Kulturwissenschaftlich orientierte Landeskunde im chinesischen Germanistikstudium. Erinnerungsfiguren, Diskursfähigkeit und Umgang mit Medien* [M]. Berlin: Peter Lang, 2020.
- [5] Li, Y. *Integrative Landeskunde. Ein didaktisches Konzept fü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in China am Beispiel des Einsatzes von Werbung* [M]. München: IUDICIUM, 2007.
- [6] Reckwitz, A. *Die Transformation der Kulturtheorien. Zur Entwicklung eines Theorieprogramms* [M]. Weilerswist: Velbrück Wissenschaft, 2000.
- [7] 郭祺. 高校德语专业国情教学状况和改革方向 [A]. 祝朝伟（编）.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第七辑）[C].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 51-59.
- [8] 郭祺. 文化学理论框架下的德语国情教学研究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1(4): 34-41.
- [9]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A].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基于语料库方法的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 及其教学研究

余 荃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词汇搭配是外语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教师教授不足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字典查询也存在对高频词汇搭配涵盖面不足的缺憾。本文使用 DWDS 语料库中的双联词功能对德语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进行了统计, 采用语料库搜索与人工辨识相结合的方法, 获取了 72 个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以往的相关研究在制定搜索出发词时只关注德语基础词汇中的高频词, 与以往不同, 本文的搜索出发词选自 16 个日常生活领域, 保证了出发词来源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德语词汇搭配学习的教学策略与德语二元词汇搭配习得的方法, 以期助益教学。

关键字: 二元词汇搭配; DWDS; 语料库; 二语习得

A Corpus-based Study on High-frequency Binary Lexical Collocations in German and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YU Quan

Abstract: Collo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re not good enough to motivate students. Dictionary also has the shortcoming of insufficient coverage of high-frequency vocabulary collocation. In this paper, double conjunctions in DWDS corpus has been used to statistically collect high-frequency binary collocation in German, and 72 high-frequency binary collocations are obtained. The search starting words in this paper are selected from 16 areas of daily life, which ensures the diversity of the sources of the starting words. On this basis, a new German binary vocabulary collocation acquisi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benefit teaching.

Key words: binary collocation; DWDS; corp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项目编号: 201808610240)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余 荃, 女,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语篇分析研究。

1. 研究背景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德语专业的标杆性考试大纲《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及《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的研读，我们发现，两项标杆性德语考试对于词汇的考核占据了不小的份额。潘亚玲（2004）在对词汇学习策略的研究中提出，要掌握德语固定搭配，收集惯用语和成语等词汇形式；王京平（2005）也指出，德语词汇学习中要关注动宾搭配、偏正搭配等词汇搭配单位的学习。由此可见，词汇学习能力是外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语言能力之一，是二语教学、词典编撰等领域研究的经典话题，受到了学界众多专家的重视（Reder, 2006; Bahns, 1996; Möhring, 2011）。然而，词汇学习并非简单等同于习得单个词汇，而是习得词汇搭配（Kollokation）。这也就是说，词汇学习就等同于词汇搭配的学习（Hausmann, 1984）。除此之外，词汇搭配与语言综合能力显著相关（黄强，2002）。然而，由于二语学习者在词汇搭配的规约性和固定性理解方面能力薄弱，对词汇搭配的习得困难重重（Targońska, 2018），搭配错误和习语错误在学习者言语错误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陈鹤，2014；杜诗春、杨惠中，2003），严重伤害了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能力。因此，词汇搭配是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确习得词汇搭配是词汇学习和外语学习的重中之重。

然而，尽管词汇搭配在外语学习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也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但在外语词汇教学中，忽视词汇搭配的现象却并不少见。赵志勇（2018）通过访谈的方式从德语教师的视角对中国德语学习者词汇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德语学习者会频繁出现搭配错误。《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中关于词汇教学的内容中也只是对词汇量的增长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未强调词汇搭配的扩展。

基于这种认识，传统德语课堂中的词汇搭配识别也主要依赖于教师讲授和查词典。教师讲授主要使用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交际语言教学法、自然法等，大多依赖于课文与词典，即时性不足，无法随时追踪德语在使用习惯上发生的最新变化，无法全面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面对时有更新的二元词汇搭配，常常出现遗漏的状况，导致德语学习者在后续的实际应用中出现瑕疵。通过查字典进行词汇搭配习得的路径亦有缺陷，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语学习者使用频率较高的4种德德词典——《德古意特大词典》（de Gruyter 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朗式大辞典》（das Langenscheidt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现代德语学习词典》（das Pons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及《瓦里希德语词典》（das Wahrig Großwörte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中并未完全包含所有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Möhring, 2011）这一事实中窥见一斑。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德语语料库建设的广泛应用, 德语传统教学方法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挑战, 并逐渐转变为集多种教学模式与手段为一体的多模态教学, 着重培养学生的听力、口语、阅读理解、书面表达、翻译等能力。其中, 词汇/词组教学是一切外语能力的基础, 也是外语教学的重中之重。基于此, 许多学者提出了结合语料库方法进行词汇搭配的学习, 在词汇学习中引入本族语语料库, 提高学习者习得词汇搭配的意识, 增强学习者运用语料库工具搜集词汇搭配的能力, 结合母语语料库进行搭配教学等方法。

综上所述, 我们能够看出, 运用语料库搜索高频二元词汇搭配、在语料库中自行提取和识别二元词汇搭配能很好地弥补传统德语词汇教学中出现的不足与缺憾,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成为传统课堂教学有力的辅助方法和手段。有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一套基于德语语料库 DWDS 的二元词汇搭配搜索方法, 借助语料库帮助学习者建立关于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的整体概念, 探讨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教学的策略, 以期强化学生有关词汇搭配学习的意识, 提高学生的德语学习水平, 为增强德语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2. 二元词汇搭配

自从词汇搭配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 其定义就一直发生着变化。弗斯将词汇搭配定义为“基于惯常的共现关系而衍生出成语性或惯用性语义关系的独特性词语组”(Firth, 1957); 豪斯曼认为词汇搭配现象是“根据不同的语义规则和某种额外的共性形成的两个词的组合”(Hausmann, 1984)。格拉泽的看法与豪斯曼类似, 认为词汇搭配是“首选的、惯常的单词组合”(Gläser, 1986)。齐默尔将词汇搭配定义为“各个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词组”(Zimmer, 1990); 莱尔对词汇搭配的定义是:“共同出现的两个或多个任意词汇或词汇单位”(Lehr, 1993); 克拉雷将词汇搭配理解为:“一种词汇组合的典型现象……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使用频率较高的固定句法单位”(Klare, 1998)。

虽然迄今为止词汇搭配的定义尚未统一, 但经过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词汇搭配的特征已逐步明晰, 即多词组合(Polylexikalität)、紧密结合(Festigkeit)、习语化(Idiomatizität)、词汇化(Lexikalisierung)、可重复性(Reproduzierbarkeit)(Stojić & Košuta, 2013)。但这些特征与自由搭配(freie Kombination)、功能动词结构(Funktionsverbgefüge)、固定短语(Idiome)和成语(onymische Phrase)等概念的特征有所重合, 各个概念之间有着渐进式特征(图1), 虽不能为二语学习者人工识别出词汇搭配提供一个十分明确的标准, 但也可以帮助语言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几种多词组合(Mehrwortverbindung)类型予以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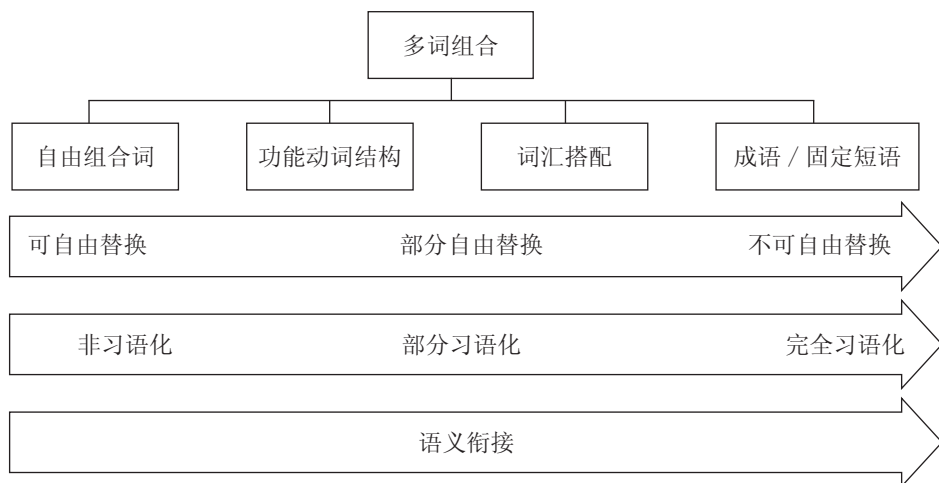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类型多词组合渐进式特征 (Stojić & Košuta, 2013)

由上述词汇搭配的定义和特点可知, 德语词汇搭配的形式多样。豪斯曼认为: 词汇搭配的构成成分在地位上不同, 有中心词 (Basis) 和搭配词 (Kollokator) 之分; 其中, 中心词在语义上是自足的, 搭配词的意义则是围绕解释中心词的 (Hausmann, 2004), 这就形成了“中心词+搭配词”的词汇搭配结构。二元词汇搭配是词汇结构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而中心词是名词、搭配词是动词的组合亦是二元词汇搭配结构中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 (Hausmann, 2004), 如开车 (Auto fahren)、结束 (Schluss machen)、省钱 (Geld sparen) 等。词汇搭配还有多元的形式, 比如向某人致意 (jmdm. einen Gruß ausrichten)、有一个想法 (zu einer Meinung kommen) 等。二元词汇搭配里也有“形容词+名词”等形式, 但受篇幅所限, 本文仅以“名词+动词”的二元词汇搭配为提取对象, 不涉及多元词汇搭配形式。

3. 基于语料库的二元词汇搭配

3.1 搜索出发词

要使用语料库中的搭配功能, 首先必须确定搜索出发词。一个由中心词+搭配词组成的二元词汇搭配既可以通过搜索中心词获得, 也可以通过搜索搭配词获得。因此, 我们在确定搜索出发词时必须将这两者都考虑在内。为了保证搜索词的代表性和涉及领域的多样性, 本研究选择《按主题介绍德语的基本词汇和高级词汇》“Grund-und Aufbauwortschatz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nach Themen” (Tschirner et al., 2008) 作为搜索出发词的来源。该书收录了 16 个日常口语交际领域中 4000 个左右的常用词汇, 标注了他们的使用绝对频次。我们在 16 个日常领域中各找出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作为中心词, 在书后所附的使用频率最高的 50 个动词中找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前 16 个动词作为搭配词, 制定出搜索出发词。

表 1 搜索出发词

	出发词	使用频次	涉及领域
中心词 (名词)	Schicksal	1983	1. Personalien, Informationen zur Person
	Verwendung	1705	2. Wohnen
	Holz	1972	3. Umwelt
	Fahrzeug	1966	4. Reisen und Verkehr
	Flasche	1765	5. Verpflegung
	Einnahme	1931	6. Einkaufen
	Anschluss	1922	7. Öffentlichkeit
	Stirn	1946	8. Körper und Gesundheit
	Bewusstsein	1929	9. Wahrnehmung und Bewegung
	Kombination	1976	10. Ausbildung
	Forscher	1999	11. Arbeitswelt
	Niveau	1979	12. Sprach
	Verlag	1987	13. Freizeit und Unterhaltung
	Erwartung	1964	14. Persönliche Beziehung und Kontakte
	Dimension	1996	15.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Februar	2034	16 Allgemeine Begriffe
搭配词 (动词)	versuchen	243	
	erzählen	242	
	bekommen	235	
	setzen	229	
	verstehen	223	
	bestehen	210	
	lernen	203	
	folgen	202	
	brauchen	201	
	arbeiten	200	
	spielen	197	
	stellen	192	
	gelten	185	
	kennen	183	
	fragen	175	
	meinen	170	

运用上述方法，作者共提取出 32 个搜索出发词，均属于德语中最常用的 1000 个高频词汇，对外语学习者十分重要（Tschirner, 2008）。

3.2 二元词汇搭配识别

DWDS 是“德语电子词典”（Digital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的简称，是由柏林 - 勃兰登堡科学院提议并制定的当代德语通用语辞典，收录语料的时间跨度为公元 1600 年至今，包含两个子库：词典库和语料库。其中语料库中收录的单词数量超过 130 亿，涉及报刊、电影评论、政治语篇等多种篇章类型。

使用 DWDS 中的双联词搜索功能，检索出与上述 16 个名词搭配频率最高的前 20 个动词，再识别出与上述 16 个动词搭配频率最高的前 20 个名词，并计算这些双联词的对数似然方程（Log-Likelihood）值，将这 32 个搜索出发词按 Log 值从高到低排列，最终从中提取出 640 个高频双联词。但是，这些双联词并不都是二元词汇搭配，其中还包括自由组合词汇、功能动词结构，因此还需要按照上文所述标进行人工筛选，找出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人工筛选字典的方法及步骤如下：

（1）在 DWDS 核心语料库 2000-2010 中查找备选词汇搭配，出现频次为 0 的搭配予以剔除。

（2）在朗式大辞典中查找第（1）步后余下的备选词汇搭配，并与母语者进行讨论，确定德语高频词汇搭配。

按照上述方法和步骤，最终得到 72 个德语高频词汇搭配如下：

Schicksal ereilen, Schicksal besiegen, Schicksal teilen, Schicksal erleiden, Schicksal überlassen, Schicksal entgehen, Schicksal bestimmen, Schicksal verknüpfen, Schicksal herausfordern, Schicksal meistern, Schicksal entscheiden, Verwendung finden, Holz hacken, Holz schnitzen, Holz sägen, Holz verfeuern, Holz trocknen, Holz verarbeiten, Fahrzeug verkaufen, Fahrzeug anhalten, Flasche entkorken, Flasche austrinken, Flasche werfen, Flasche öffnen, Einnahme erzielen, Anschluss herstellen, Anschluss halten, Stirn runzeln, Stirn wischen, Stirn tupfen, Bewusstsein wiedererlangen, Bewusstsein verlieren, Niveau erreichen, Erwartung erfüllen, Geschichte erzählen, Märchen erzählen, Witz erzählen, Anekdote erzählen, Lebensgeschichte erzählen, Liebesgeschichte erzählen, Story erzählen, Legende erzählen, Vorgeschichte erzählen, Geld bekommen, Chance bekommen, Information bekommen, Antwort bekommen, (in den)Griff bekommen, Auftrag bekommen, Job bekommen, Brief bekommen, Zeichen setzen, Akzent setzen, Ziel setzen, (unter) Druck setzen, Wort verstehen, Äußerung verstehen, Sprache verstehen, Satz verstehen, Begriff verstehen, Text verstehen, Aussage verstehen, Sinn verstehen, Prüfung bestehen, Test

bestehen, Beispiel folgen, Rolle spielen, Hauptrolle spielen, Fußball spielen, Frage stellen, Antrag stell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4. 德语二元词汇搭配教学策略

本节将在语料库搜索方法这一背景下,对德语二元词汇搭配的教学方法及指导思想进行讨论,提出提高德语二元词汇搭配教学的实践设想,以期为后续的教学及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4.1 培养词汇搭配意识

首先,教师在课堂中应加入有关德语词汇搭配的理论教学内容,帮助学习者了解词汇搭配在德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让学生明白词汇搭配是一组具备较为固定的语法结构、稳定的搭配语义以及特定的话语功能和语用条件的语言单位。其次,在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渗透词汇搭配教学,强化学生的词汇搭配意识。教师须将词汇搭配学习理念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在口语教学中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使用词汇搭配,提高词汇搭配使用频率,从而增强学生的词汇搭配意识,提高口语表达的效率和流畅度;在听力教学中,要求学生有意识地将词汇搭配记录下来,降低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认知努力;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将书面文本中的词汇搭配标记出来,帮助学生解读词汇搭配的语义及其在具体语用环境中的语法结构,加深对阅读篇章的理解;写作教学中,教师须鼓励学生尽量多地使用自身储备的词汇搭配,并注意指出学生的词汇搭配错误,保证句意表达准确。最后,在德语学习的初级阶段,结合与 DWDS 同类型的汉语语料库对同意义的汉语词汇搭配进行搜索,并将其与德语词汇搭配进行对比,加强学生对于德语词汇搭配的记忆,在进入高年级学习阶段后,须逐步转变汉德语料库词汇搭配对比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摆脱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形成德语词汇搭配使用的整体思维。

4.2 提高词汇搭配学习效率

合理运用语料库对德语二元词汇进行搜索能够提高定位和识别出真实语料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二元词汇搭配,从而动态追踪德语语言的发展变化,提高学生词汇搭配学习的即时性、时新性和准确性,进而提高词汇搭配的学习效率。具体来说,教师可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引导学生在 DWDS 语料库中搜索出高频双联词。其次,指导学生就这些高频双联词的多词组合、紧密结合、习语化、词汇化、可重复性共 5 个特征进行讨论,结合字典查询和语料库搜索等形式,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词汇搭配与其他词组形式,如功能动词结构和固定短语的语义特征异同。教师还须帮助学生了解不同类型多词组合渐进式特征,进一步细化区分现有德语专业教材中的“习语”教学部分,通过课堂探讨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非习语化、部分习语化及完全习语化的具体含义。最后,还须在母语者的帮助下完成对德语

高频二元词汇搭配的认识工作。

4.3 增强自主学习词汇搭配能力

课堂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提高词汇搭配意识，了解词汇搭配特点，提高词汇搭配学习效率和准确度，但由于时间和内容上的限制，课堂教学并不利于学生扩大词汇搭配学习的范围和多样性。有鉴于此，教师须鼓励学生在课外进一步开展词汇搭配的搜集和学习，形成一套适合自身学习特点的词汇搭配学习方法，例如：鼓励学生运用网络渠道，了解不同文本类型中词汇搭配的使用特点和规律；建议学生有意识地从真实语料中搜集德语词汇搭配，总结整理出自己的词汇搭配学习手册；帮助学生举行课外词汇搭配学习交流讨论会，共同对课外语言材料中的词汇搭配进行识别等。

综上所述，基于语料库的德语二元词汇搭配的教学一方面符合“以学生为主”的新型教学理念，能够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能够弥补字典查询词汇搭配对高频搭配词涵盖面不足的问题，扩展学生的词汇搭配知识，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5. 结论及展望

搭配是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广义的词语搭配把词语的共现关系作为主要选择标准，只要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程度，就构成搭配。狭义的词汇搭配则认为，搭配必须符合语法限制关系和本族语者使用习惯。《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中提出，教师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探索和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其中，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必要条件的语料库研究成果兴起的词汇大纲明确把短语搭配列为教材和教学的重点。本文以 DWDS 语料库为例，提出了一种结合了广义词语搭配与狭义词语搭配的德语高频二元词组识别和提取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通过语料库辅助教学方法进行二元词组教学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此方法弥补了传统外语教学中依赖教师传授和词典查询的不足，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德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概况，通过在字典中查询语料库提取的高频二元词汇或询问母语者，更加直观地把握二元词汇搭配的规约性和固定性，加深对德语二元词汇搭配的印象，提高学习效率。

语料库研究是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在外语教学的典型体现之一。未来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不同主题类型的语料库，运用该方法对语料库中的高频二元词汇搭配进行提取，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不同文体类型，了解诸如法律文本和广告文本中德语高频二元词组的特点和异同；可以运用该方法对德汉、德英语料库中高频二元词汇搭配进行对比；还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对触发词的数量进行调整；或自建语料库，运用 BFSU Collocator, Antconc 等软件进行高频搭配检索。

参考文献:

- [1] Bahns J. *Kollokationen Als Lexikographisches Problem: Eine Analyse Allgemeiner Und Spezieller Lernerwörterbücher Des Englischen* [M]. [S.l.]: Walter De Gruyter, 1996: 68.
- [2] Firth JR.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1): 190-215.
- [3] Gläser R. *Tübingen: Niemeyer* [M]. Leipzig: Veb Verlag, 1986: 38.
- [4] Hausmann FJ. Was Sind Eigentlich Kollokationen [J]. *Wortverbindungen-mehr Oder Weniger Fest*, 2004, 1(1): 309-334.
- [5] Hausmann FJ. Die Kollokationen Im Rahmen Der Phraseologie-systematische Und Historische Darstellung [J]. *Zeitschrift Fü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2007, 55(3): 217-234.
- [6] Hausmann FJ. Wortschatzlernen Ist Kollokationslernen. Zum Lehren Und Lernen Französischer Wortverbindungen [J]. *Praxis Des Neusprachlichen Unterrichts*, 1984, 31(4): 395-406.
- [7] Klare J. Kollokationen Im Französischen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Grammatik, Lexikon Und Text [C]//Figge, Udo L.et a.(Hrsg.). *Grammatische Strukturen Und Grammatischer Wandel Im Französischen. Festschrift Für Klaus Hunnius Zum 65. Geburtstag*. Bonn: Romanistischer Verlag, 1998: 309-324.
- [8] Lehr A. Kollokationsanalysen-von Der Kollokationstheorie Des Kontextualismus Zu Einem Computergestützten Verfahren/analysing Collocations-from the Collocation Theory of Firthianism Towards a Computer-aided Procedure [J].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1993, 21(1): 2.
- [9] Möhring J. Kollokationen Im Lernerwörterbuch-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J]. *Linguistik Online*, 2011, 47(3): 34.
- [10] Reder A. *Kollokationen in Der Wortschatzarbeit* [M]. Wien: Praesens-verlag, 2006: 59.
- [11] Stojić A,Košuta N. Zur Abgrenzung Von Mehrwortverbindungen/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pound Nouns and Expressions [J]. *Zagreber Germanistische Beiträge: Jahrbuch Für Literatur-und Sprachwissenschaft*, 2013, 21(1): 359-373.
- [12] Targońska J. Vom Text Zur Übung. Kollokationen in Lesetexten Und Ihre Widerspiegelung in Übungen (am Beispiel Ausgewählter Daf-lehrwerke) [J]. *Linguistik Online*, 2018, 89(2): 51-81.
- [13] Tschirner E,Perthil,Mackus N, et al. *Deutsch Nach Themen: Grund-und Aufbauwortschatz: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Nach Themen-lernwörterbuch* [M]. Berlin: Cornelsen, 2008: 1-241.
- [14] Tschirner E. Das Professionelle Wortschatzminimum Im Deutschen Als Fremdsprache [J].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2008, 45(4): 195-207.
- [15] Zimmer R. *Äquivalenzen Zwischen Französisch Und Deutsch: Theorie-korpus-indizes. Ein Kontextwörterbuch* [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0: 120.
- [16] 陈鹤. 中国德语学习者篇章写作中的词汇错误分析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 [17] 桂诗春、杨惠中. 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5-6.
- [18] 黄强. 高年级英语学生词汇搭配习得的实证性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5(4): 73-76.
- [19] 潘亚玲. 外语学习策略与方法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69-98.
- [20] 王京平. 德语学习方略及操练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5: 57-68.
- [21] 赵志勇. 概念驱动的中国德语学习者词汇学习策略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119.

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实证研究

申慧丽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00)

摘要: 本研究将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跨文化交际课程, 利用翻转课堂设置课前视频学习、课间讨论答疑、课上角色扮演、课后复习总结等各种难易程度的任务进行干预, 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融入涉外工作的典型场景中, 引导学生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 为学生后期实习与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学生成绩由网络签到打卡分、课堂抢答表现分、角色扮演成绩分、慕课在线学习分和期末考试卷面分构成。实践证明, 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 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 进而提升他们跨文化交际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 混合教学法; 跨文化交际; 翻转课堂

An Empirical Study of Blended Teaching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SHEN Huili

Abstract: This study involves blended teaching into the cours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applied to intervene through various difficult or easy tasks, such as video learning before class, discussion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during class periods, role play in class, review and summary after class, etc.. Integrating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to the typical scenes of foreign-related work will help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ture internship and work. Students' performance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MOOC online learning, classroom performance, role play and final examination paper.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flipped classroom is able to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stimulate their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blended teaching metho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lipped classroom

项目基金: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跨文化交际 MOOC 课程建设与翻转课堂教学研究”(课题编号: Hnjg202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申慧丽, 女,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

0. 引言

跨文化交际是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其目标是帮助学生在广泛接触和了解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强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世界其他文化的开放、包容、理解和欣赏，培养全球意识，同时将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情感态度转化为能力，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统的跨文化交际课堂多以教师讲授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学生在被动接受大量知识输入的状态下，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往往不容乐观。因此，构建一个适应职业需要和学生需求的跨文化交际英语教学模式势在必行。2002年，史密斯与艾勒特将电子学习（E-learning）与传统的学习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的概念（Kaur, 2013）。混合教学法主张：学习者本人作为学习的主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学习；教师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组织者（organizer）和一个学习伙伴（partner）。创设情境、模拟体验是教学的前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前后设定任务为导向，以混合教学法为方法，对传统授课模式做出较大变革。选取外国语学院2017级英语专业两个平行班共76名学生为教学测试改革的对象，两个班各有学生38人。两组学生的年龄及前期测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以跨文化交际教学中的任务为导向，将整个班级随机分为6组，每组6-7人。教师在开课之初明确告诉学生这门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方式，在不同教学环节采用案例教学（CBL）、问题式教学（PBL）及PPT讲解等混合式教学法，实现“课堂教学任务化”的基本模式。对照组保留传统教师讲解式授课教学法，即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对教材内容进行语法翻译，课后布置常规作业辅助巩固。课程结束后采用课程评价调查问卷、学习动态自动跟踪统计及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教学效果测试。

2. 教学设计

根据学情分析和产出任务，实验组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过程分为3个部分：课前、课中和课后。

2.1 线上课前

课前“任务驱动”，教师在智慧树平台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一是登录课程网站观看教师提前录制的教学视频，每个媒体文件长度为8-15分钟，了解1-2个关于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重难点，完成自主学习；二是观看过程中完成相关知识点弹题及线上自测题，便于教师根据自测题完成的具体情况开展后续线下教学。在此过程中，平台会自动统计学情数据，实时更新学生的观看时长与学习情况，便于教师跟踪管理，进而逐步引导学生培养自主学习意识。

2.2 线下课中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重新调整了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到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前完成自主学习，教师不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知识点，而是专注于既定主题的内容，与学生一起讨论课前遇到的问题，确保了课堂单位时间的最大效用。使用课堂翻转工具如弹幕、投票、随机抽签等，极大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与互动性。另外，根据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中“轻量级的任务在家做，重量级的任务在有老师的课堂上完成”的原则（安德森，2009），将简单的记忆理解等知识任务放在课前，将较难完成的应用分析等认知任务放在课堂上，以便老师在场提供帮助。课后通过小组合作模式实现评估创造，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

以跨文化交际第五单元的内容：文化维度为例，课前利用视频引导学生了解文化维度的来源、定义等基础知识，线下课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课堂互动学习，依次完成以下任务：

投票问答之模拟抢答。参考《一站到底》等知识挑战类节目，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每次派一人轮流抢答，确保每组成员都有发言机会。通过设置几轮问题，如“Students from which culture are more likely to ask questions in classroom?”“When dealing with interpersonal problems, people with which orientation tend to use confrontational strategies?”测试课前学习成果，调动学习气氛。课前的自主学习是知识内化的基础，也是课堂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

案例分析之角色扮演。案例分析是一种探究式的教学法，起源于哈佛大学的情景案例教学课。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中，差异问题具体化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思辨和沟通协调能力。学生首先熟知案例的背景和内容，并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经独立思考后完成团队合作。例如，在用文化维度理论进行案例分析时，学生首先要清楚《安娜与国王》《刮痧》等经典影片的情节，思考其中反映的文化冲突——阳刚对阴柔（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等；然后分小组进行角色扮演。参与性的课堂案例分析中，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学生，教师仅仅起到辅助和协调的作用。这与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不谋而合。学生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增添了理论学习的趣味性。

2.3 线上线下课

每堂课布置明确的随堂任务，如讨论不同谚语背后反映的价值观差异，学生独立思考后，以小组为单位制作PPT上传汇报。准备展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疑点可通过智慧树问答讨论平台、微信及钉钉平台进行互动和讨论答疑。课堂最后环节，教师对任务的展示进行详细的评述，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其他小组成员也针对学习内容提问、评价和提出建议，达成师生互动、小组互动的目的，进而提升学生思考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最后小组间互相打分，分数计入平时成绩。

教师对课前、课中和课后数据进行统计及多维度分析，以便及时反思改进。

表 1 教学过程图解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程准备阶段	课前学习阶段	教学阶段	研讨总结阶段
执行者	教师	学生	教师 + 学生	学生 + 教师	
执行任务	备课	观看视频	学生为主体	教师点评	
		录制教学视频	预习内容	教师引导辅助	小组互评
		设计针对性练习	完成弹题	翻转教学工具	学生自评

3. 教学效果

教学任务完成后，通过问卷形式对两组学生进行调查，并通过理论考试对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教学效果测试。针对两组学生共发放 76 份调查问卷，并当场收回，回收率与问卷有效率均为 100%。问卷内容包括：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教学内容的安排能否分别有助于对复杂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团队合作意识、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增加学习工作量。每个问题分 3 个等级，分为非常同意、同意和不同意。

表 2 问卷调查内容与结果

调查内容	实验组			对照组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教学模式满意度	30	8	0	6	16	16
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26	7	5	10	20	8
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25	8	5	6	15	17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29	5	4	7	13	18
激发学习兴趣	32	5	1	6	10	22
提高学习效率	28	6	4	10	12	16
促进自主学习能力	31	3	4	6	15	17
增加了学习工作量	23	8	7	19	7	12

课程结束后，实验组 78% 的学生对混合式课程教学模式表示非常满意；86%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有助于对复杂理论知识的理解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89% 的学生认为有利于培养团队合作，有助于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的提高；97% 的学生认为自己跨文化学习更有兴趣；同时 81% 的学生认为学习工作量因此加大。对照组学生则多数对教学内容安排满意度一般，认为各方面提高不明显。有趣的是，虽然对照组学生没有课前任务，仍有 68% 的学生觉得学习工作

量较大。

表 3 考试成绩比较

	总人数 (人)	平均分		标准差		显著性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实验班	38	63.22	71.83	12.092	11.443	$p < 0.05$ 有显著性
对照班	38	63.09	65.30	9.021	7.474	$p > 0.05$ 无显著性

期末考试采用卷面答题,包括简答、判断、案例分析、阅读理解等题型,学生最终的卷面成绩计入该课程的过程性评价结果。从表 3 数据可知,前测时实验班与对照班平均分差别不大,仅相差 0.13 分,差别基本可忽略不计,说明该班英语成绩跟对照班相比无明显优势。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任务型教学试验后,实验班后测平均分远高于对照班,较之前提高了 6.53 分,说明实验的教学效应大。通过考试成绩比较发现,实验组在知识点掌握及试题准确率上具备明显优势,尤其在案例分析方面,他们能够更准确地分析到核心要点,而且简答题的正确率也更高,可见实验组在任务引领下每堂课重难点掌握得更好一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方面,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比以听教师讲解为主的教学起到更好的作用。以任务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比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教学效果更好。混合式教学不仅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4. 讨论

4.1 关于教学测量与评价体系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跨文化交际混合式教学主要采取成果导向评价的方法,实现产出任务多样性,最常用的任务一是分组讨论并制作 PPT 汇报,二是角色扮演,根据需要分析案例材料或者影片片段,展现差异分析原因。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观察、记录和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课堂表现,占总成绩的 40%;学生课前线上任务完成情况占 20%;针对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和产出结果进行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共占 30%。学生在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基础上对产出任务做进一步改进并在课后进行自我评价,通过独立思考巩固本单元重难点,加深对文化维度的认识 and 了解,此部分占 10%。评价体系主要是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通过系统跟踪统计和测试来培养学生对学习过程负责的好习惯,其中反映的问题也为教师教学设计提供一手资料。

4.2 混合式教学法的可行性

布鲁姆曾指出,成功的外语课堂教学应在课内创造更多的情景,让学生有机

会运用所学的语言材料,体会跨文化语境下的真实交流(Bloom, 1948)。因此,跨文化教学课堂应该创造各种机会模拟真实的交际情景下学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引导学生不断修正不当的交流方式。研究结果显示,混合式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多元互动性、学习兴趣的激发、团队合作的培养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学生通过课前任务设定、课上小组展示和课后评价总结,全程参与课程,虽然学习工作量有所增大,但在学习目标的实现与学习效率的提高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突破性意义。传统的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课前未充分了解课堂内容,课上被动接受语法词汇等知识的灌输。虽然课前任务少,课程进度快,但缺乏师生互动,学生依旧明显感觉课程压力大,其压力主要源自对背景知识的认知不足,进而导致跟不上课堂进度或者对知识掌握不够透彻。混合式教学法通过实物演示、互动操作、案例分析、情景对话等将教与学巧妙结合起来,以学生为主体,能够有效加深其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学习跨文化的兴趣与热情。

4.3 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

自学能力是在求学时期及日后职业生涯中进行学科学习和经验汲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余欣然, 2018)。在混合式教学法的应用中,教师课前会结合学生情况进行自学指导,提供相关主题文献资料,明确核心知识点,以保证自学的质量。打破时空界限的翻转课堂新模式使教师不再仅仅是学科专业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主动学习和自主探究的引导者、组织者与对话者。信息技术背景下对传统课堂结构的重心前移和流程再造,学习任务单、微课、云平台、合作学习、反馈评价等对师生而言都是有效的尝试与探索。通过课前重点知识点的微课预习、课上的讨论表演、课后的解惑答疑,学生们得以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进步与发展。其中 97% 的学生都表示挑战与趣味并存,虽然每次演出压力很大,但沉浸式学习让语言与专业知识的习得事半功倍。学习氛围更加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学习成为积极、有意义的过程。课前的团队任务让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小组协作完成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4.4 对教师的要求

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实现混合式教学的核心。埃文斯和圣约翰认为,混合式教学法的教师不仅应该是合格的英语教师,更应该成为合格的课程设计者,为学生提供实用的教学材料,成为学生的合作伙伴,根据教学需要对学生们的学习情况进行适时分析和总结(Evans & St. John, 1988)。以文化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是有效适应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其中培养学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是最不容忽视的。在教学活动中,一方面要根据授课内容加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渗透,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跨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沟通;另一方面,教师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利用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全方位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逐步学会利用碎片化时间，巩固课堂学习效果。充足的背景资料的补充与有效的课堂设计引导是混合式教学成功的关键，教师要突破传统教学法的束缚，适时引导师生互动，进而逐步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5. 结论

“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英语教学模式往往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从而制约了教学效果。混合教学法通过设置任务，对课堂前、课中、课后整个过程进行改革创新。实践表明，将讲授、实践、自主学习3个环节进行有机整合的混合式教学可以顺利实现教与学之间双向信息的传递。混合式教学在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中的运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口语交际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 [1] Benjamin Bloom. *Teaching by Discussion*. Chicago, Illinois: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8.
- [2] Dudley Evans & St. John. *Development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 Kaur, M. Blended Learning: Its challenges and future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1).
- [4] 洛林·安德森.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5] 余欣然. 高校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J]. *新闻爱好者*，2018(10): 117.

“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下专业英语综合课程 思政教学实践探索

贾秀丽

(安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 高校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是顺应新时代的教育要求开展起来的。该思想把知识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进行有机结合, 要求教师有意识地对 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领, 并能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探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相辅相成。本文综合考虑目前高校专业英语综合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尝试找到英语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是外语教师在课程设计和课堂实践中结合高校所处的地域特点进行的阶段性探索。

关键词: 三位一体; 综合课程; 思政教学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of Integrated Courses for Professional English Based on the Trinity Educational Concept

JIA Xiuli

Abstract: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is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era. With this idea, knowledge instruction and language ability are integrated, and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consciously guide students' values and conduct in-depth cultural discussions.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of knowledge instruc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complement with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of integrated cours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integrated courses for college English majors, an entry point between English course teaching and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has to be defined urgently. This paper is a phased explor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course design and classroom practice combined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rinity teaching concept; integrated course; teaching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作者简介: 贾秀丽, 女, 安阳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1. “三位一体”教学理念与思政教学

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结合起来的“三位一体”教学理念是高校开展外语学科教学的基本理念。知识传授从学生盲区着手，能力培养要层层递进，价值塑造则是通过内在引领来实现。这些都不是单纯依靠语言表述的，而是通过教师的教学行为过程逐渐推进，最终帮助学生培养起来的。2020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要坚持立德树人，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在学科教学体系构建中，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思政建设的具体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新思想的提出与我们一贯倡导的“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并不冲突，而是对其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外语学习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外来思想，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决定了英语课程思政与其他专业课程思政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作为高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英语教学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特点。目前高校教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过多地对英语国家文化加以引导，加上信息化时代资源获取的便利以及媒体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多元化输入，导致学生无法客观、思辨地审视和评价外国思想和文化，有时忽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缺乏文化自信。不少学生能够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外国故事，却无法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当代高校英语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丰富的语言文化知识以及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能帮助学生找到静态的语言知识学习和动态的语境内容表达的契合点；从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的角度来说，合格的英语教师还要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广泛的知识面，具有家国情怀，对世界和人生要有端正、严肃的态度，具有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这是新时代赋予英语教师任重而道远的使命。

国际化视角是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特殊性，更是其优势。外语学习让中国的大学生更好地掌握一手国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资讯，从世界角度看问题，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树立文化自信，表达中国的理念和方案，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做好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授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一定要找好切入点，把立德树人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其中（肖琼、黄国文，2020: 11）。

2. 专业英语综合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笔者所在高校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选用的是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5和6两册教材。每单元文章从词汇到句法再到语篇，都会给学生带来极大的思考空间，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语言及文化探讨，

有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同时也对教师的专业修养及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新编英语教程6》中第七单元“Beauty”一文为例,具体阐述如何把思政教学有效地融入专业英语综合课程中。

本单元课程设定的知识和技能目标是通过追溯“beauty”一词由古至今的语义变化,了解现代人对两性不同的审美习惯,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审美习惯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梳理出作者在探讨抽象话题时的逻辑思路。通过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笔者希望从课程知识里引申并融入当今社会人们对于“美丽”这一抽象概念新的理解和阐释,结合奥运比赛中体现的运动之美,将健康正确的审美观与选秀节目中扭曲的审美观进行对比,引导学生通过客观思辨,多元化地理解美、欣赏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强个人自信和文化自信,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及价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思政教育的目标。

本节课的教学实施过程可以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部分。

本课程已被列为校级精品课,并在校园网精品课平台开放运行。教学采用混合式教学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并重。因此,学生需要在课前通过在线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完成线上任务,进行预习和学习。教师上课时首先进行话题导入,然后通过课文讲解和主旨分析,设置课堂小组讨论话题,随后鼓励小组展示等,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美”这个词。同时,结合奥运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们表现出的力量之美和运动之美以及当今民众对于美丽的全新理解,将中国人民包容的心态与积极健康的审美理念有机融合。把思政元素具体融入到课堂讲解,内容细化如下:

2.1 话题导入——了解汉字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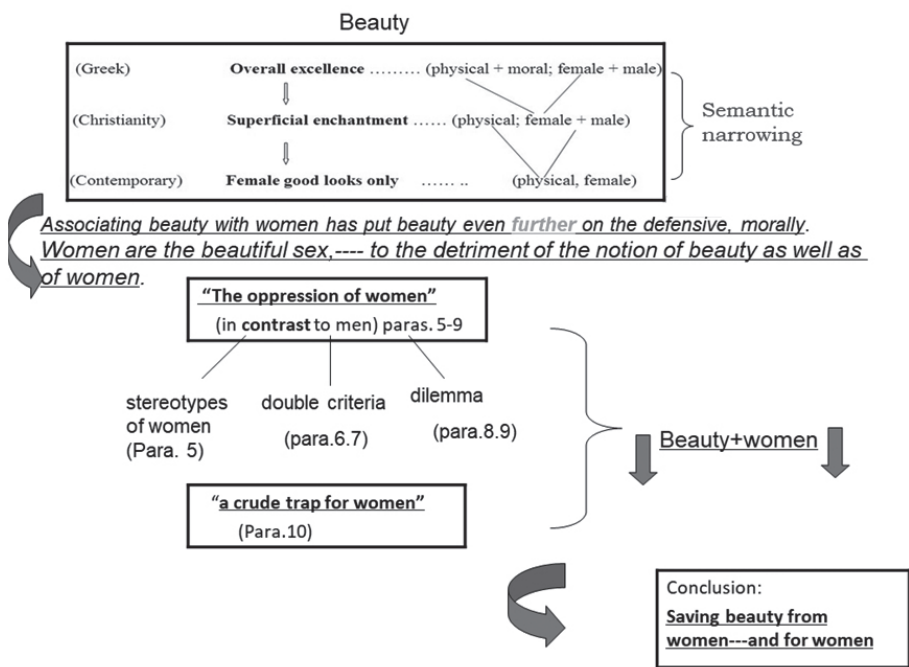
本单元标题是“Beauty”,探讨了“美”这个永恒不变的话题。不同时代背景的人对这一抽象话题的讨论都不相同,很难形成定论。文中作者先从词汇层面探讨了“美”的词义变迁,然后通过语段之间的有效衔接,自然而然地引出美丽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课文作者从古希腊人关于“beauty”一词的定义开始讨论,笔者受到启发,在设计课前导入时,对比中国汉字几千年的书写变化,结合所在高校的区域特点,课前向学生展示了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形式——甲骨文。在甲骨文中,“美”写作,表示头戴花饰的人,那么美是如何与女人联系在一起的呢?我们再来看“女”这个字。甲骨文中的女写作,一个跪坐的形象,双手环抱于胸前,身段优雅,姿态温良贤淑,给人以美的感觉。可见古人在造字之初,就赋予“女”字美的色彩,并不断引领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由此可见古人评价美的标准:体态优美,性格温良,是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结合。通过这种讲解,教师引导学生学会欣赏汉字之美,感受汉字的魅力,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学生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更浓厚的兴趣,进而在教师的引导下思考现代人对于美、对于女性的看法是否

有所变化，顺利进入课文的学习中来，并能快速抓住作者的写作思路，把握文章脉络，深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2.2 课文讲解与主旨分析——把握文章脉络

结合全文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其主旨：作者开篇直奔主题，从古希腊人对“beauty”一词的定义理解（Para. 1），到现代人对美的观念（Para. 2），以及现代人们对两性不同的审美习惯（Para. 3），层层递进，“美”的内涵意义被不断缩小，从而揭露出扭曲的审美习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影响（Paras. 4-9），最后呼吁人们正确看待美，不会陷入错误的审美思维怪圈（Para. 10）。

课文思维分析导图如下：



2.3 课堂小组讨论——渗透思政元素

教师在课堂讲解过程中发布小组讨论任务，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并分享自己的见解。针对本节课所讨论的主题，笔者设计了两个活动：

(1) 对比中英文“beauty”和“美”两词的内涵意义，结合生活中的例子，讨论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美的不同理解，从而引导学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美美与共”的大美世界；

(2) 结合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所表现出的运动之美、力量之美、拼搏之美，对比各大广告及综艺节目中宣扬的美，探讨美的真正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增强个人自信和民族自信。

在随后的学生小组展示中,基于导入和课文分析,学生基本能流畅表达自己的见解,有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达到预期的思政教学目标。

2.4 课后专题研究——拓展知识积累

在课文分析及话题讨论后,课后要求学生进行线下学习。思政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过度重视文化价值、忽视语言学习的现象。因此,除了课文中涉及的相关语言表达,教师还分享了2020年《经济学人》上发表的一篇探讨审美标准单一化的文章让学生进行拓展阅读,从以下3个层面完成基本的语言知识学习,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词汇层面——积累同义替换词,丰富词汇;

句法层面——分析长难句,化繁为简,理解文章大意;学习灵活变化句式,改变习作中句式单一的现象;

语篇层面——分析外刊写作思路,尝试画出语篇思维图,增强习作的逻辑性。

2.5 线下写作训练——导向产出学习

我国外语教学长期遵循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忽略了本国语言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导致创新发展不足。文秋芳教授(2015)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为学生增加了学以致用机会,注重语言教学的育人功能,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培养学生说、写、译表达性技能的同时,将人的发展作为外语教育的终极目标,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笔者在引导学生理清文章写作思路后,通过为学生推荐课外拓展阅读资料,指导学生积累相关话题素材,结合中国国情及社会热点,写出有深度的文章。本单元探讨“美”这一抽象话题,从概念理解开始,结合选秀节目,深入探讨部分民众扭曲的审美价值观产生的原因,指出这种价值观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最后提出纠正这一价值观的正确措施。教师采用详细讲解一两篇学生习作和生生互评的方式,帮助学生分析写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升高年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增加其思考的深度和文章的内涵,实现“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教学理念的融合。

2.6 教学效果反馈

本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法,“线上”与“线下”结合,“课内”与“课外”并重,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采用产出导向法,引导学以致用,拓展思维深度。在导入过程中,结合安阳地域特色,分析甲骨文字造字本源,吸引学生兴趣并自然而然引出作者在文章中探讨的主题;课文讲解及分析过程中,结合新闻时事及社会热点,对比中西方审美的不同,引导学生重新审视自己,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美美与共”的多元世界,增强个人自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本单元课程设计集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深入浅出地分析抽象话题,拓展学习者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英语专业高年级

学生听、说、读、写、译等专业语言素养及思辨能力。

通过灵活的教学模式，教师弱化单一的语言分析模式，旁征博引，从汉字造字本源讲起，引发学生对汉字研究的兴趣，树立文化自信，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因为线上线下教学方式的变化，学生课后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更多新闻时事，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教师继续发挥引导者的作用，鼓励学生结合奥运赛场上运动员们表现出来的运动之美，修正错误的审美观，让学生不再为自己的外貌不符合当下审美标准而感到自卑，从而增强个人自信，培养乐观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这种“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模式，有效地将课内语言学习与课外拓展阅读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及写作能力，教学效果更为理想。

3. 结语

本文讨论的是对一篇抽象主题的课文如何进行有效教学，包括导入、课堂设计、课后拓展阅读与写作等，是对教材新的演绎和呈现。笔者认为当代英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人文修养，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并加以合理的创造性设计，才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思政教育融入英语课堂，实现外语课程思政中的显性呈现和隐性呈现的有机结合（文秋芳、孙曙光，2020），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人文素养。刻意追求思政教育会适得其反，这也是每一位外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崔永光，韩春侠. 英语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与实践研究——专业核心课程“英语精读Ⅲ”为例[J]. 外语教育研究，2019(02): 19-24.
- [2] 黄国文. 思政视角下的英语教材分析[J]. 中国外语，2020(05): 21-29.
- [3] 李观仪. 新编英语教程 6[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 [4] 林忠，王美娇.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英语专业课程思政——以“基础英语”为例[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 111-116.
- [5]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04): 547-58.
- [6] 文秋芳，孙曙光. “产出导向法”驱动场景设计要素例析[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0(03): 4-11.
- [7] 肖琼，黄国文.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2020(05): 9-14.

英语语调可视化研究综述

周晓凤 刘 畅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随着计算机辅助语音教学 (CAPT) 的发展, 在语音教学中, 以 CAPT 为工具结合教学实践的新教学理念不断出现, 可视化研究应运而生,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语言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关注。语调作为语音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与可视化技术结合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目前, 国内外英语语调可视化研究的总体状况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突破, 然而大多研究停留在学术理论层面上的探讨, 基于教学实践的应用型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增加与拓展。

关键词: 英语语调; 计算机辅助语音教学; 可视化

The Review of English Intonation Visualization

ZHOU Xiaofeng LIU Chang

Abstract: Recent years has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ssisted pronunciation training (CAPT), so the new teaching concepts with CAPT as a tool combining with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speech teaching are emerging. Therefore, the latest study of visualization has aroused the concern of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language educators and learner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English intonation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has been som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this area. However, most researches focused merely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the applied researches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both in quantity and in depth.

Key words: English intonation; CAPT; visualization

项目基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方言区英语学习智能语音习得机制的跨学科研究”(编号: 15ZDB103)和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中国东北英语学习者语音偏误类型和训练策略研究”(编号: JJKH20190219SK)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晓凤, 女,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博士, 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实践语音学、英汉翻译和英语教学等研究。

刘 畅, 女,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0. 引言

英国语言学家罗杰·金德姆曾说过：发音是语言的身体，而语调是语言的灵魂（Roger, 1958）。我国著名语音研究者周殿福（1985）先生也认为语调的研究是语音研究各方面的总和。由此可见，英语语调在整个英语语音体系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语调对二语学习者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的英语语调教学主要采用教师对语调功能及种类的讲授和学生的反复聆听模仿两种模式，然而学生是无法仅仅从听觉上真正感受到语调变化的，因此出现了学习者口语水平明显滞后，与其书面英语水平不成正比的现象。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CAPT）走入了学者和教师们的视野，语调与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的结合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语调可视化技术的研究逐渐在国内外发展起来。可以说，可视化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仅从听觉感受语音变化的单一性语调教学模式。学习者通过语音分析软件呈现的频谱图，可以从听觉和视觉双重感官上感受语调的变化。前人的研究表明，语音反馈在语音语调习得中至关重要，而计算机辅助发音教学突出了其语音反馈的优势。本文重点整理和归纳了语调可视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对语调可视化研究未来发展的思考，希望可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1. 国外语调可视化研究

1.1 语调可视化研究的起源

国外对于语调可视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凯斯·德·波特曾指出：在这一时期，许多用于语音分析的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即电子技术在语音科学中的大规模应用已经成为可能（Kees de Bot, 1980: 36）。在这一时期，语言学者、音系学者、语音学者以及电子工程师，都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语调和语调研究上。

语调可视化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研究者针对失聪学习者的学习特征、能力限制的研究。最初研究者例如飞利浦和普罗诺佛斯特提出，视觉模式匹配可应用于失聪学习者的语调教学中（Phillips & Pronovost, 1971）；此后，语调概念在语音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多重视，研究者安德森（Anderson, 1960）、阿伯顿和弗森（Abberton & Fourcin, 1975）进一步提出语调可视化能够辅助听力受损的人正确发音。随着技术手段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视觉语调显示系统不仅对失聪学习者的语调教学有益，也对外语语调教学有极大帮助，他们指出：如果音高轮廓的显示方式仅代表与听觉相关的特征，那么视觉反馈在语调训练中可能是非常有效的（Spaai & Hermes, 1992: 27）。利昂和马丁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语调的视觉呈现使我们将封闭的语言社区中共有的特定听觉手势转换为能够被普遍符号学社区解码的视觉手势，从而建立一个基于模式识别理论的自动判断系统

(Leon & Martin, 1972)。这一想法在后来的语调可视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凯斯(1980)对视觉和听觉反馈在语音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进行综述时指出:尽管有一些学者表示,语调可视化装置的应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以确定这些装置的实用性。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语调可视化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一系列软件和硬件系统的更广泛的使用,语调可视化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2 语调可视化研究的发展

随着研究者对语调可视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解释频谱图的框架需求,仪器分析与语调模型的结合应运而生。瓦尔达尼安早在1964年就测试过在语言实验室中使用基频提取器作为教学辅助设备的可能性,他提出的实验假设是:“语音语调模式的呈现能够提高外语使用者学习正确的英语语调的能力”。他在实验后还尝试将这种技术应用到二语教学中。但是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基频提取器可能并不能对学习产生促进作用,他认为实验中的样本较少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了实验结果(Vardanian, 1964: 112)。由此可知,早期的关于语调可视化的研究还不太成熟,正如语言学家凯斯(1980)指出的:这一领域还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研究,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这些装置的实用性。因此在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学者以母语非英语且二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检测实现语调可视化的仪器对外语教学的作用。

比较著名的凯斯和梅尔佛特(Kees de bot & Mailfert, 1982)在荷兰和法国进行的实证研究,受试者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他们被要求模仿12个英语句子,侧重语调模仿。对照组接受前测和后测,实验组接受前测、13分钟的语调介绍录音和后测。语调介绍录音参照了(T' Hart & Collier, 1975)开发的语调模型,关注:音高变化的方向(上升、下降或水平)、范围(高或低)、速度(突然或渐进的变化)和位置(句子、单词或者音节)。结果表明,尽管录音介绍只是与语调的感知有关,但实验组的学生在语调上有了显著的改善($p < 0.2$, t-test)。凯斯和梅尔佛特的实证研究为语调可视化教学的实现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凯斯后续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开展语调可视化研究树立了信心,在之后的几年里,研究者在语调可视化教学领域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语调教学中,视觉听觉结合的反馈要明显优于单一的听觉反馈,即语调可视化对学生语音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作用。

罗卡(Rocca, 1998)考察了可视化教学在巴西学习者英语语调教学中的使用情况,结果表明,学习者在经过10周的可视化教学训练后,语调上有了显著的进步。西川谷口和阿尔伯顿针对日本英语学习者进行了研究,在为期两周的课程之后,他们发现:每天有1小时互动视觉反馈的学习者组与没有互动视觉反馈的学习者组在语调改善方面有很大差异;声调标记的使用对学习有很大帮助,没

有声调标记，没有交互式视觉反馈，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很难提高；但是通过使用交互式视觉反馈，即使没有声调标记，学习者的口语水平也会明显提高，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语音基频模式的交互式视觉反馈在帮助日本英语学习者提高英语语调方面的有效性是十分可观的”（Taniguchi & Abberton, 1999: 89）。

上述的实验结果表明，尽管受试者的母语语种不同，但是语调的视觉反馈系统对二语学习者或外语学习者的语调改善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语调可视化仪器对于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帮助的。

语调可视化的关注度得到提高，一系列的软件也应运而生，逐渐进入到大众视野。WASP 和 Praat 等产品可以免费下载，VisiPitch 和 SpeechViewer 等其他面向教学的软件也可付费购买使用。这促进了研究的发展，学者们纷纷利用课堂，通过教学实验来进一步检验这些软件对语调教学的有效性，例如，古尔金等学者对 Praat 提高学生英语韵律习得方面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实验组在 Praat 的辅助下，韵律节奏明显要强于对照组；通过 CALL 方法练习重音和语调的学生比通过传统方法进行学习的学生进步更明显（Gorjian, et al., 2013）。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学者们也将关注点从仅利用语音分析软件分析频谱图、基频图等较为基本的层面转移到专业性较强的语调可视化模式与教学相结合的有效性上来。例如：兴克斯和埃当利用灯光闪烁代替了音高曲线的直接呈现来突出对比效果，平淡的语音会使系统显示黄灯，而更富有表现力的语音会产生绿光（Hincks R & J. Edund, 2009）。这种语调可视化的呈现和之前学者研究的语调基频图呈现相比，视觉冲击感会更强、更直接、更便于学习者理解。他们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这种类型的视觉反馈对于学习者语调的把握、口语能力的提高都是很有帮助的。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日后语调可视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1.3 语调可视化研究的突破

“虽然提取音调旋律的技术在 20 世纪后半叶继续发展，但语调研究的设计基本上没有改变。语调系统主要被认为是由话语的语法形式决定的一系列音高对比（例如陈述式与疑问式，以及 wh- 疑问句与是非疑问句）”（Levis & Pickering, 2004: 508）。由此可知，语调可视化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用于分析和辅助学习符合语法的句子，例如瓦尔达尼安（Vardanian, 1964）就以句子为研究对象，列出了陈述句和疑问句的语调模式。前文中提到的做了大量实证研究的凯斯·德·波特和同事们的研究也是以句子为主的，即通过观察分析陈述句、疑问句等句子的语调变化来进行研究。但是，在此期间，基于语篇的音韵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人员却在探索韵律在语篇中的作用。彭宁顿（Pennington, 1989）指出，计算机既可以提供言语产生和言语感知方面的培训，也可以创造促进互动的环境。他还进一步强调语言学习软件不仅要为学习者提供听力练习，还应该鼓励互动、进行声音对比，或利用语调来突出意义的细微差别。这里的互动环境以

及语调代表的意义差别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语境,换言之,计算机语音技术为语篇、语调分析提供了可能性,这也初步表明语调可视化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句子分析,还可以扩展到语篇层面。赫尔利(Hurley, 1992)、洛夫迪(Loveday, 1981)以及凡贝珍(Van Bezooijen, 1995)等学者也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在语篇、社会交际中所呈现出来的语调差异可能会避免产生跨文化误解,进一步证明了语调可视化在语篇研究层面的重要意义。陈在1998年对融入语调教学的4个音高可视化应用技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被后来学者概括为:为学习者提供视觉反馈;为学习者提供“真实而广泛的演讲”;使用计算机重新记录和分析扬声器之间的互动;使用计算机监控学生的进步(Chun, 1998; Levis & Pickering, 2004)。这4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调可视化技术在语篇音调分析方面的实用意义。关于可视化技术在篇章语调分析中的应用,许多学者的研究或者著作中都有一定的涉及,例如布莱兹(Brazil, 1975)和皮克林(Pickering, 2001)等,这是语调可视化技术应用领域的一个进步和突破。

语调可视化技术的另一个突破是语音数据可视化的一个突破,即将语音可视化技术与R技术相结合,利用R技术对语音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吉列尔梅·加西亚在《第二语言中的可视数据及分析》(Data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in Second Language)书中提到一个设想,我们将探索使用可视化技术和统计模型进行定量数据分析(Guilherme, 2021)。可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为可视化研究带来难以想象的突破。

2. 国内语调可视化研究

随着实验语音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语音可视化技术在近十几年间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国内在语调可视化这一更具体领域的研究还较少。就笔者收集的相关文献来看,国内语调可视化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2.1 可视化理论的推介

国内关于语调可视化的研究,部分成果主要是对可视化理论的推介,是评价性或归纳性的文章,例如蒋红柳(2009)、张力、张新勇、马海燕(2020)等介绍了语音实验软件系统如何在英语语调教学中应用;李珍(2014: 99)指出:“语音分析软件可以实现对整体语流的测评”;徐文丽和李珊俊(2011: 75)也指出:“语音分析软件可以呈现句子重音分布、调群切分、调核音调、停顿次数和时长等方面特征的可视化语图”,这体现的就是语音分析软件与语调的结合。可见,这部分学者属于较早关注语调可视化的学者。

2.2 语调可视化研究的进展

近年来,语调可视化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例如:庄木齐、卜友红(2011),

李斌、王国英、白爱娃（2018），刘丹（2019）等学者都通过实验研究探讨了语调可视化的问题，特别是可视化在英语语音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程度上有所加深，然而，多数研究都是尝试性和探索性的，普遍的不足在于研究对象数量较少，结果的可推广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2018年，在李斌、王国英和白爱娃的《基于Praat的英语语调可视化自主学习对英语语调习得效果的影响研究》中，受试对象只有5人，由于样本数量较少，结论的推广性相对不够。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完善，例如杨昊昕的《语音可视化技术辅助英语语调习得的有效性研究》无论在研究设计、样本数量，还是在理论基础等方面都有所进步，研究切实证明：“可视化的教学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对于受试者语调能力的提升有较大的帮助”（杨昊昕，2020: 90）。由此可见，近几年学者们对语调可视化的关注在不断增加，研究也逐渐完善，无论是研究过程还是研究结果都在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同时，我们还应正确对待以往研究成果，正因为有前人的不断探索，后来的学者才能不断进步。

纵观该研究领域，语调作为英语语音学习的重要方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语调可视化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还需要学者们不断探索和研究。

2.3 语调可视化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笔者在查找、阅读相关资料时发现，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让可视化语音教学能真正走入课堂，帮助学生提高其口语表达能力。当前可视化技术在英语教学上的应用，主要还是以多模态教学手段为主，例如PPT、图片和视频等课堂辅助。随着计算机辅助语音技术的发展，与其结合的或利用语音软件（如Praat软件）的英语语音教学的研究开始增多，例如武婷婷（2020）、嵇艳（2015）等，研究者们纷纷探究了类似Praat这种语音分析软件在课堂上对改善学生发音的辅助作用，开始利用可视化的语音图来使抽象的语音教学形象化，尝试跳出传统语音教学的禁锢，但是大多研究只停留在学术理论的探讨层面，缺乏基于教学实践的应用型研究。此外，研究主要是基于Praat软件对英语语音的整体描述，特别是音段层面的探讨相对较多，多探讨音段层面的研究，而语音的超音段层面的研究和系统化的可视化教学设计有待进一步发展。

3. 英语语调可视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其辅助教学功能的应用也有了很大突破，其中计算机辅助语音教学研究就是一个较新的发展方向，近几年备受学者和研究者的青睐。例如葛淳宇等（2018）分析了INTSINT和ToBI等标注体系出现之后语调类型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调研究与可视化技术的结合，即语调可视化研究。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还主办了声调语调问题研讨会（2019年、2020年、2021

年都定期举行), 期间学者们和与会人员纷纷探讨了语音语调问题, 特别是语调可视化的研究和发展, 如丁红卫、熊子瑜、赵晨阳等就可视化研究进行了专题报告, 体现了国内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 同时也展现了国内学者的语调可视化研究开始向更深层次发展, 其内容不仅涉及语调本身, 还涉及到社会外在环境对语调的影响, 预示了语调可视化发展前景。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赵晨阳博士及其团队目前对可视化语调教学的研究, 他们结合英语语调教学开发了可视化语调教学软件——Euronounce project, 这一工具可以通过可视的图形, 将句子的频谱图更立体、形象地展现出来, 以此凸显语调的不同变化, 其中音频的音高、音强、音长等都可以用可视图形体现出来, 这一展现形式比频谱图的视觉冲击力更大, 而且该团队还通过教学实验初步证明了这样的训练会对学习者语调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做法与前文中提到的兴克斯和埃当利用灯光闪烁代替音高曲线的直接呈现有异曲同工之处, 代表着计算机辅助语音教学真正走进了课堂。

研究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笔者认为,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仅停留在将频谱图转化成相对简易的图示是不够的。利用计算机技术, 结合多模态理论的指导, 我们可将视觉与听觉或触觉都考虑进来, 设计出多感官、多模态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更有效地将音高、音强、音长等这些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当然这其中包含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 以及其他一些实际困难, 所以该领域研究的发展离不开跨学科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合作和努力。总之, 正因为学者们在实验语音学领域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可视化技术与语音研究的结合才能不断深入。希望随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先进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可以和语言学研究更好地结合, 让语音语调可视化真正走入课堂, 让学习者的外语口语水平真正和他们的书写能力相匹配, 成为可以运用二语或外语在多领域有效交流的学习者。

此外, 现在的语音学研究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音段层面, 超音段特征也成为了研究的焦点之一, 而语调作为超音段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逐渐被重视起来。由于以往教学方法收效甚微, 语调问题一直是外语教学中的难点。目前来看, 语调可视化研究的发展似乎为语调教学提供了新的选择, 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 一定会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帮助。

参考文献:

- [1] Abberton, E. & A.J. Fourcin. Visual Feedback and the Acquisition of Intonation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s*, 1975(2): 157-165.
- [2] Anderson, F. An Experimental Pitch Indicator for Training Deaf Scholars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0(32): 1065-1074.
- [3] Bahman Gorjian & Abdolmajid Hayati & Parisa Pourkhoni. Using Praat Software In Teaching Prosodic Features To EFL Learners [J].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84): 34-40.
- [4] Brazil, D. *Discourse Intonation* [M]. Birmingham: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Monographs.

- 1975.
- [5] Chun, D. Signal Analysis Software for Teaching Discourse Intona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998 (2): 74-93.
 - [6] Guilherme D. Garcia. *Data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in Second Languag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 [7] Hurley, D. S. Issues in Teaching Pragmatics, Prosody,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2(13): 259-281.
 - [8] John Levis & Lucy Pickering. Teaching Intonation in Discourse Using Speech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J]. *System*, 2004 (32): 505-524.
 - [9] Kees de Bot. The Role of Feedback and Feedforward in the Teaching of Pronunciation – an Overview [J]. *System*, 1980 (8): 35-47.
 - [10] Kees de Bot & Mailfert, K. The Teaching of Intonation: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Classroom Applications [J]. *TESOL Quarterly*, 1982 (16): 71-77.
 - [11] Leon, P. & Martin, P.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Intonation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72 (56): 139-144.
 - [12] Loveday, L. Pitch, Politeness and Sexual Role: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itch Correlates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Politeness Formulae [J]. *Language and Speech*, 1981(24): 71-89.
 - [13] Pennington, M. C. 1989. *Teaching languages with computers: The state of the art (Series in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M]. La Jolla: Athelstan.
 - [14] Phillips, N.D & Pronovost, W.L & Dolanskyl & Bass, S.D & Anderson, D.C. An Intonation Display System for the Deaf [J]. *Acta Acustica united with Acustica*, 1971(25): 189-202.
 - [15] Pickering, L. The role of tone choice in improving ITA communication in the classroom [J]. *TESOL Quarterly*, 2001(35): 233-255.
 - [16] Rebecca Hincks & Jens Edlund. Using Speech Technology to Promote Increased Pitch Variation in Oral Presentations [J]. *SLaTE*, 2009.
 - [17] Rocca P.D.A. The Efficacy of Computer-driven Visual Feedback in the Teaching of Intonation to Brazilian Learners of English [J]. *Speech Technology in Language Learning*, 1998: 139-142.
 - [18] Roger Kingdon. *English Intonation Practice* [M]. London: Longmans, 1958.
 - [19] Spaai, G. & Hermes, D. A Visual Display for the Teaching of Intonation [J]. *CALICO Journal*, 1993(10): 19-30.
 - [20] Taniguchi M. & E. Abberton. Effect of Interactive Visual Feedback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Intonation of Japanese EFL Learners [J]. *Speech, Hearing and Language: Work in Progress*, 1999 (11): 76-89.
 - [21] T. Hart, J. & R. Collier. Integrating different levels of intonation analysis [J]. *Journal of Phonetics*, 1975(3): 235-255.
 - [22] Vardanian, R. Teaching English Intonation through Oscilloscope Display [J]. *Language Learning*, 1964(14): 109-117.
 - [23] 葛淳宇, 李爱军. 语调类型学研究综述 [J]. 中国语音学报, 2018(02): 146-160.
 - [24] 嵇艳. 小学英语语调教学研究 [J]. 广西教育, 2015(25): 104.
 - [25] 蒋红柳. 语音实验软件系统在英语语调学习中的作用 [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9(9): 84-86.
 - [26] 李斌, 王国英, 白爱娃. 基于 Praat 的英语语调可视化自主学习对英语语调习得效果的影响研究 [J]. 知识经济, 2018(05): 138-139.
 - [27] 李珍. Praat 软件对语音的可视化评测 [J]. 外国语文, 2014(6): 98-102.
 - [28] 刘丹. 英语语音课程可视化教学研究——以语调教学为例 [J]. 跨语言文化研究, 2019(00): 291-300.

- [29] 武婷婷, 朱启慧. 可视化语音软件 Praat 在高职英语语音教学中的应用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0(17): 102-103.
- [30] 徐文丽, 李珊俊. 语调教学与语音分析软件的应用 [J]. 文学教育, 2011(6): 74-76.
- [31] 杨昊昕. 语音可视化技术辅助英语语调习得的有效性研究 [J]. 黑龙江教育, 2020(7): 89-90.
- [32] 张力, 张新勇, 马海燕. 中国高校学生英语语调习得现状与教学对策 [J]. 学园研究, 2020(6): 186.
- [33] 周殿福. 1985. 国际音标自学手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4] 庄木齐, 卜友红. 语音教学可视化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1(02): 92-98.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英语新闻语言研究综述

涂 洁 陈风华

(长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批评话语分析旨在通过分析公众语篇, 揭示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 以及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迄今为止, 国内外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如火如荼。英语新闻报道具有独特的语篇结构和文体特征, 通过对英语新闻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说话者想表达但内隐的观点, 从而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本文将从多元分析框架、多元研究方法及多元语种类型对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英语新闻语言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英语新闻; 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 语类; 语篇功能

An Overview of English New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U Jie CHEN Fenghua

Abstract: By analyzing public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im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hidden behind the discourse on the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counteraction of discourse to ideology. Up to now, the research on CDA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t home and abroad. Because of its unique text structure and stylistic features,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English news is conducive to realize authors' implicit standpoint and the truth of the event. Finall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have an overview by analyzing different frameworks,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and news genres of English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DA.

Key words: CDA; English news; analytical framework; research methods; genre; discourse function

0.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以下简称 CDA), 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由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们提出的批评语言学不断演变而来 (李桔元、李鸿雁, 2014: 88), 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是现代语言学研究

作者简介: 涂 洁, 女,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话语分析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陈风华, 男,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 and 计量语言学研究。

究的新兴分支,自出现以来便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福勒等人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为语篇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Fowler, 1979),在话语分析中占据重要地位。CDA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被国内学者关注,在国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与 CDA 有关的文章和著作比较少。CDA 融汇了不同学科,如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媒等的研究(支永碧, 2007: 27),是一种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主要理论依据的话语分析方法,通过对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对语篇的影响,以及语篇对它们的反作用(辛斌、高小丽, 2013: 1)。通过对英语新闻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可以增强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帮助人们了解新闻发布者所隐含的观点,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因此,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英语新闻语言研究有助于提高读者对英语新闻的鉴别能力,从而更好理解作者传递的意识形态观点。

1. 国内外 CDA 研究

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层面对 CDA 进行过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促进了 CDA 的长足发展,有助于其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

1.1 国外 CDA 研究

国外 CDA 主要从多元方法及批评反思视角来展开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1992)、范代克(Van Dijk, 2008)、沃达克(Wodak, 2001)等。CDA 真正意义上是出现在费尔克劳出版的《语言与权利》(*Language and Power*)一书,该书关注语言在机构语境中的使用,提出了 CDA 的三维分析框架(Fairclough, 1989),促进了 CDA 的理论构建(刘立华, 2008: 102)。但 20 世纪 70 年代末福勒(Fowler, 1979)等人已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所以有的学者也将 1979 年视为批评话语研究的开端。国外 CDA 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1.1 多元方法视角

费尔克劳出版的《语篇与社会变化》(*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介绍并阐释了批评以及非批评性方法,指出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话语实践层面,而且在于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塑造,但此分类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Fairclough, 1992)。其分析框架主要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同时借鉴了社会语言学理论,寻求在内化两者的基础上提出 CDA 的理论范式(刘立华, 2008: 105)。费尔克劳率先提出 CDA 的理论框架,并将其与不同类型的语篇相结合进行分析,奠定了 CDA 的理论及跨学科研究基础。

范代克也是 CDA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 CDA 不是简单的方法论或学派,其不同领域中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注重对社会不公平的阐述,认为社会中

存在着不同阶层之间权力不平等的现象，同时承认研究者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Van Dijk, 2008）。他提出用社会—认知法对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等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国内外研究者们关注权力、控制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从而批判性看待不同的社会议题。

沃达克等提出 CDA 的目标是分析语言使用中的社会不平等并论述语篇中的权力滥用等问题，通过构建话语—历史分析法，用“话语—历史”模式来分析语篇，糅合背景信息并在具体语境中探究话语的内涵（Wodak, 2001）。其主要研究政治话语和公众话语中的种族歧视现象，解释偏见话语中的语码和暗指（辛斌、高小丽，2013: 3）。

从上述几位 CDA 的奠基者们关注的问题及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将 CDA 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注重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方法来研究 CDA 在不同领域中的使用情况，促进了不同领域研究者对 CDA 的认可，对其在国内外发展及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1.1.2 批评反思视角

对于 CDA 的研究，学者们持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新视角，但也有一些学者对 CDA 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如威多森指出：CDA 界限模糊，没有清楚界定不同概念、不同学科和不同方法论；总是介于社会研究与政治争论之间；研究者仅依赖主观的判断对语篇进行解读，其分析的结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Widdowson, 1995）。

谢格洛夫也认为 CDA 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分析模式，研究者们多倾向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来进行话语分析，因此多依靠政治立场主观地而非根据语言学客观公正地分析（Schegloff, 1997）。斯伦布鲁克对 CDA 的主观性分析进行了批判，认为 CDA 在话语分析和解释过程中缺乏对话性，说话者没有很好地参与到话语中，未能对话语的真实性进行佐证，而人们最终看到的是经过话语分析者的语言描述和解释后的话语，同时指出用社会语言学理论来阐释 CDA 的框架，犯了社会理论还原论的错误（Slembrouck, 2001）。

韦斯和沃达克指出 CDA 在吸收社会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同时，还借鉴了认知学、心理学、语用学、文体学、社会符号学、修辞和会话分析、话语和语篇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及成果，但由于其多样性，导致 CDA 没有一个规约的分析方法（Weiss & Wodak, 2003）。布鲁马特论述 CDA 在理论上主要依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范围上只关注经济较发达的西方社会，在具体的分析中只关注现代的语言和社会问题，不注重历时性变化，因此其分析比较片面，不具备广泛性和普适性（Blommaert, 2005）。

国外学者们开拓了 CDA 的研究先河，涌现了诸多领头人物，他们构建了 CDA 的理论并推动其在不同领域中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维度的分析框架，对于

探究不同类型、不同分析方法下的话语分析有独到的见解,有助于更多学者关注 CDA。但也有学者对 CDA 进行批判,他们认为 CDA 借鉴不同理论构成其自身的分析框架,大量带有主观性的分析和阐释使人们难以辨别分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此类批评有助于国内外学者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话语分析方法。总体而言,国外学者们对于 CDA 的辩证看法,对国内学者们关注并展开 CDA 研究具有建设性意义。

1.2 国内 CDA 研究

较于国外 CDA 研究,国内学者对其关注较晚,自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引入 CDA 的相关内容,最早在国内关注 CDA 的学者主要有陈中竺、辛斌、张德禄、田海龙等人。由于它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分支,且可以和不同的学科相融合,所以 CDA 自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以来便取得了快速发展,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国内 CDA 研究主要包括引介视角和跨学科视角两个方面。

1.2.1 引介视角

陈中竺是国内首位介绍批评语言学的学者,他(1995)从哲学及语言学基础两方面对批评语言学进行评述,阐释了功能主义语言观视角下批评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语篇、语境等的看法。此外,他认为及物系统、人际功能系统及转换可用来揭示意识形态,同时对批评语言学 4 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回顾。他指出批评语言学研究刚起步,需要不断完善理论与方法,随着其被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广泛关注,有望从简单跨学科向高度跨学科方向发展。陈中竺对批评语言学的引介对其后学者们研究话语分析具有启迪作用,自此 CDA 以迅猛的速度不断发展。

辛斌是国内较早介绍 CDA 的学者之一,他(1996)介绍了批评语言学的相关概念、发展历程及研究对象,阐释了意识形态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及权力阶层运用语言达到强化意识形态的目的。随后辛斌(2000, 2002, 2008)分别论述了英语新闻语篇批评性分析的总原则、主要方法并从不同方面对 CDA 进行批评与反思。

张德禄和刘秀丽(2011)论述了 CDA 的理论基础及发展历程,研究 CDA 中词汇语法的使用对语篇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提出进行 CDA 研究的分析步骤。田海龙从不同层面阐释 CDA 的有关研究及发展,将 CDA 的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2013)指出 CDA 在理论层面属于质的研究,但实践层面不完全属于质的研究,因此提出了趋于质的研究的 CDA 模式,认为在研究中需要明确研究者即是研究工具;田海龙(2016)还对 CDA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积极话语分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认为 CDA 重视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话语。

这些学者引入并推动了 CDA 的不断发展,主要介绍 CDA 的有关概念及发展历程,同时指出跨学科视角是推动 CDA 长足发展的关键,为学者们进行跨学

科研究提供了指引。

1.2.2 跨学科视角

跨学科研究是 CDA 的一个显著特点,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亟需与不同的学科交叉融合,这有利于拓展 CDA 在不同学科中的运用。跨学科研究视角主要包括认知学、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例如语料库语言学的运用使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析过程中的主观问题,增强了 CDA 研究的说服力(苗兴伟、赵云,2019:8)。

李桔元和李鸿雁(2014)从语料库及认知两个视角对 CDA 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阐释,指出不同视角的理论和方法融入 CDA 的研究中,有助于更科学、更全面地揭示话语中意识形态的意义。苗兴伟、赵云(2019)认为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运用是适应新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促进了 CDA 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及研究范式的创新。

熊伟和舒艾(2020)将 CDA 与翻译学相结合,从发文数量、研究主题及理论方法层面阐释国内外 CDA 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此外,将 CDA 与翻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还有田海龙(2017)、胡开宝和孟令子(2017)等。田海龙(2019)还论述了 CDA 与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的交汇融合,指出学者们对融合的不同看法,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必然趋势。刘风光和刘诗宇(2021)以政治话语为例,从跨学科视角探究 CDA 与语用学及认知语言学的融合,为话语分析提供学科交叉的理论及实践启示。同样将 CDA 与政治话语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还有杨敏和侍怡君(2021)、张薇(2019)等。

刘鼎甲(2021)运用 CDA 的理论框架,结合语料库手段对疫情期间中美媒体对华报道进行历时分析,从宏观及微观两个方面考察美媒塑造中国形象的趋势及意识形态。田旭军和李晓倩(2020)依据 CDA 理论并结合语料库手段,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 3 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话语主题词进行研究,分析不同时期主题词的演变过程。将语料库方法与 CDA 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还有胡开宝和张晨夏(2019)、林元彪和徐嘉晨(2020)等。

综上,国内 CDA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和发展进行引介,引入 CDA 概念之初多关注 CDA 的方法论及应用范围。随着 CDA 在国内的发展,学者们也尝试将其与不同学科进行融合,这些学科主要包括认知学、社会学、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促进了 CDA 跨学科研究的不断突破,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新路径,有利于分析的规范化,增强分析结果的说服力。

2. CDA 视野下英语新闻语言研究

针对英语新闻语言,学者们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评价理论(陈令君、赵闯,2016)系统功能语言学(李庆明、吴华,2018)、批评话语分析等,其中

运用 CDA 来分析新闻语篇的数量较多。本文主要从多元分析框架、多元研究方法 & 多元语种类型 3 个方面来阐释 CDA 视角下的英语新闻语言研究。

2.1 多元分析框架视角

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分析框架来分析英语新闻：话语—辩证法、评价理论、社会—认知及三维分析框架等，根据语篇类型的不同，采取不同分析框架可以使分析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法雷利借鉴费尔克拉夫 (Fairclough) 的话语—辩证法的分析框架，对英国政府当时发布的最新“授权”白皮书“控制中的社区”进行分析，通过关注媒体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如何不减少实践话语而让话语成为社会实践的一个方面，从而更全面地探讨媒体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表明 CDA 不仅可用来分析普通文本，还可以分析政治领域中的特定文本 (Farrelly, 2010)。陈令君和赵闯 (2016) 运用评价理论框架，在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基础上，阐释有关“中国梦”的英语新闻语篇中显性及隐性态度资源的分布情况及建构的社会意义。通过语料库来量化英语新闻语篇，增强了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范代克通过社会—认知分析框架，探讨话语结构对心理表征的影响，批判性地分析性别不平等、媒体言论、政治言论等几个领域的话语，他发现政治话语的研究常与 CDA 相结合来进行论证，也有许多研究是基于语料库对大型数据集进行定量分析 (Van Dijk, 2015)。蒋岳春 (2019) 运用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比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的 9 篇英语新闻报道，分析美媒对“十九大报告”的态度倾向，发现美媒看待中国的视角在发生转变，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趋于理性客观，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人们应当对英语新闻进行批判性和解构性的阅读，认清新闻语篇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

国内外学者通过话语—辩证法、评价理论、社会—认知、三维分析等不同的分析框架对英语新闻语篇进行研究，探究了不同分析框架下的英语新闻语篇，这些理论框架的运用使语篇分析过程及结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分析框架的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采取何种分析框架通常是基于语篇分析者的主观选择，所以 CDA 的分析框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与其理论层面的借鉴有一定的关联。因此，需要了解每一种分析框架的属性，从而更好地分析不同类型的英语新闻语篇。

2.2 多元研究方法视角

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对语篇分析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研究者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达到意识形态构建的目的。学者们主要采取以下角度来分析英语新闻语篇：互文性、分类、及物分析、作格分析及语料库等。

费尔克劳详细论述了 CDA 中的互文性分析方法，系统地阐释其在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意义潜势，并尝试构建 CDA 的分析框架，指出互文性作为话语实践的一个方面，提供了解构话语事件复杂性的方法，实现了文本异质性中意义、形式

和风格的协调（Fairclough, 1992）。代尊峰（2013）认为国内学者大多从及物性和情态对英语新闻进行批评分析，很少有人从分类的视角进行研究。他运用分类方法，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对美国时代周刊官网上的一则英语新闻进行分类批评研究，论证传统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形式化表征及划定范围是否合理，认为传统分类的划分范畴标准较模糊，应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重新分类。

程论述了 CDA 的理论基础及受到的批评，因此结合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及批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来比较单词和短语的频率、搭配及句法模式，提出未来语料库与 CDA 的发展方位，认为两者的有机结合可用来研究不同类型的语篇，指出数据的支撑有助于提高英语语篇分析的说服力，将其运用在不同的领域（学术课堂话语、媒体商业话语）或采用不同的方法论（跨文化修辞、认知隐喻）来分析（Cheng, 2013）。刘明（2016）结合具体的新闻报道，探讨及物分析、作格分析在 CDA 中的运用，认为这两种分析方法能够丰富语篇分析的手段，进而揭示新闻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

哈特认为 CDA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解释性练习，强调将“三角剖分”作为一种指导性的方法论原则，旨在防止对文本的主观理解，但 CDA 缺少结合实验的三角剖分方法论，指出 CDA 可结合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的新闻语篇，着重于将“三角剖分”作为指导，将文本分析与政治理论、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相结合（Hart, 2018）。在不同的英语新闻中，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的差异构成了分析结果的多维层面，因此人们对英语新闻语篇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康俊英和李凤琴（2018）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模式为理论框架，对《纽约时报》2016 年有关“南海国际仲裁结果”的各类语篇转述动词的词频、分布及索引进行分析，指出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新闻语篇分析是话语权建设的有效手段。此外，杨敏和符小丽（2018）采用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的历史语篇分析法，结合语料库的关键词和索引分析，批判地阐释美国主流媒体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话语建构。

国内外学者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英语新闻，有的学者采取及物性、情态、分类等语言学方法来分析，也有的学者采取当前热门的语料库手段进行英语新闻语言研究。无论是运用语言学手段进行英语新闻语篇的个案分析，还是运用语料库手段将语篇进行量化，不同的分析方法均可用来解构英语新闻语篇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意义。因此，分析方法的选择不是将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分析新闻语篇，而是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语篇分析。

2.3 多元语种类型视角

根据类型的不同，英语新闻可归为不同的语类，主要包括政治类、灾难性及恐怖主义事件类新闻，学者们通过探究 CDA 在这些不同语种类型新闻中的具体运用，来阐释不同语类新闻传递的意识形态因素。

波特和埃文斯将 CDA 作为理论基础,使用龙森(Nexis)数据库,对哈维飓风及南亚洪水期间发表的报纸文章进行调查,通过关键词检索出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报道,论述英国报纸对于全球北部和南部灾后事件报道的差异程度。指出两种灾难报道的覆盖比例有很大不同,其中,篇幅长的报道可以表达更广泛的观点,灾难的规模与媒体对事故的兴趣之间没有联系,且灾难的新闻价值与人类苦难的程度关系不大,但与所涉及人员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直接相关(Porter & Evans, 2020)。因此,英国报纸报道灾后事件的方式存在严重偏见,这从侧面反映出新闻报道大多隐藏着报道者的态度,并非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所以应当辩证地看待英语新闻语篇中的观点。丁建新和秦勇(2013)运用社会认知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探究三大主流媒体对龙卷风桑迪(Sandy)的报道,发现媒体们过度强调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将灾难归咎于自然现象,隐瞒其中客观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因素,达到为权力阶级规避社会责任的目的。

程和兰鉴于社会、经济、历史和政治等因素,通过整合语料库与 CDA 的理论,分析了 1997 年香港从英国回归到中国后的 10 年来,西方公众话语对香港回归的看法及与香港之间关系的历时变化,并解释了西方对回归的看法发生变化的原因,指出香港在两个时期的交接中,西方对政治问题的看法随着时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Cheng & Lam, 2013),该研究让西方对香港有了新的见解,有助于重新审视两地之间的关系。

巴特鲁西和加洛通过描述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事件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对美国政治制度和对外干预措施进行批判性分析。但当时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将恐怖主义置于具体的地理、时间和社会政治情境化中,论述恐怖主义袭击的性质及其造成的破坏,给予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价(Bartolucci & Gallo, 2015)。同时,不同媒体对飞机坠毁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明显的恐怖袭击事件,也有不同的报道侧重点,这与新闻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

综上,CDA 可用来分析不同类型的英语新闻,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内外学者对不同语类英语新闻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出,CDA 常被用来分析灾难类、政治类英语新闻报道,不同媒体对此类新闻报道的差异能体现出统治阶层对权势的控制,对于这些报道的批评性分析,可以揭示出新闻背后所隐藏的不同主体的意识形态。

3. 结语

本文基于 CDA 的视角,首先简要概述国内外 CDA 的研究现状,其次从多元分析框架、多元研究方法以及多元语种类型 3 个方面对英语新闻语言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其中分析框架的选择没有明确的界定,框架的不同对分析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根据研究者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来选择合适的分析框架;不同

的研究方法均可传递新闻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 在分析英语新闻语篇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需要考虑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 做到全方位阐释; 随着 CDA 的发展, 其也被用来分析政治类、灾难类及恐怖主义事件等不同类别的英语新闻, 这说明 CDA 是一种可行性较强的语篇分析手段。鉴于英语新闻报道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以在分析英语新闻语篇时应结合特定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来进行研究, 批判地从英语新闻报道中获取信息。

参考文献:

- [1] Bartolucci V, Gallo G. Terrorism, System Thinking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5, 32(1): 15-27.
- [2] Blom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Cheng W, Lam P.W.Y. Western Perceptions of Hong Kong Ten Years on: A Corpus-Drive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y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3, 34(2): 173-190.
- [4] Cheng, W. Corpus-based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The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3:1353-1360.
- [5]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 Longman, 1989.
- [6]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7] Farrelly, 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Political Studies: An Illustrative Analysis of the 'Empowerment' Agenda [J]. *Politics*, 2010, 30(2): 98-104.
- [8]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et al.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9] Hart, C. Event-frames Affect Blame Assignment and Perception of Aggression in Discourse on Political Protests: An Experimental Case Study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8, 39(3): 400-421.
- [10] Porter J.J, Evans G. Unreported World: A Critical Analysis of UK Newspaper Coverage of Post - disaster Events [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0, 186(3): 327-338.
- [11] Schegloff, E. A. Whose text? Whose context? [J]. *Discourse & Society*, 1997, 8(2): 165-187.
- [12] Slembrouck, S. Explan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que in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J].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01, 21(1): 33-57.
- [13] Van Dijk 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J].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15: 466-485.
- [14] Van Dijk T A. 18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2008: 352.
- [15] Weiss G, Wodak R. *Introduction: Theor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16] Widdowson, H. G.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 4(3): 157-172.
- [17] 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8] 陈令君, 赵闯. 新闻语篇中的“中国梦”——评价理论态度视域下的话语分析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23(04): 34-39+81.
- [19] 陈中竺. 批评语言学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1): 21-27+80.
- [20] 代尊峰. 英语新闻语篇的分类批评分析 [J]. *外语教学*, 2013, 34(5): 28-31.

- [21] 丁建新, 秦勇. 社会认知批评话语分析中的非政治化和突生结构——以龙卷风 Sandy 新闻报道为例 [J]. 外语研究, 2013(02): 8-13.
- [22] 蒋岳春. 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十九大报告的批评话语分析 [J]. 外国语文, 2019, 35(4): 10-16.
- [23] 康俊英, 李风琴. 政治新闻语篇中转述动词的批评性分析——以《纽约时报》南海争端报道为例 [J]. 外语研究, 2018, 35(3): 25-30.
- [24] 李桔元, 李鸿雁.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37(4): 88-96.
- [25] 刘鼎甲. 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语料库历时分析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44(06): 52-64.
- [26] 刘风光, 刘诗宇. 政治话语分析的认知批评语用融合路径重塑 [J]. 外国语文, 2021, 37(05): 80-88.
- [27] 刘立华. 批评话语分析概览 [J]. 外语学刊, 2008(3): 102-109.
- [28] 刘明. 及物分析、作格分析及其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应用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6, 39(5): 66-74.
- [29] 苗兴伟, 赵云. 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设置与路径演进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5): 1-10+159.
- [30]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2): 1-9+144.
- [31] 田海龙.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 6-10.
- [32] 田海龙.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引发的思考 [J]. 当代修辞学, 2019(1): 55-64.
- [33] 田绪军, 李晓倩.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外交话语主题词演变研究 [J]. 中国外语, 2020, 17(2): 16-25.
- [34] 辛斌, 高小丽. 批评话语分析: 目标、方法与动态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4): 1-5+16.
- [35] 辛斌.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与反思 [J]. 外语学刊, 2008(6): 63-70.
- [36] 辛斌.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2(6): 34-41.
- [37] 辛斌. 批评语言学与伦理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 [J]. 外语教学, 2000(4): 44-48.
- [38] 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 批评语言学 [J]. 现代外语, 1996(1): 21-26+72.
- [39] 熊伟, 舒艾. 翻译研究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 回顾与展望 [J]. 外语学刊, 2020(05): 93-100.
- [40] 杨敏, 符小丽. 基于语料库的“历史语篇分析”(DHA)的过程与价值——以美国主流媒体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话语建构为例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41(2): 77-85.
- [41] 张德禄, 刘秀丽.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词汇语法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2): 101-106.
- [42] 支永碧.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动态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3): 27-32.

基于俄语国家语料库 (НКРЯ) 对俄语前置词 *на* 的研究

李 丹 孙 锐

(吉林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 俄语前置词虽属虚词,但在句子结构中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掌握不好前置词的用法可能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能力。通过考察前置词 *на* 在俄语国家语料库 (НКРЯ) 的义项分布情况,搜集前置词 *на* 最典型的名词搭配,据此来分析俄语母语者对前置词 *на* 的实际使用情况。在带前置词 *на* 的空间表达式中,充当地标 LM 的客体形状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在空间认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维度特征和拓扑类型的重要载体,影响着表达各类空间意义的具体语言手段的选择。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作为前置词 *на* 的俄语母语使用参照数据,通过对比和分析,为俄语语言教学及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 俄语国家语料库;前置词 *на*;空间义项;维度;拓扑类型

Research on Russian Prepositions *на* Based on the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НКРЯ)

LI Dan SUN Rui

Abstract: Although Russian prepositions are function words, they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sentence structure. Therefore, a poor grasp of the usage of prepositions may affect the learners' language ability. By exami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eanings of the preposition *на* in the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and collecting the most typical noun collocations, we analyze the Russian native speakers' understanding and actual usage of the preposition *на* accordingly. In the spatial expression with the preposition *на*, the object shape acting as the landmark LM shows diffe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spatial cognition.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dimen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pological types and affects the choice of specific language means to express various spatial meanings.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data

基金项目: 吉林省高教学会 2020 年度项目“多学科视角下俄语空间前置词语义结构研究”(编号: JGJX2020D23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 丹, 女, 吉林外国语大学中东欧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俄语语言学研究。

孙 锐, 男, 吉林外国语大学中东欧语学院助教, 主要从事俄乌复语教学。

for the use of Russian native speakers of the preposition *на*.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it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and inspiration for Russia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 words: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preposition *на*; spatial meaning; dimension; topological type

0. 引言

国内俄语学界对俄语空间关系前置词的研究更多关注其结构和语义层面,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李勤(1984)、章昌云(1988)、周春祥(1988, 1989)、陈国亭(1997, 2000)、薛恩奎(1999)、张凤(2000, 2001)、王志坚(2003)等。以其他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姜崇周(1989)、李岩(1993)、赵容晖(1995)、刘光准(1997)、田文琪(1999)、王松亭(1999)、张晓燕(2001)、杨明天(2004)、赵亮(2004, 2005)、孙蕾(2005)等。李勤、章昌云、周春祥等学者将近义前置词作为研究对象,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主要描写前置词的表层意义。陈国亭、薛恩奎、张凤、王志坚等学者的研究视角不仅关注前置词的表层意义,更加注重从认知心理层面对前置词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这为空间前置词的研究开辟了比较新的研究视角,标志着俄语空间前置词的研究转向,即由静态性描写向动态性描写转变。相对而言,俄罗斯语言学界一直比较关注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研究俄语空间前置词的语义。2000年问世的论文集《前置词语义问题研究》收录了Е.В. Рахилина, В.А. Плунгян, Н.В. Лягушкина, О.Н.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А.С. Кириченко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不仅涉及над, на, сзади, с, под, позади, между等俄语空间前置词,还涉及一些英语介词,这些学术成果以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前置词的语义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俄语空间前置词”文献的梳理可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必然会使俄语空间前置词的模式化研究成为一种必然。此外,随着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偏向实证主义研究,俄语空间前置词的研究也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时刻。基于语料库的词汇研究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对词汇的搭配研究更是重点,这种研究范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捕捉比较零散的、常被我们忽视的语言现象。“前置词是虚词的一种,在词组或句子中连接一个实词和另一个实词,表达这些词所称谓的事物与动作、状态、特征的关系。”(Гр.80(1): 706)换言之,“前置词本身所表示的关系是很抽象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在组配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化,它的意义是在动态的组配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与之组配名词的语义特征、所处的空间状态对前置词的语义关系的确定具有选择限制作用。”(薛恩奎, 1999)这一语言事实警示我们:要想全面研究前置词的语义必须要考虑与之搭配的名词,只有把握前置词后面搭配的名词,才能呈现这一前置词的实际使用情况。然而,纵观国内外语言学界,我们发现学者们热衷于空间前置词本身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前置词结构(前置词+名词)的研究。本文以典型俄语空

间前置词构式 **на** 为研究对象，试图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观察 **на** 在实际使用中义项的分布、与其常搭配名词的使用情况，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归纳高频搭配名词的语义结构，提炼前置词 **на** 的认知语境激活特征。

1. 基于语料库前置词 **на** 的数据收集与统计

采用语料库法，抽取俄语国家语料库中含前置词 **на** 的 1000 条语料，考察样本分布情况、归纳前置词 **на** 的语义类型，针对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进行搭配分析，提炼高频搭配名词的语义特征。

1.1 数据收集

本论文以现代文本语料库 (Основной корпус) 和口语语料库 (Устный корпус) 等国家语料库中的两个典型的语料库视作俄语前置词 **на** 研究分析的主要语料来源。具体操作流程为：将前置词 **на** 作为关键词在俄语国家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搜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在现代文本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中出现的频次分别为（4393003）次和（4471746）次。为确保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依据语料库抽样调查的主要原则，随即抽取了 1000 个词条，建立了小型语料库，时间跨度为 2002-2019 年。语料的文本类型包括各种体裁和流派的现代文学作品、现代戏剧、回忆录和传记文学、政论体裁的杂志和文学批评、报纸和新闻、正式的商业和法律文本、日常生活文本以及各种口语类的文本。总体而言，样本总量充足，完全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求。因带前置词 **на** 的词条在所选的两个语料库中所占比例皆接近 50%，所以本研究在现代文本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中所抽取的词条各为 500 条。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语料来源

分类	现代文本语料库	口语语料库	总量
频次	4393003	4471746	8864749
占比	($\approx$) 50%	($\approx$) 50%	() 100%
子语料库抽取频次	500	500	1000

1.2 样本分布统计

逐条分析所抽取的 1000 条语料，人工删除（15）条错误语料，最终用于本研究的语料为 985 条。在参考此前学者们对前置词 **на** 的语义分类的研究成果及依据研究者对所抽取样本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将前置词 **на** 分为 24 个语义项，其中，5 项空间意义和 19 项非空间意义。各义项及其在所搜集的语料中所占的比重具体如下：1）到……上面，向……表面（72 条，7%）；2）表示工作、责任等由某人、某单位承担（4 条，0.4%）；3）到……（70 条，7%）；4）向……方向，

向……方面 (48 条, 5%); 5) 指出某些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客体 (160 条, 16%); 6) (与 походить, быть, похожим 连用) 像……, 类似…… (6 条, 0.6%); 7) (与 переменить, поменять, променять 等连用) 指出交换来的物体 (6 条, 0.6%); 8) 表示某事进行或将要发生的日期, 时间 (28 条, 2.8%); 9) 指出某种特征的范围 (2 条, 2%); 10) 目的 (108 条, 11%); 11) 指出行为的特征、方式以及过程进行的特点 (18 条, 1.8%); 12) 指出行为的工具 (14 条, 1.4%); 13) 指出动作和事物的数量特征 (7 条, 0.7%); 14) 指出某物用途的数量特征 (5 条, 0.5%); 15) 指出动作的结果 (24 条, 2.4%); 16) 数量上的差别 (4 条, 0.4%); 17) 在……上 (156 条, 15.8%); 18) 表示动作或特征的范围、地点等 (149 条, 15.1%); 19) 表示“集中某物、某人身上” (18 条, 1.8%); 20) 表示“在一段时间之内” (23 条, 2.3%); 21) 指出动作的方式、特点 (13 条, 1.3%); 22) 指出动作进行的条件、环境 (22 条, 2.2%); 23) 指出物体的支撑物、底部 (3 条, 0.3%); 24) 表示行为的工具、手段 (25 条, 2.5%)。

通过统计结果我们发现, 虽然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只占 5 项, 非空间义项占 19 项, 但前置词 на 的空间意义的样本占整体样本的比例为 49.9%, 说明了前置词 на 的各空间意义在语言使用中比较常见。

1.3 样本分析与归纳

前置词的空间意义是人与周围世界空间——身体互动经验概念化的结果, 人类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导致了人类对客观世界中各种空间结构的感知, 因此形成了诸如里—外、上—下、左—右等意象图式, 这些意象图式构成语言中前置词研究的基础。俄语空间关系前置词 на 的意象图式分为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和上—下图式。前者强调射体 (TR) 和界标 (LM) 之间的“水平”联系 (TR 和 LM 之间存在初始距离, TR 向 LM 方向运动; 这种情况下, LM 是 TR 运动的终点, 即位于地标外部的射体向地标表面的动态空间关系, 这主要是前置词 на 的四格用法, 如图 1。后者关注 TR 和 LM 之间的“垂直”联系 (TR 在上面, 在表面; LM 在下面, 即射体在地标表面的静态空间关系, 这主要是前置词 на 的六格用法, 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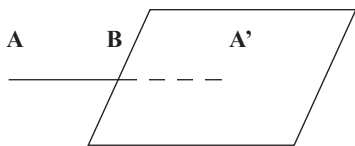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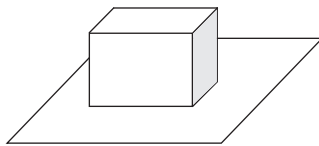


图 2

根据射体 (TR) 和界标 (LM) 之间的动、静两种关系类型, 前置词 на 的基本意象图式关系亦具有动态性和静态性两种特征。前者表示射体和界标之间的

关系呈现动态性质: 射体以界标为参照物, 在力的作用下, 产生位移轨迹, 二者的方位关系不断转换, 所形成的方位关系由位置关系和延伸关系共同体现; 后者表示射体和界标之间的关系呈现静态性质: 射体以界标为参照物, 但射体的运动路径为零, 二者的方位关系并没有变化。

观察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在俄语国家语料库中的分布情况, 归纳前置词 **на** 的主要空间义项, 分别用 **на₁**、**на₂**、**на₃**、**на₄**、**на₅** 表示, 并将这 5 个空间义项进一步细化为若干语义亚类, 具体如下:

1) **на₁**: 到……上面, 向……表面。此义项表示动作、运动趋向某物的表面以便把人、物等放置在它的上面, **LM** 指定运动的方向, 是运动的终点。最终状态: **TR** 占据 **LM** 一定的面积、表面 (具有延伸性, 数量参数等特征), **TR** 与 **LM** 处于接触状态, 如 **положить книгу на стол** (将书放到桌子上); **поставить чемодан на пол** (将箱子放到地板上)。由此可派生出以下区别义项: 与 **сесть** 连用, 指乘坐交通工具, 如 **сесть на автобус**; 和表示“向上运动”的动词连用, 指升到……上, 如 **залезть на дерево** (爬上树去); 定位 (穿到钩子、线上), 如 **нанизывать бусы на нитку**; 包住表面 (给穿上, 套上衣帽等), 如 **надеть шляпу на голову** (带上帽子) / **кольцо на палец** (带上戒子)。

2) **на₂**: 到……。表示 **TR** 向 **LM** 界限内运动, 由一个空间转向另一空间。虽然运动、动作趋向某地点、某空间, 但不强调进入内部, 这是和前置词 **в** 的最明显区别。射体 **TR** 朝向界标 **LM** 运动, **LM** 是运动的最终方向、是“露天”的地方。观察者 (**наблюдатель**) 在起始位置通常看不见 **LM**, 而只是知道 **LM** 的存在并且想要到达 **LM**。该义项, 起始点和 **LM** (终点) 之间存在初始距离, **LM** 指定运动的方向。如, **Они перешли через церковь, не замеченные никем, и вышли потом на площадь, бывшую перед ней (Н.Гоголь. Тарас Бульба)**。(谁都没发现, 他们穿过了教堂, 来到了她面前的广场。);

3) **на₃**: 向……方向, 向……方面。界标 **LM** 是射体 **TR** 位移的终点。表示运动趋向某物或趋向某种现象发生的范围及地点, 如, **затронуться на огонь, идти на свадьбу**。Люди эти за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не пойдут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а **фрон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 **фронте** им делать нечего (**М.Булгаков. Белая гвардия**)。(这些人表示, 无论如何, 他们不会去前线, 因为他们在前线无事可做。) 由此可派生出以下区别义项: 表示物、人、集体受到攻击, 如: 与方位名、地名连用, 如: 与具有方向概念的名词连用, 如: 朝向……, 如;

4) **на₄**: 在……之上, 在……上。表示射体 **TR** 位于在界标 **LM** 上, 如, **книга на столе**, 射体 **книга** 占据地标 **стол** 一定的面积、表面 (具有延伸性, 数量参数等特征), 射体 **TR** 与地标 **LM** 处于接触状态。此义项可以引申为“穿着, 戴着”, 如:

5) *на*₅: 动作或特征的范围、地点等。表示射体 TR 在界标 LM 所在的空间中, 与前置词 *в* 的区别是不强调在地标 LM 的内部空间。如,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назад я купил небольшой участок земли, на котором обнаружил пласт такой глины (Аркадий Стругацкий, Борис Стругац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Бромберг. Чародеи, к/ф (1982))。

1.4 名词搭配词统计

搭配由弗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引入 (Firth, 1957), 表示某些共现 (cooccurrence) 的语言现象, 源自说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换言之, 这种语言现象表示词汇项之间的组合关系, 体现数量化和语篇的特征, 如 студент 常与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аудитория, библиотека 等词搭配, 说明这些词之间存在习惯性的共现关系, 并构建了具体的语境。通过对所搜集的语料进行分析, 归纳出 *на*₁、*на*₂、*на*₃、*на*₄、*на*₅ 各义项使用时界标 LM 所呈现的主要语义特征。详见表 2:

表 2 *на* 的空间义项使用时界标 LM 的语义特征

前置词 <i>на</i> 的空间义项	界标 LM 的语义特征
<i>на</i> ₁	身体部位名词: голова (头), рука (手), колени (膝盖), макушка (头顶), грудь (胸部) 等; 家具类名词: стул (椅子), полка (书架), стол (桌子), кровать (床), подоконник (窗台) 等; 土地表面意义类名词: пол (地板), песок (沙地), ковёр (地毯), трава (草地), снег (雪) 等; 单个事物意义名词: окно (窗户), подушка (枕头), порог (门槛), сундук (箱子), поднос (托盘) 等。
<i>на</i> ₂	居民点的一部分: улица (街道), площадь (广场), поле (野), завод (工厂), почта (邮局) 等; 曾经是露天场所: на завод (去工厂), на фабрику (去工厂) 等; 地理概念名词: речка (小河), болото (沼泽) 等; 地点意义、居民点意义的专有名词: Карпаты (喀尔巴阡),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Кавказ (高加索) 等。
<i>на</i> ₃	具体名词: почта (邮局), вокзал (火车站), станция (车站), завод (工厂) 等; 抽象名词, 这类抽象名词未指明处所意义, 只表示活动地点: урок (课), свадьба (婚礼), пляж (海滩), экскурсия (游览) 等; 表示某种现象的抽象名词, 如 огонь (火), крик (喊声), звонок (铃声) 等。
<i>на</i> ₄	地点意义的名词 (地理客体), 如 земля, море, поле 等; 物质意义的名词, 如, лёд, трава 等; 事物意义的名词, 如, стол, стул, полка, кровать 等。
<i>на</i> ₅	某些名词按照习惯用法与 <i>на</i> 连用, 如, завод, почта 等; 某些地名、方位名称、街道名称连用, 如, на Украине, на на Урале, на юге 等; <i>на</i> 与 <i>в</i> 均表示动作的范围、地点, 但 <i>на</i> 兼表示消极或积极参与其活动; 表示动作或呈现特征的事件和范围, 如 на собрании, на свадьбе 等。

2. 前置词 на 的认知语境激活特征

明确了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的实际分布情况和高频率搭配词，便于我们对前置词 на 的空间意义激活时对其语言认知语境特征进行提取和归纳。对于研究对象前置词 на 来说，无论是射体 TR 和界标 LM 的“水平联系”还是射体 TR 和界标 LM 的垂直联系，都需要关注界标 LM 的几何特征。“语言在表述空间意义时，对射体和界标的几何特征有所取舍，往往保留和凸显界标即参照物的一些具体的几何特征，而淡化，甚至舍弃射体具体的几何特征。”（Кобозева, 1995: 147）这里所说的几何特征非纯粹几何性质，而是具有认知性质。空间关系主要涉及客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即射体 TR 和界标 LM 之间的位置关系，在此关系中，界标 LM 在人的意识中的维度扮演重要角色。空间侧面对称的界标 LM 往往被认知为空间的“点”，如“足球”，更为重要的是，当实体内部和表面没有被占据而界标 LM 只是用来指示附近的空间时，该界标 LM 就被认知为“点”。当带有前置词 на 的认知语境激活时，相应的界标 LM 的空间侧面体现为不对称性，有两种物理属性十分突出。一种是细长的侧面，如“绳子”、“海岸”，被认知为“线”；另一种是较为平坦的侧面，如椅子承置臀部的部位、餐桌承置餐具的部位，被认知为“面”。应该说明的是，“‘面’也可以指实体的表面部分。实体的表面可以是方形的，也可以是弧形的，还可能是不规则的。”（褚泽祥，2010: 7）在带前置词 на 的空间表达式中，界标 LM 通常概念化为二维客体之列。

客体的维度特征还可以从客体的拓扑类型中展现出来。客体的结构形态，即拓扑类型与客体的维度一样，在空间关系的概念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拓扑类型概念是 Л.Талми（1983）为构建空间语言概念模型而引入的。他认为，语言世界图景中，现实客体形状的多样性可以归结为一定数量的图式几何形式和抽象几何形式，并将其称为拓扑类型。Talmy 总结出以下拓扑类型：点、线、平面、周围、有限空间、圆柱、孔及其具有固定方向的变体。俄罗斯学者 Е. В. Рахилина 继承和发扬 Talmy 的拓扑类型这一思想，将客体的拓扑类型进一步细化。本文以上述两位学者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整理出当前置词 на 的认知语境激活时，界标 LM 的拓扑类型。详见表 3：

表 3 界标 LM 的拓扑类型

Тип объекта 客体类型	пример 例子
стержни, верёвки 杆、绳子	палка (木) 棍, канат 绳
пластины 板	доска 木板, ковёр 地毯
вертикально вытянутые предметы 《жёсткой》 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垂直方向有延展性的物体，并且具有《坚硬》的外形	столб 柱子
вытянутые предметы 《жёсткой》 конфигурации 具有“坚硬” 外形的延展性客体	доска 木板, гвоздь 钉子
гибкие веревкообразные предметы 像绳子一样柔韧的客体	волос 头发

поверхности 表面	стол 桌子, доска 木板
《бесконечные》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无限的”空间	степь 草原, поле 田野
вещества 物质	снег 雪, вода 水

在带前置词 на 的空间表达式中，地标 LM 通常被概念化为表面（平面）拓扑类型。但即使同一个客体，因关注视角的异同，我们也可以把它具化为不同拓扑类型的客体，并将不同拓扑类型的信息用不同的语言手段进行语言编码。如事物名词 стол 充当界标角色时，可以概念化为平面拓扑类型，如：положить на стол, 此例子中 стол 概念化平面拓扑类型的原因是，该情景中 стол 的主要功能是属于这一拓扑结构，即凸显 стол 的一部分—桌面；也可以概念化为封闭拓扑空间类型，如：Бумага и ручка в столе。

综上所述，客体的形状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在我们的空间认知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是维度特征和拓扑类型的重要载体，影响着表达各类空间意义的具体语言手段的选择。

3. 结语

本文通过检索俄语国家语料库（НКРЯ），考察前置词 на 在俄语国家语料库（НКРЯ）的义项分布情况，搜集前置词 на 最典型的名词搭配，据此来分析俄语母语者对前置词 на 的实际使用情况。源于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的所占比重及空间概念在人类的概念系统所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本文更加关注前置词 на 的空间义项研究，充分考虑到与前置词 на 组配的名词语义特征，在其基础上总结前置词 на 的认知语境激活特征。通过 НКРЯ 语料库对前置词 на 的分析，反映其在俄语使用者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其最典型的搭配词应受到语言学习者的重视，这一研究为俄语词汇教学和研究产生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Шведова Н.Ю.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 т. 1. М.: Наука, 1980. с783.
- [2] Пайар Д.,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О.Н.(Ред.).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емантике предлог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 М.: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2000.376с.
- [3] Кобозева И. М. Как мы описывае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оторое видим: проблема выбора “ориентира”[А]. Труд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еминара “Диалог’95” по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 ее приложениям[С]. Казань. 1995.С. 146-153.
- [4] Firth, J. R.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in J.R. Firth et al.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Special volume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57.
- [5] Talmy L.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A]. H.Pick, L.Acredolo (eds). *Spac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 Y: Plenum. 1983.
- [6] 陈国亭. 俄汉语动词表述运动意义时的视点差异 [J]. 外语学刊, 1997 (4): 37-40 +47.
- [7] 陈国亭, 鲁莹. 前置词 В 和 НА 与处所名词搭配的心理基础和语义区别 [J]. 外语学刊, 2000 (3): 35-39.

- [8] 褚泽祥. 汉语空间短语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9] 姜崇周. 俄语存在句的构成方法 [J]. 外语学刊, 1989 (2): 25-30.
- [10] 李勤. В(на)+сторону 用法试析 [J]. 中国俄语教学, 1984 (2): 45-46.
- [11] 李岩. 俄语存在句及其在汉语中的对应表达手段 [J]. 中国俄语教学, 1993 (4): 36-40.
- [12] 刘光准. 俄汉民族左右尊卑文化现象比较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7 (6): 77-82.
- [13] 孙蕾. 方位词语义辨析 [J]. 外语学刊, 2005 (4): 74-79.
- [14] 田文琪. 准存在句的俄汉对比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2): 43-45.
- [15] 王松亭. 俄汉语中隐喻共性现象对比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5): 18-20+30+1.
- [16] 王志坚. 俄语空间前置词语义扩张机制 [J]. 中国俄语教学, 2003 (4): 21-24.
- [17] 薛恩奎. 俄语空间前置词语义情景结构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2): 51-54.
- [18] 杨明天. 俄语的认知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19] 赵亮. 论俄汉语空间关系词汇范畴意义的原型性 [J]. 中国俄语教学, 2004 (3): 8-14.
- [20] 赵亮, 彭文钊. 俄汉语空间关系词汇的语法化现象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3): 25-28.
- [21] 赵蓉晖, 刘辉. 浅谈俄语代副词 там 和 тут [J]. 外语学刊, 1995 (2): 46-49.
- [22] 章昌云. В 与 H A 和地理名词搭配 [J]. 中国俄语教学, 1988. (5): 36-40.
- [23] 张凤. 俄语前置词的隐喻意义研究 [J]. 中国俄语教学, 2000 (5): 23-31.
- [24] 张凤. 俄汉空间隐喻比较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1): 53-56.
- [25] 张晓燕. 俄汉语时空概念表达对比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4): 52-55.
- [26] 周春祥. 俄语中“在……前面”和“在……后面”的表达法 [J]. 中国俄语教学, 1989 (3): 11-17.

生态批评的方法论反思

邹 艳

(北京建筑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4)

摘 要: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的批评方法, 如批评的崭新视角以及深刻的自我反省等, 已经得到学界多个方面的肯定。但是其方法、学科定位以及文学观等相关的基本理论仍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文回顾了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反思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指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影响, 并构建了生态批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 生态批评; 方法论; 反思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Eco-Criticism

ZOU Yan

Abstract: As a literary criticism, eco-criticism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any academic circle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ts fresh cri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ofound self-reflection. However, many scholars still question its methods, discipline position and literature view.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 reflect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 as a critical methodology as well as its existing problems, points out the impact of these problems, and trie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for eco-criticism.

Key words: eco-criticism; methodology; reflection

近年来, 世界经济高速增长, 现代信息科学技术也随之迅猛发展。与此同时, 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 生态批评就此产生。作为文学的一种批评方法, 生态批评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学界也有着较高的认可度。方法论融入生态批评极大促进了生态批评的研究。

项目基金: 本文系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教育学科立项课题“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2021072)和北京建筑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大学英语教材中生态价值观构建的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 Y21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邹 艳, 女, 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1. 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

在历史长久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人类认为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界，让自然为人的需求服务。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很有可能导致物极必反，因为这种思维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如果长期过度耗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人类将会受到惩罚，自食其果。

事实也证明人类一味地消费自然资源的确带来了恶果，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类与生态的关系，并开始思考人类与生态应当如何和谐共生、长远发展。生态批评是地球遭到严重的破坏后而逐渐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批评思潮。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1978年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正式提出“生态批评”这个专业术语。他提倡将文学以及生态学相互结合起来，让文学为生态服务，在文学中渗透生态意识与理念，并强调：一位批评家应该具有生态学视野，让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存在（王诺，2002）。

生态批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作为一种文学倾向的批判，随着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紧张而逐渐显露出发展潜力和空间。围绕“生态批评”这个主题，学者们开始了一系列行动。例如，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在1991年召开了有关生态批评的主题会议；1992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同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与生态批评有关的文学出版物。1996年，第一本关于生态批评文学的官方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问世。此后，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与环境与文学研究协会成为联盟组织。由此可见，生态批评的兴起、发展和扩展似乎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总的来说，美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自然与环境。第二阶段是如何把生态批评在文学作品中发扬光大，主要深入探讨与描写和自然有关的美国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和风格主题。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吴景明，2007）。目前，许多学者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学者格洛费尔德的定义，即生态批评是对“自然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但其真正出现是在2001年，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王宁主编的《新文学史》收录了乔纳森·贝思的生态批评，该生态批评在中国后期不断发展（王蕾，2015）。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其首要任务便是让人类能够通过文学这一工具去探究人类与生态之间更加合理有序的、长远发展的关系，让人类能够正确审慎地认识目前的生态状况，并能够激发生态意识，提高对生态保护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从而构建人类与生态之间更和谐的关系以及创建更美好的生态环境。

2.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是在来自外部流派的批评声中以及来自内部流派的自我反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批评、环境危机和文学想象，格雷格·格拉尔德（Greg Garrard）所进行的生态批评，均体现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前沿的讨论中，产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变化：生态批评从一个自发的、边缘的领域向一种完全被公认的研究领域转变（苏勇，2015）。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大学的教授迈克尔·科恩在2014年生态批评以及理论研修班第一次的活动当中，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生态批评者阅读的是什么？他们怎么阅读？阅读的方法、基础又是什么？权威是从哪里获得？又希望做出何种贡献？对于给他们的方法的批评是否接受？他采用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应用了杰拉尔德·格拉夫提出的从争论中来学习的技术，部分解决了现在非常极端的争论（曾永成，2015）。他和杰拉尔德·格拉夫一样，希望能够很好地提升现在社会中文化辩论的质量，但是因生态批评发展的历史不长，所以希望这种策略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批评观念的对话及论辩当中，尤其是在生态批评的实践演进当中，不断地提出一些学理上的建构，这对于实践的效果意义重大。对于上述提出的问题，人们比较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态批评在向着整个社会深入发展的同时，还应坚守文学的审美特性，要发扬审美经验对于生态情怀和生态意识的熔炼作用，增强人们在生态事实面前良好的审美敏感度。正如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在“研究过程哲学”里将审美性质看成是一个宇宙自然以及原生的现实所拥有的。世界上自然的美在人类的理智还有实践抽象的过程中，遭到了人们的摒弃与遮掩，所以他对整个世界的美的生态做了一个深刻的揭示。在生态保护的语境下，人类主体对美的感知和体验只能作为认知活动的从属和衍生产品。在美学活动中获得的愉快行为经常被许多生态批评家谴责为“反革命”。一方面，美学始终被视为一种私人和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在生态批评的话语领域，几乎所有经常被观察到的问题都是公开的、集体化的。这种矛盾使得生态批评家不得不回避美的问题，在伦理问题之后单独考虑。此外，生态评论家需要明确指出，许多生态文学之所以能够唤起公众的生态意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品在美学设计上的努力。正是那些细腻的叙事、宽容的形象和优美的文字，使读者在情感和心理维度上与作品的伦理意图和谐相处。简而言之，理论批评与美之间没有冲突，人类普遍的追求或关注实际上可以相互适应。诗歌式的文字之美可以激励读者，并促使他们更加关注自然的美丽。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宣扬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维护了地球的和平。生态批评可以包含美学和伦理目的。生态文学批评应努力创造一种生态诗学，强调生态的概念，加强生态文艺批评理论的建设。因此，生态批评高度关注此类问题。

二是在进行生态批评的时候,对于“环境公正”的诉求应该越来越强烈,而不是只针对人类的中心主义进行激烈地批评。这样做的原因仅是从社会政治生态方面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思想上的深入探究,也就是说进行生态批评时要高度重视其实践性的特点。所以,如何提高和坚守生态批评的实践性特点,对于维护人们现在的生存环境以及克服现在人类的生态危机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是要在生态思维当中,将生态中心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这两个极端对峙的思维消除,从而实现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融合和统一,将以往所谓的“深层生态学”偏颇思想进行纠正。生态批评从第一次演进到第二次突进,实际上是要摆脱生态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的关怀和保护,有可能造成新的生态压迫和不公,避免逐渐演变成生态殖民主义或者生态霸权主义。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探讨了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展现了文学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索。然而,目前大多数文学研究者只是用生态批评的方法来探讨文学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价值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是“现代性”文化和制度的危机。因此,在以生态批评为解读方法时,我们不仅要分析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还要探究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话语。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呈现出以下价值取向:批判欲望、拷问和追问人的主体性;反思以工业文明和科技崇拜为标志的现代发展模式;回归自然的魅力,呼唤自然的神性;对新生态人的塑造,鲜明地表现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态度,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

3. 生态批评方法论存在的问题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从事其研究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其中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忽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以及非均衡性。

生态批评一方面是要揭示生态文学中表现了什么样的自然年、生态危机及其根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另一个方面则是要分析应该通过怎样的艺术形式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很好地表现出来。但是目前的生态批评基本忽略了后者,通过对一个作品进行简单地复述来对生态文艺作品的主题进行简单的阐述,通过词语以及一些简单的话语来支撑“生态”观念。所以无论是批评的视角还是批评的方法都十分单一,缺乏活力,因此得出来的结论基本也是千篇一律。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批评样式,生态批评其实非常具有张力。生态批评的研究方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为指导,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

当前,生态批评方法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非逻辑化。生态批评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尤其在美国批评理论家约瑟夫·密克尔发表了《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之后,几乎所有的

生态批评研究者都认为，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上的倡导等都是由于生态危机的加剧。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但却是不诚恳的，因为生态恶化、物种灭绝以及生态危机其实都不是上个世纪的 70 或 80 年代才发生的。生态批评的提出，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人类的生存遇到了危机，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也许有人会认为，人也是被包含在生态系统里的，但是人只是其中一份子，因此，如果认为生态危机就是暗指人的危机，其实是不合理的，研究是非逻辑化的。另外，生态批评的滥用也是非逻辑化的体现，文学作品中的环境叙事可以是生态的、非生态的甚至是反生态的。衡量一部作品中的叙事是否具有生态文学的意义，关键要看作品是否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生态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环境叙事是否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相联系，而不是只要作品表现环境就具有生态意义。有些研究者在作品中看到有关自然的描写，就会带入生态的概念，而没有详细分析自然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

其二，非历史化。生态危机主要的思想根源其实是唯物发展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至上的思想，而现在的生态批评围绕这三者而展开的批评非常激烈。在进行具体批判的时候只注意到其现实性，而忽略了这三者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必然性和辩证价值内涵。同时，许多生态批评由于过分强调生态文学的特殊性，而忽视了文学的人文内涵。强调生态系统自身的整体利益，的确有助于矫正人们的思想。但是，完全忽视生态文学的人文性，甚至割裂历史，只为突出生态的整体利益，忽略人类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在生态文学中的呈现，这是生态批评现存的一大问题。

其三，去差异化。很多生态批评者都有“众生平等”的人文情怀，认为人类是造成当前生态恶化局面的罪魁祸首。虽然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当中曾破坏了生态环境，全球 70 亿的人都要面对并解决与生态危机有关的问题，但是这忽略了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权、发展权的差异性，忽略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忽略了那些艰难生活的人（代迅，2015）。生态系统本身是沉默的，强调这类作品的价值判断，必然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人的价值内涵。世界上会有完全脱离人类世界、不受人类世界影响的批评者吗？如果说文学的任务是揭示人们的生存状态，考察存在的深度，那么生态文学在这一基本点上与其他类型的文学没有什么不同。生态不是目标，生态文学也不是旗帜，它只是对人类自然启蒙的反思和回应。它不是一个狭隘、保守和自给自足的文学概念。

缺乏对生态文学概念和历史的认识，缺乏对大量生态文学经典的阅读和审美标准，反而对生态理论进行盲目解读，再寻找一些所谓的自然细节作为支撑，是当前国内生态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当生态文学研究超越了应有的学科边界，盲目地走向无限广阔的领域，其结果只能是在践行生态文学理念的过程中抹去其本质内容，这必然对生态文学研究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4. 生态批评的可持续发展构建

相关研究表明，人在面对宏大的、慢性的现象时要保持足够的情感敏感度是极其困难的，比如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物种大灭绝，或者微小的现象，比如空气和水质的污染。这是“叙述移情”这个概念最吸引人的地方。与此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努力培养读者和观众对这些自然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并使其保持关注。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发展，是生态危机情景下历史文化思想的根源之一。如果不关注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同时也不对非生态的文学以及潜在的一些危机进行反思，那么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及生态灾难都只会继续恶化且延续下去。文学家以及生态批评家们必须对文学进行改造，以此来约束人们在自然界犯错，并且惊喜地给予赎罪。有关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上的研究，是一种救赎性质的行动，所以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批评与批评方法论的研究有助于地球和人类更好地生存，但是其绝对不能成为加速人类以及地球灭绝的一种文化运动。生态批评不只是一门专业、一个学科上的分支以及一项学术的活动，它更是一种拯救地球以及人类自我拯救的行动（路璐，2012）。生态批评的任务不仅在于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在于提高对这些问题意义的敏感度，即使有些生态问题看起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作用是纠正这些问题的现实性。承认人类已经对生物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的态度无疑非常积极。人类和其他物种都面临着严峻的未来，但是人类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化解一些由人类引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生态批评的建构需要人类的努力。

4.1 生态批评要以大地为基础

陈茂林指出，“生态批评从以地球为中心的视角进行文化研究”，从而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地上的文学，所以进行生态批评应该立足于大地，其一是本土化，其二是生态认同。当下生态批评在本土化构建上还存在明显不足。虽然生态批评起因于生态危机，但诸多的研究从理论上译介，以西方已经出现了的经典文学文本为主。生态批评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今后无论是进行反思还是向前发展，都需要立足于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地域上以及文化方面的优势，重视本土资源的开拓。在呈现大型事件的信息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基于广泛的视野讲述个体的故事。先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然后在这个视野中聚焦并突出一个具体的故事，再返回到宏大的叙事画面。这种多维话语尤其包含了个体故事与整体阐释之间的变异。就受众接受度而言，这一策略似乎是最佳方案。有关生态认同思想，要在基于本土的生态文化与异质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将本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发掘出来，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寻找蕴含其间的包容性和相同性，于此揭示出生态文化意义。生态认同体现了大地对于人类的滋养价值，

人类日常的生活也离不开对大地的依赖。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和形式,生态学的整体观是生态批评发生的哲学基础。生态学的整体观使文艺的内涵不仅包括社会、文化、地域、性别、人性的内涵,而且纳入了种族、生命、自然、精神,使生态批评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目的性和意义明确的批评、一种责任性和道德性的批评,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和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因此生态批评应该强调生态关怀与人文关怀的平衡、调和与协调,主张以生态关怀为指导,在生态批评中贯穿人文关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应当以为生态与人自身的和谐优化生存服务为目的。

4.2 重视生态批评的发展阶段性

生态批评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依据,若是忽略了其实际的阶段性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性,并以生态批评的最高目标和标准对一切事物进行衡量,将会阻碍生态批评的长远发展,所以要从现实的可行性角度出发,正视生态发展中具有的阶段性。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毫无用处,而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因为不管如何发展,人性当中具有的极端性没有办法消解,所以人类在发展进步的同时,要清醒意识到所处的现状,尊重生态批评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的阶段性,同时还要重视人类在接受一种新的思维时,有其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征,基于此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之路。

4.3 生态批评需要走出去

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作为直接动力和宏观背景,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生态批评等人文科学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取向。这些社会责任包括:提高和深化公众对环境和环保问题的认识,重塑主体对环境问题相关重要事项的思维方式,以更合乎伦理的方式对待其他物种,促进个人和社会以更温和审慎的方式处理与人类、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人类发展。生态批评区别于其他的文学理论,有其鲜明的行动性及实践性。目前主流的生态领域思想倡导行动主义,鼓励积极地迈开脚步走出去,学会迎接世界迎接文学,并寻找其中密切关联的部分,使其和谐共生。同时要将生态批评的大门进一步地开放,使其能够更好地趋于完善。如同我们的国家向前发展,并不是简单地闭门造车实现的,而是通过改革开放,让国人走出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之后通过不断的努力才发展起来。因此,当下生态批评要进一步发展,不能故步自封,同样需要走出去和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思想交流,产生思想碰撞,同时学习并运用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才能促进生态批评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生态批评正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要正视其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存在的问题。生态批评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以及不懈的探索,才能

够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生态批评的发展要立足于大地，并且要重视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还要坚持走出去的生态批评道路。做好这些，生态批评才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并完善。

参考文献：

- [1] 代迅. 英美法生态批评的三个关键问题 [J]. 学术月刊, 2015.47(11).
- [2] 路璐. 生态批评及其限度研究 [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2.7.
- [3] 陈茂林. 新世纪西方文化展望: 文化研究与生态批评 [J]. 学术交流, 2003(4).
- [4] 苏勇. 生态批评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6).
- [5] 王蕾. 简述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J]. 文学教育(下), 2015(6).
- [6] 王诺. 生态批评: 发展与渊源 [J]. 文艺研究, 2002(3).
- [7] 吴景明. 走向和谐: 人与自然的三重变奏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8] 曾永成. 评《西方生态批评史》[J]. 东方论坛, 2015(3).

《柑橘与柠檬啊》的战争创伤与伦理反思

吕春巧 刘胡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现当代英国作家麦克·莫波格在《柑橘与柠檬啊》一书中讲述了主人公托马斯在战火中成长并得到救赎的故事。托马斯在兄长查理被处决前用 7 小时 54 分回忆起自己悲喜夹杂的童年以及不堪回首的战地经历。在创伤理论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烛照下, 托马斯的成长路径可以被看作是战争中普通士兵所遭遇的创伤与伦理两难的缩影。从该层面看, 小说体现了莫波格对战争纵容权力之恶的洞察, 并以此凸显底层士兵的人性光辉; 同时折射出当代英国战争小说的主题: 不再聚焦于宏大的战争叙事和战争正义与否, 而是表达强烈的反战思想, 并呼吁关注战争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体验和价值。

关键词: 创伤; 伦理困境; 伦理反思; 自我成长

War-induced Trauma and Ethical Reflection in *Private Peaceful*

LV Chunqiao LIU Humin

Abstract: In *Private Peaceful*,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Michael Morpurgo tells the story of Thomas, the hero, growing up in the war and being redeemed. Thomas spent seven hours and fifty-four minutes reminiscing about his bittersweet childhood and brutal wartime experiences before his brother Charles was executed. Under the light of trauma theor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omas' growing pat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what ordinary soldiers encountered in war. Through this novel, Morpurgo reveals the evil of abusing power in war while highlights the brilliance of human nature in these soldiers.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British war novels: no longer focusing on grand war narratives or whether the war is just, but expressing strong anti-war thoughts and calling for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 and value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in the war.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叙事和伦理反思研究”(项目编号: 19BWW07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吕春巧,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刘胡敏,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创伤文学和希腊罗马神话研究。

Key words: trauma;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reflection; growth

0. 引言

麦克·莫波格是英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剧作家，于2003年获得英国儿童文学最高荣誉奖项——童书桂冠奖。同年，《柑橘与柠檬啊》（*Private Peaceful*）一经出版就囊括了许多奖项，包括卡内基文学奖、红房子儿童图书奖、蓝彼得丛书年度奖、加利福尼亚青年读者奖章等。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托马斯在战火中成长并得到救赎的故事。全文由时间和回忆构成，时钟嘀嗒：十点五分、十点四十分、接近十一点一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托马斯在怀表旁守候着，回忆着，等待着天明和最后的结局。《柑橘与柠檬啊》原译名为《二等兵皮斯佛》，译者在译介时选择书中这首反复出现的童歌作为书名，不仅因为这是托马斯的心灵与勇气之歌，还因为它似乎预示着纯真童声掩盖下的残酷现实，正如歌中唱到：“来了一支蜡烛把你照到床上，现在有一架直升机来砍你的头！切，切，切，最后一个人死了。”《柑橘与柠檬啊》不仅是写给儿童的故事，也是给成人的文学，里面有许多值得挖掘和深思的丰富意蕴。然而，评论界对此关注甚少，仅有的几篇期刊和一篇硕士论文都聚焦在小说的成长主题上，从成长小说的视阈来解读该作品。本文将视角聚焦在残酷的战地、少年的创伤与对伦理的思考上，通过关注战争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体验和价值来反映作者的反战思想。

1. 家庭：被掩埋的伤痕

创伤具有后延性，早期的创伤经历在当时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经过一段“潜伏期”会发作。对此，凯西·卡鲁斯曾在其著作《无人认领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中给出关于创伤最为权威的定义：“创伤是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而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迟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Caruth, 1996: 11）。

主人公托马斯在懵懂的童年时期遭遇了第一次创伤——目睹父亲为救自己而被巨木压死。“他被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压在地上，身体朝天，脸却别到另一边，仿佛不希望我看到。他一只手臂往我的方向伸来，手套落在地上，指头也是指向我。从他鼻孔流出来的血沾到树叶上。他的眼睛睁开，但是我知道那双眼睛并不是在注视我：他已经没有呼吸了。我摇晃他，对他大吼，但是他没有一点反应”（Morpurgo, 2009: 15）^①。托马斯在潜意识中认为，父亲因救自己而死，而父亲的死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变——“这一切的悲剧都是我造成的。我杀了自己的爸爸”（18）。

创伤理论表明，大量的创伤会排斥所有的表征，因为普通的意识机制和记忆被暂时破坏了——但它们却会以“闪回”（flashbacks）、噩梦以及侵入性思绪延迟地再现（Krystal, 1990: 6）。年幼的托马斯曾做过许多充满怪兽和老小孩的梦，“但不管噩梦的情节如何，最后的结局总是一样。我跟爸爸去树林里，那棵树会倒下来，然后我就从梦中惊醒”（33）。幸运的是，托马斯的身旁有哥哥查理，一个能让他感到安心、被保护的人。不堪噩梦缠绕和良心的谴责，托马斯曾两次试图向查理坦白一切，却因犹豫胆怯而错失机会。

查理是托马斯在充满创伤回忆，家庭剧变和向青少年过渡时期的唯一支柱。查理勇敢、可靠、正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父亲的角色。但兄弟两人却爱上了同一个女孩，托马斯唯一的支柱轰然倒塌。苦于年龄上的差距，他感到自己和哥哥、茉莉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三人再也无法并肩同行，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远去。好奇心、妒忌心充斥着他，直到茉莉怀孕，要住进查理的家。

“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2014: 257）。当托马斯还在幼稚地以两人之间的比较来标示自己的成长时，曾经的好玩伴、自己暗恋的姑娘变成了哥哥的爱人；一直以来最可靠的兄长变成了自己的假想敌和情敌。伦理身份的急剧转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伦理混乱，托马斯面临着难以调解的冲突——一方面他欣喜若狂，因为能跟茉莉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更加亲密；另一方面他却痛苦万分，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打败哥哥，永远也无法跟上两人的步伐。“全世界我最爱的两个人在追寻对方的过程中遗弃了我。我觉得他们夺去了我最宝贵的东西，这让我彻夜难眠，我感到一种叫仇恨和痛苦的小虫日夜咬噬我的心。我想恨他们，但我不能。我感觉在这个家，似乎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处，也许我应该离开，特别是离开他们两人”（84-85）。创伤记忆和伦理混乱逼迫托马斯做出选择：他远离家乡，天真地想躲进战场杀敌立功的荣誉感中，却遭到了真正的冲击和毁灭。

2. 军营：直面荒谬与权力之恶

初入军营的前几周是新兵受训的日子。直至今刻，托马斯还对战争抱有幻想，在他看来，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模拟战争的游戏而已，每个人都是穿上戏服排练戏码的演员。但为了演得逼真，军官要求他们必须破口大骂——“在往前冲刺时，嘴巴必须对稻草人喊出一堆脏话……当我们在做捅它、扭转刀柄、而后拔出的连续动作时，口中还得大声咒骂丑恶的德国人”（99）。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辟了人类战争史的新纪元，大量新型武器开始投入使用：化学武器、喷射枪、远程炮弹等。遑论刺刀能否派上用场，仅是嘴上必须如同幼稚孩童般破口大骂就足够可笑了。种种闹剧给人一种假象：他们离鬼魅般的战场很遥远，参军如同儿戏。但这样的幻想很快被残暴的军官打破。

“皮斯佛，目视前方，你这个笨蛋！”“趴到泥土里，皮斯佛，你属于那里，你这条肮脏的虫。”“老天哪，难道皮斯佛是他们送来最好的阿兵哥吗？根本就是社会的败类，你这糟糕的败类，……”（96-97）。只因查理从不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韩利中士就想设法折磨这两兄弟。咒骂和人格侮辱是最常见的事情，可怕的是各种无理由的体罚，“我越累，就越容易犯错，而我越犯错，韩利就给我越多的处罚”（107）。有一次，托马斯甚至被体罚到昏迷，查理找韩利说理却被公开处以“田野惩戒”：那天下了倾盆大雨，他双腿分开双手被绑在大车轮轴上整整一天。全连的士兵都要去检阅场观看这场处罚。不仅如此，韩利还不遗余力地折磨着其他士兵：从早到晚日日夜夜地操练、演练、磨练和校阅这些在毒气和壕沟战里幸存下来的、筋疲力尽的士兵。他们被抽去了最后一丝力气和希望，“我们都对他恨之入骨，他甚至比德国佬还令人憎恨”（138）。

所有军人都为投身沙场而自豪，渴望英勇杀敌，报效祖国。托马斯也不例外。他幻想能在军营中得到锻炼，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但韩利的所作所为使所有士兵都遭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战场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士兵们精神紧绷，忍受着不断咆哮的炮弹声，四肢因长期高压而僵硬无力，还要面临着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从炼狱般的战场归来，本应该能喘息片刻，却还要不断地演练，直到筋疲力尽，摔倒在地。身体上的不自由和无能为力也影响着心灵。在军营，士兵必须对军官毕恭毕敬，谨言慎行，即使上头的命令再荒谬也只能听从，否则就是无止境的针对、羞辱、处罚，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身在军营却如在战场，时时刻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长期的精神高压使得士兵们痛苦不堪，却又无法言说与反抗。唯一敢于对抗邪恶势力的查理被草率处死仿佛也警示其他人，沉重压抑的气氛弥漫，人人自危。

查理与韩利多次矛盾积压，韩利羞愤难当，决心置查理于死地。韩利率领百名士兵到前线加强兵力，途中德军突然进犯，他们不得已躲进无人地带——德军的防空洞内，来不及躲避的士兵像“苍蝇一样”被一一击毙，德军手持机关枪三面包围着防空洞。而韩利却下令所有人冲出去进攻到底，留下不听令的人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查理提出建议但无果，为了保护受重伤的弟弟，他只能留下来。

结果显而易见，半数被迫跟随韩利冲出去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回来，而背着托马斯的查理一回到军营里就被逮捕了。整个审判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性命——“……没有一个人肯听我说。他们有自己的证人——韩利，而法庭只是想听他的证词而已。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审判。他们坐下来讨论案子之前，老早就做了决定”（163）。即使军官们知道韩利的错误指令造成了十几名士兵丧生，查理的做法是对的，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判决结果。更讽刺的是，一个勇敢地提出抗议以求保全大局的士兵却被判以“懦弱罪”要被枪决。代表

公正无私的法庭在战争中也沦为空有外壳的傀儡，能随意决定底层士兵生命的只有这些高高在上的军官。他们给予战士的不是应有的信任和支持，而是怀疑和对伤患遭遇的漠不关心。

战争造成了伦理秩序的土崩瓦解，军官们化身为暴虐的恶魔，利用自身权力践踏着底层士兵。政府的权威、军人的伟大理想和荣誉感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被割裂为虚无缥缈的东西。托马斯通过切身经历再次确认了战争中政府同士兵之间关系的崩塌，同时也对战争的本质加深了怀疑。残酷的战争滋养着军队里邪恶的权力泛滥，士兵沦为荒唐可怜战争机器。

3. 战争：在重创中成长

在军营所经历的种种荒谬只是一个开始，真正使托马斯陷入无边恐惧和重重创伤的是噩梦般的战争。

托马斯第一次直面真实的战争是目睹自己的好朋友兼战友勒思死去的样子：勒思侧躺在地，头部中弹，眼睛仿佛盯着他看，表情惊讶。当托马斯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德军开始机关枪扫射，来福枪轮番上阵，最后还开始了轰炸。他和查理竟与一名德军战俘抱成一团。一开始，只要是听到炮弹声，托马斯和战友们都会吓了一跳，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这一次，德军的轰炸行动瞬时展开，整整持续了两天。“外头的轰隆声让我们无法交谈。我小睡了一会儿，梦见一只手指着天空，而那是爸爸的手，我颤抖着醒来。……有时候，我会哭嚎得像婴儿一样，就连查理也安抚不了我”（129）。

残忍的战争攻破了少年的心理防线，他会发颤、像婴儿般哭嚎，只要轰炸声能停下，只要能够马上结束这一切，即使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德军的毒气、手榴弹、喷射枪都无所谓。漫长的轰炸让他退回到最脆弱的自我保护状态，但战争的创伤又触发了早期的创伤经历——父亲因自己而死，于是他不断地做噩梦。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的《精神诊断与统计手册》首次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做了正式的解释，列出了创伤的各种症状如“害怕”（fear）、“无助”（helplessness）和“恐惧”（horror）等等。1994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进一步将PTSD界定为“在受到一种极端的创伤性刺激后连续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特征的症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经受真实战争洗礼的托马斯早已幻灭，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在这儿的早晨，我却必须每天在相同的恐惧中惊醒，我知道自己即将再度面对死亡”（139）。

这样的轰炸事件当然不只一次。当托马斯和查理在灯光下安静地谈话时，炮弹飞啸而过，落在了很近的地方。激烈的决斗从头顶爆发开来。震耳欲聋的炮弹怒吼着，偶尔枪声会停止，给人以希望的幻象，而过几分钟又将希望夺走。托马

斯起初假装无事发生，但一段时间后开始恐惧，再也压制不住——“我发现自己像球一样在地上打滚，一直嚷叫着要这一切全部停止”（154）。自我欺骗、沉默、恐惧过后是尖叫，紧接着到孩童般的撒泼耍赖，这些都是战地少年面对残忍战事所做出的反应。而一旁的兄长查理也像安抚孩童般轻轻地哼唱那首勇气之歌《柑橘与柠檬啊》。但这一次，亦兄亦父的查理安慰不了他，最熟悉的歌声也没能给他勇气，“都无法驱走那个侵占我、吞没我的恐惧……我现在拥有的只有恐惧”（154）。

受困的绝望、不停遭受死亡的威胁，加上被迫目睹战友的残废与离逝而无任何得救的希望，使得托马斯像罹患歇斯底里症的病人一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但最终压倒托马斯的是查理不可改变的命运。托马斯曾将其参军行为归结为无法想象与查理分离的痛苦，他们分享所有的事情，包括对茉莉的爱。面对军营里毫无人性的军官，托马斯也处处受到他的保护。可以说托马斯既活在查理的阴影下，也活在他的光环里，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然超越血缘之亲。查理的离去带走了托马斯心里的某一部分，但也赋予了托马斯走出创伤回忆、消解伦理两难的可能性。

海尔曼曾在其著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中讲到，“在安全、受到保护的关系中，讲述故事这一行为（the action of telling a story）对创伤记忆的反常过程似乎有效果，……由恐惧造成的躯体性神经病（*physioneurosis*）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得到明显的治疗”（Herman, 1992: 131）。因为倾听者在倾听的过程中，“帮助幸存者将创伤事件重新外化、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新评价，帮助幸存者对自己做出公正的阐释，重建正面的自我观念”（师彦灵，2011: 136）。

在与查理临刑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托马斯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讲述那天发生在森林里的事情。而查理和母亲早就从他的梦话中得知：“托马斯，我早就知道了，妈妈也知道。……这些全都是无稽之谈，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是那棵树杀死爸爸的，托马斯，不是你”（166）。作为托马斯的倾听者，查理对这个创伤事件进行了重新的定位：这是不可预知的意外，并不是托马斯有意害死父亲。作为托马斯潜在的“受害者”，同样丧父的查理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从未怪罪过他。正是这短短 20 分钟的讲述和倾听帮助他重新认识多年前的意外，也重新建立正确的自我观念，不再囿于杀害父亲的假象，而是客观地审视过去发生的一切，摆脱纠缠多年的噩梦与内疚。

而查理的死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三人行的伦理困境。参军后的托马斯并没有就此遗忘茉莉，在被炮弹轰炸而掩埋在土堆里的生命危急之时，他还在想着茉莉，并承诺到死的那一刻也要想着她（156）。查理和茉莉结合而抛弃自己始终是托马斯的心结，但他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永远不可能拥有茉莉而舍弃哥哥，也不愿因哥哥而放弃对茉莉的爱。而查理临刑前将茉莉以及他们的儿子“小

托马斯”托付于他，是使他能够继续在残酷战争涡旋里反抗斗争下去的信念。查理的正直和勇气为他做出了最好的伦理示范，托马斯对茉莉和小托马斯的爱将持续下去，消解所有的妒忌、怨恨和后悔。这一次，他真正长大成人，由死而生地进入新的人生阶段。

4. 结论

童年时期目睹父亲为救自己而被巨木砸死的惨状使创伤深植在托马斯年幼的心灵。父亲的离去、家庭的剧变、茉莉的到来，原本的伦理环境遭到了破坏，身份突变带来的伦理混乱难以调解，托马斯急需一个新的伦理环境——于是他投身战争。但战场才是真正的炼狱。在军营里遭受羞辱、体罚、处于无休止的戒备状态使得他身心俱疲，直面残酷战争的侵袭更是让他罹患精神创伤，听到轰炸声会如同孩童般大哭大闹，每天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哥哥查理被草率处死让托马斯更加看清政府的真面目，认清战争荒谬的本质——摧毁伦理秩序，造成人性沦丧，妄想从中得到荣誉的底层士兵只会深陷创伤的泥潭。托马斯的经历从侧面来说只是一个缩影。

1914年到1918年间，欧洲各大国都被禁锢在这场有史以来自我毁灭性最强的世界大战中。上百万的士兵被推上战场，其中不乏像托马斯兄弟这样的普通少年，被迫投入这场毫无意义的消磨战中，如同军火器械、瓦斯毒气、炮弹等成为战争中的消耗品。仅在1916年7月1日这一天，英军就损失了60000名士兵（死亡及伤残人数）。每一个有血有肉有名字的英国士兵都被命运裹挟着，被非理性的力量整合，丧失了个人身份，卷入战争的齿轮中，共同奔向毁灭性的终点。决定普通个体命运的，只有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和所谓的政治。

而麦克·莫波格却通过写作将目光聚焦在战争中的士兵，最普通的底层个体身上。这一次，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和鲜活的经历，有了独特的名字——皮斯佛（Peaceful），意味着“爱好和平的”。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参军士兵的非理性动机——想要“冒险”、为了追逐光荣的幻想、被扣上“保卫国家”的帽子，甚至是因从众心理而结伴入伍。而后不可避免地幻灭、受创但无法逃离仿佛无休无止的战争。查理的故事并非是有意识渲染或是凭空想象，残酷的战争的确纵容着权力泛滥和人性之恶的疯狂滋长——根据考证，在一战中有超过300名英国士兵在黎明时被枪决，罪名是懦弱或擅离职守，其中还有两名士兵是因为守哨时睡着了（173）。而被送上所谓的军事法庭也只是草率地走流程，一般20分钟就宣判定案，没有任何证人也没有任何上诉的可能。这些被处决的士兵中最年轻的才17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自始至终都不允许军方处决自己的士兵，而历任英国政府都拒绝承认他们对这些士兵不公平，拒绝提出道歉。这些因炮弹震惊而身心受创的士兵不但没有得到正确治疗，没有得到政府和民众

的同情，还被残忍枪决。他们身上难以言说的创伤也如同幽灵般在后代传递，难以磨灭。

但复杂的战争也是凸显人性光辉的绝佳底片。小说不再争论战争的正义与否，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政治立场，而是流露出对底层士兵的同情以及赞扬。作者借查理之口道出了真相——“德国人跟我无冤无仇，我干吗杀他？”（90）战争没有对错，牺牲的永远是普通百姓。从德国士兵与英国士兵的交集中也能看出牵扯在战争中的人们有血有肉，而不是巨大战争机器的一个部件；他们都明白彼此不是仇人，错误的是争夺利益和资本的黑暗力量。当一个德军囚犯在树下躲雨，大喊“托米”，跟托马斯打招呼时，托马斯能感觉到，他们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当法国女孩安妮因轰炸而死，得知消息的托马斯俯身亲吻埋葬她的大地时，场面令人动容；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托马斯手无寸铁走进德军防空洞时，素不相识的德国士兵放走了他。

麦克·莫波格擅长以小见大，如在《战马》中通过一匹马的“视角”去剖析战争；他在《柑橘与柠檬啊》中透过托马斯的成长轨迹，反思战争的荒谬以及带来的创伤和思考。该小说的创作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英国战争小说的转向，战争本身或战场不再是中心，而是作为大背景，战争下的普通个体成为考察的对象，个人的价值和经验得到充分重视。

注释：

- ① 文中所引原文皆出自麦克·莫波格的《柑橘与柠檬啊》，柯惠琮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版，不再一一注出。

参考文献：

-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 [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 [2]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 — 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 [4] Krystal, John. “Animal Model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Earl L. Giller Jr. Washington, D.C. ed. *Biolog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M].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1990.
- [5] Morpurgo, Michael. 柑橘与柠檬啊 [M]. 柯惠琮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
- [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7] 师彦灵. 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9(02): 132-138.

《儿童时光》：海尔曼的自传式书写

方 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州 510420)

摘 要:《儿童时光》是丽莲·海尔曼的处女作及成名作。自上演以来,该剧一直因其戏剧性的情节和对同性恋的指涉被贴上“佳构剧”的标签,而该剧本身的文学魅力和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却被忽视。通过摹制《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庭场景,海尔曼构建了凯伦与鲍西亚之间的镜像关系,以展示二人在“智慧”与“仁慈”的面具下的复杂面孔,而凯伦身上的复杂矛盾特质被证实为作者海尔曼的自我映射,揭示了《儿童时光》的自传性特征。

关键词: 莉莲·海尔曼;《儿童时光》;凯伦;鲍西亚;自传性

The Children's Hour: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Lillian Hellman

FANG Fang

Abstract: *The Children's Hour* is Lillian Hellman's debut and masterpiece. For decades, *The Children's Hour* has been labelled as a “well-made play” due to its dramatic plots and involvement with homosexuality, while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play and the author's true intentions in creating this work have always been ignored. By copying the court scen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Hellman constructs the mirror-im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ren and Portia, to present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under the mask of “wisdom” and “kindness”.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how Karen serves as an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 for Hellman since the complicated and contradictory qualities of Karen are proved to be the self-reflection of Hellman.

Key words: Lillian Hellman; *The Children's Hour*; Karen; Portia; autobiography

0. 引言

作为 20 世纪美国戏剧界继阿瑟·米勒之后最重要的“易卜生主义”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凭借其作品中极具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对道德善恶的探讨跻身美国剧坛,被称为“美国第一个进入由男性主宰的

作者简介: 方 方,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电影文化研究。

戏剧界的独立女性剧作家” (Titus, 1991: 20)。

《儿童时光》(*The Children's Hour*) (以下简称《儿》) 是海尔曼的处女作及成名之作, 一经上演便成为当年的黑马, 立即在美国戏剧界引起巨大轰动。该剧以一个孩子的谎言为线索, 描述了深陷“同性恋”指控下两名年轻女教师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危机。故事最终以“出柜”女教师的自杀和异性恋女教师对中伤者的宽恕结束。由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 “同性恋”仍然是不可描述的禁忌话题, 当年的评论大多指向海尔曼如何呈现这一敏感题材, 该剧如何充满戏剧性与哗众取宠的噱头, 以及如何符合“佳构剧”的特征。因此, 《儿》立即被贴上诸如“情节剧”和“佳构剧”的标签, 而该剧本身的文学魅力和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却被忽视。

时至今日, 文学评论界仍然充斥着许多对《儿》的分析和解读, 时而以具有女同性恋身份、离经叛道的玛莎为出发点, 分析该剧对同性恋题材的呈现; 时而以满口谎言的邪恶孩子玛丽为主要分析对象, 讨论道德善恶的伦理困境。遗憾的是, 很少有人将研究重心放在个性相对冷静、心理相对平衡、理性胜过感性的凯伦身上。

笔者旨在将一直被置于聚光灯之外的凯伦拉回舞台中央, 剖析凯伦的角色特点, 并通过再现凯伦对《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以下简称《威》) 中鲍西亚一角的影射, 考证凯伦这一角色实质上是作者海尔曼的自我映射, 从而揭示《儿》的自传性特征。

1. 凯伦对鲍西亚的映射

《威》的女主人公鲍西亚 (Portia) 是莎士比亚笔下最具个人风格的女性角色之一, 她美丽高贵、聪慧勇敢、有情有义, 在法庭上凭借机智与口才击败“贪婪残暴”的犹太人夏洛克 (Shylock) 而救下友人的性命。因此, 她常常被看作是莎士比亚笔下象征着正义与智慧的女神。凯伦是《儿》中的女主角之一, 独立自信、理智冷静, 与密友玛莎 (Martha) 白手起家创办学校, 最终在流言蜚语的洪流下顽强地挺过来, 选择勇敢地遗忘过去, 宽恕中伤者, 因此, 也给读者留下了“理性”“富有仁慈和恻隐之心”的印象。实际上, 海尔曼在《儿》的创作中摹制了《威》中的法庭, 别出心裁地将凯伦置身于一个以“微观刑罚”为特征的“模拟法庭”——学校中, 并通过影射《威》法庭斗争一幕中体现出来的不平等博弈, 构建凯伦与其周围“客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以展示权力持有者的凯伦和鲍西亚在“智慧”与“仁慈”的面具下的复杂面孔。

当凯伦在《儿》中首次登场时, 她的人物形象便是通过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的。“她 (凯伦) 一走进教室, 姑娘们马上变了模样, 变得乖巧起来: 她们都很喜欢凯伦, 也十分尊敬她” (Hellman, 1960: 10)。如福柯所说: “只要

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每一个人在这种监视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1999: 158），凯伦的在场即象征着一种无需多言的“规训”，使孩子们自觉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作为学校的创办人兼女教师之一，凯伦在女子寄宿学校中“权力主导者”的身份凸显于与“坏学生”玛丽（Mary）的对峙过程中。在第一幕中，一眼看破玛丽“采”来的鲜花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废弃品，凯伦非但没有给她台阶下，反而当众拆穿了她的谎言，甚至还沉醉在玛丽的奉承话中的莫特太太（Mrs. Mortar）也加入对玛丽的“批斗”，这无疑已经伤害了一个14岁孩子的自尊心。在与玛丽的交谈中，凯伦不但厉声直呼玛丽的名字，还使用诸如“住口”“我对你的那套胡言乱语丝毫不感兴趣”（Hellman, 1960: 13）之类的话语，用教师的权威向玛丽施压。在说教无果后，凯伦开始对玛丽宣判相应的处罚，并强调处罚是目前唯一的出路——禁止玛丽参与多项集体活动。在“窃听”事件发生后，凯伦又强行将玛丽与室友分开，并责备玛丽才是那个“害群之马”，败坏了整个寝室的风气。凯伦对玛丽的规范化裁决模式与福柯所说的“微观刑罚”近乎类似，即一个小型的“法庭模式”，通过对学生宣判奖惩完成对学生的标准化“改造”，使权力集中到教师或学校管理者手中（1999: 201）。这一“法庭模式”的模态，使《儿》与《威》之间的关联性浮出水面。

显然，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威》亦隐含着权力关系，但区别于《儿》的是，在《威》中，个体的身份让位于社会团体的身份，以体现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运作。鲍西亚在“法庭斗争”中所代表的基督徒的“主体”地位，正是通过她与夏洛克所代表的犹太人“客体”的不平等博弈确立的。

犹太教与基督教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贯穿《威》剧始终，在全剧高潮部分——第四幕第一场由鲍西亚操控的“法庭斗争”中得到最佳体现。

鲍西亚出庭后，开口便问公爵：“这儿哪一个是那商人，哪一个是犹太人？”（莎士比亚，1994: 76）这种对案件当事人有区别的称呼，与其说是鲍西亚有意地插科打诨，不如说是由该时期的社会权力中心占上风的话语模式决定的。鲍西亚在正式“审理”案件之前，就将案件当事人按“商人”与“犹太人”区分开来，与该剧标题《威尼斯商人》相呼应，暗示了案件的结局孰为王、孰为寇。同时，这种在话语上将犹太人与一般公民隔离开的行为，正是影射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犹太人被视为“异教徒”，被迫驱逐到“隔都”之中，与一般公民隔离开的行为。作为一个“法官”，鲍西亚是法庭上话语权的持有者。“话语权的持有者，可以构建胜利、历史、理性的权力，可以将异己的话语建构为‘他者’，让它保持沉默，将它排斥和放逐，因此剥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力量的最简洁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其沉默”（刘晓露、熊力游，2012: 130）。鲍西亚与夏洛克周旋的过程，实则是鲍西亚垄断话语权的过程，亦是夏洛克被“消声”的过程，凯伦与玛丽的

对峙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再现。

在《儿》的第一幕中，莫特太太不厌其烦地向佩奇（Peggy）示范如何正确朗读《威》剧中鲍西亚关于“慈悲”的著名台词：想象自己是鲍西亚，你在为一个人的性命求情，如此便可饱含深情和怜悯地朗读（Hellman, 1960: 7）。凯伦听到鲍西亚的名字后，做出的反应和评价都十分耐人寻味：她先是笑着问佩奇喜不喜欢鲍西亚，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又拍了拍佩奇的头说：“我以前也读不懂鲍西亚的台词，现在依旧读不懂”（Hellman, 1960: 11）。接着，凯伦立刻又将话题转移到玛丽身上，似乎给《儿》剧中关于《威》剧的指涉就此画上一个句号。

事实上，关于《儿》剧对于《威》剧的戏仿，国内外早有学者取得了可贵的研究成果。菲利普·阿马托（Philip M. Armato）指出了《儿》对《威》中受害者/加害者综合征的再现（Armato, 1973: 444）；张欣（2016: 23-24）指出《儿》中复杂的人物模态实则是对《威》中人物关系结构的戏仿，并探讨了仁慈与正义的伦理困境。可见，《儿》对《威》的指涉并没有在第一幕就结束，反而贯穿始终。

结合鲍西亚所代表的社会团体与阶级，重新细读她在法庭上关于“慈悲”的深情讴歌：表面上鲍西亚卷入的是一场关于金钱的纠纷，实际上是一场稳操胜券的“权力的游戏”——和夏洛克打官司不过是谋求杀鸡儆猴之效，以维护和巩固基督社群的权利主体地位。三千块钱的债务对出身高贵、坐拥庄园的她来说简直微不足道。论及社会地位，鲍西亚是“贝尔蒙特一位富家的嗣女”（莎士比亚，1994: 10），且求爱者大多为皇亲国戚。而夏洛克却因为受宗教和种族的双重歧视，被视为社会的“异端”，根本无力与鲍西亚抗衡。讽刺的是，在一步步将夏洛克推向深渊之时，鲍西亚却一再请求夏洛克对安东尼奥施以怜悯恻隐。可见，鲍西亚向夏洛克请求的“慈悲”只是她残忍剥夺夏洛克生存和信仰权利的遮羞布，是胜者向败者、主体向客体、强者向弱者的无赖索取，这与她声情并茂所说的“慈悲的力量高出权力之上”（莎士比亚，1994: 76）形成巨大的反差和艺术张力。

在《儿》剧的最后一幕中，凯伦对前来忏悔的蒂尔福德太太（Mrs. Tilford）表现出超乎常理的“仁慈”和“怜悯”实际上是对鲍西亚台词的影射，从而证实凯伦对鲍西亚的负面评价并非肺腑之言。相反，凯伦不仅读得懂鲍西亚，而且当陷入同样的伦理困境时，凯伦会毫不迟疑地做出和鲍西亚一样的抉择——做“正确”的事，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为了构建凯伦与鲍西亚的镜像关系，海尔曼别有用心地为凯伦安排了未婚夫这一角色，以明确凯伦的异性恋身份及其对正统社会制度的认同。

在第三幕中，两位丢了工作又输了官司的年轻女教师像困兽一般躲在昔日热闹拥挤的学校里。凯伦的百无聊赖与玛莎的强颜欢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凯伦多次提出“我们出去走走吧”（Hellman, 1960: 65）“我们应该去城里，去购物”（Hellman, 1960: 66）“我们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Hellman, 1960: 67）。而

玛莎则对于长久性的“闭关禁足”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她计划好每天什么时候沐浴、梳头、做饭、签收包裹，对凯伦的“外出”提议表示漠然。她们对此次危机做出的不同反应已奠定了两人截然不同的结局。

凯伦无疑是过去那个“正常”的生活秩序的受益者。她既有一个体面帅气的未婚夫，又有一份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她对“外出”的渴望实则是被那个她所熟悉的、安全稳定的异性恋父权制社会所重新接纳。玛莎突如其来的表白无疑是凯伦回到“过去”最大的绊脚石。因此，玛莎的死对凯伦来说，与其说是一次重创，不如说是一种成全——正是玛莎的死给了她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契机。所以，面对玛莎的自杀，凯伦表现得分外冷漠，且一滴泪也没流。然而面对稍后前来道歉的中伤者蒂尔福德太太，她却慷慨地施以“仁慈”和“恻隐”，甚至抱歉地对蒂尔福德太太说：“这件事于我终是过去了，可是于你，却将是一生的困扰。玛丽伤害了我们，但相比之下，她对你的伤害更深”（Hellman, 1960: 85）。言外之意，凯伦“将自己与蒂尔福德太太并置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却将身亡的玛莎排除在外”（张欣，2016: 24）。可见，凯伦对蒂尔福德太太的“仁慈”，实则是对尸骨未寒的玛莎的残忍补刀，证实了凯伦与正统异性恋社会秩序的共谋，正如鲍西亚恳求夏洛克施予安东尼奥以“仁慈”，实际上只是把夏洛克无情地推向社会边缘，以恢复正统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华丽伎俩。

2. 凯伦——海尔曼的自我映射

作为其处女作及成名之作，《儿》并非海尔曼的杜撰，故事原型来自1811年苏格兰一起真实的诉讼案件。原案件中，两名老友——玛丽安·伍兹（Marianne Woods）和简·皮尔（Jane Pirie）白手起家，终于在1809年合伙创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而次年，两人被16岁女学生简·卡明（Jane Cumming）指控有着“有伤风化的不检点行为”。卡明的祖母——当地有影响力的名流太太——海伦·戈登（Dame Helen Cumming-Gordon）作为这所女子寄宿学校的赞助人，立刻停止了对该校的一切资助，并通知所有就读学生的家长“出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务必安排孩子们退学。几天之后，学校的运营彻底停滞。两名教师寻求法律武器，将这场风波搬上法庭（Faderman, 1993: 135）。

在海尔曼的创作中，案件的两位原告女教师，一位被给予了玛莎·多比（Martha Dobie）这一姓名，另一位则被给予了凯伦·莱特（Karen Wright）这一姓名，并设置了其未婚夫约瑟夫这一角色。单就姓名的编写而言，海尔曼的别有用心便浮出水面。凯伦的姓氏是“莱特”（Wright），与英文中“正确的”（right）一词同音，意味着凯伦是正统道德秩序的捍卫者，是符合社会规范的“正确的人”，其未婚夫的角色更是暗示了凯伦符合主流的“正常”婚恋观。正如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对凯伦的评价：“凯伦是理性的，是异性恋的，是头脑清晰的，

是有点无趣但有涵养的，是心智平衡的，是不受感性左右的”（Rollyson, 1988: 66），而诸如“理性”“异性恋”“心智平衡”等正是海尔曼本人竭力向外界所展示的性格特征。海尔曼对凯伦姓氏及其角色性格特征的安排暗示着凯伦这一角色实则是海尔曼自身的投射，凯伦的伦理选择实则反映了海尔曼自己的伦理选择。

仔细审视凯伦这一角色时，我们会发现她和海尔曼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她们身上复杂的矛盾特质。事实上，凭借《儿》一炮而红后，关于海尔曼的非议源源不断。尽管海尔曼在创作《儿》之前就有过一段异性婚姻，并在成名之后与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建立了一段长达30多年的伴侣关系，海尔曼的性取向仍不断受到质疑。报纸栏目时而影射海尔曼对年轻男子有特殊癖好，时而暗示海尔曼有同性恋倾向。正如威廉·萨尔门托（William E. Sarmento）所说：“在众多诋毁者中，总有一群人执着于影射海尔曼的同性恋倾向，并时常以她的剧作《儿》和以她的自传改编成的电影《茱莉亚》（Julia）为例证，以证实她对非同寻常的女性亲密关系的热衷”（Sarmento, 1986: 4）。有的诽谤者则称“海尔曼天生与其他女性水火不容”“海尔曼有厌女倾向”……类似的众多互相矛盾的标签直到今天还与“丽莲·海尔曼”这一名字密不可分。她的友人也纷纷证实她确是个难以相处的女人，充满激情、脾性急躁，在性别角色扮演中具有攻击性，有着不明朗的性取向，正如玛丽·提图斯（Mary Titus）指出，海尔曼“作为一位进入由男性主宰的戏剧界的独立女性剧作家，其性别身份无疑挑战了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界定。特立独行而雄心勃勃常被视为有悖于女性气质的特征，从而势必与同样有悖常理的女同性恋联系在一起”（Titus, 1991: 20）。关于海尔曼的性别角色扮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与提图斯有着相似的看法，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海尔曼：“她和男人一样，会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Kazan, 1997: 382）。

海尔曼笔下的凯伦“初次登场”时，同样颠覆了德·波伏娃（1998: 11）口中对女性的定义：“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性，而定义和区分男性的参照物却不是女性。她是同主体（the subject）相对立的他者（the other）”。在女子寄宿学校，干练又端庄的凯伦处于主动、控制的地位，是学校的“女主人”，哪怕身边并无任何男性作为参照，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的独立、精明与沉稳。30年代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中挣扎，同时也经历了性别角色的巨变。社会要求女性回归家庭等私人领域，从而为急需工作的男人们在公共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在这种保守的社会氛围的笼罩下，任何不正的性取向必然会被惩罚。因此，凯伦与女性密友自主创业这一行为，“不仅是在经济上僭越了性别角色，更是挑战了传统的家庭文化；不仅挑战了男性的经济地位，更是窃取了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特权”（陈向普，2020: 40）。如果说凯伦的出场让我们认定她必然是一个敢于挑战正统父权制度的“女勇士”，那么当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同性恋”的指控所

打破时，凯伦所表现出来的恐慌和焦虑又在我们心中激起一股逆行的潮水，拍打、冲刷着我们对她的判断。

在《儿》中，海尔曼没有任何关于同性恋行为的细节描写，就连玛丽对女教师们“有伤风化行为”的控诉也只是靠耳语的形式来传达的。然而，当涉及对约瑟夫和凯伦这对异性恋人例如拥抱、爱抚和亲吻等甜蜜举动的描写时，海尔曼却显得毫不吝啬。迫于审查制度，海尔曼甚至在1936年直接将该剧改成了一则异性三角恋的故事，直到1952年审查制度逐渐衰弱才重新拾回涉及女同性恋的感情线，透露出海尔曼向正统异性恋社会制度的妥协。在其1973年的自传《旧画新貌》（*Pentimento*）的《茱莉亚》这一章节中，海尔曼露骨地描绘了对童年玩伴“茱莉亚”的同性依恋与性幻想，再次引发热议。尽管海尔曼一再强调茱莉亚故事的真实性，“茱莉亚”这一角色是否为虚构或挪用仍是疑点。有学者认为，和《儿》讲述的故事一样，茱莉亚的故事也是海尔曼“有一点点真实成分的谎言”，因为纵使“茱莉亚”这一角色是虚构或挪用来的，它仍揭示了海尔曼本人的双性恋倾向（Anderlini-D’Onofrio, 2003）。然而，在海尔曼生前的采访中，正如凯伦用冷漠和疏离回应了玛莎的告白与自杀，实现了与异性恋社会的共谋一样，海尔曼用讽刺和幽默回击了有关自己性取向的质疑：“我认为男人在大多数时候比女人要有趣得多，所以比起女人来，我更爱男人”（1977），重申了自己的异性恋取向。因此，凯伦只不过是海尔曼笔下的代言人，她与海尔曼一样，“在历经了同性爱恋的洗礼后强化了自身异性恋的社会身份”（张欣，2016: 21）。

3. 结语

海尔曼一生精力旺盛、勇敢果断，被看作是一个“女战士”，但她众多的矛盾立场和前后不一的言论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也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剧作家。《儿》作为海尔曼的成名之作，在给她带来名誉和褒奖的同时，也招致了她一生都未能摆脱的非议。凯伦作为剧中“理性”的化身，因其冷静理性的角色特质一直被视作“扁平”人物，导致其复杂的人物性格和精神特质一直被忽视。通过将学校模拟成《威》中的法庭场景，海尔曼巧妙地再现了凯伦与鲍西亚的镜像关系，从而揭示了两人的“仁慈”与“正义”面具下的复杂面孔。通过对凯伦这一角色的细致剖析，笔者证实了凯伦所具有的多重特性实则是对海尔曼自身复杂矛盾个性的映射。由此可见，《儿》远非一部靠戏剧性情节和同性恋噱头哗众取宠的“佳构剧”，而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复杂深刻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 [1] Anderlini-D’Onofrio, Serena. The Lie with the Ounce of Truth: Lillian Hellman’s Bisexual Fantasies [J]. *Journal of Bisexuality*, 2003: 87-114.
- [2] Armato, Philip. “Good and Evil” in Lillian Hellman’s “The Children’s Hour” [J]. *Educational*

- Theatre Journal*, 1973: 35-58.
- [3] Doudna, Christine. A Conversation With Lillian Hellman: A still unfinished woman [J/OL].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features/a-conversation-with-lillian-hellman-50202/1977>.
- [4] Faderman, Lillian. *Scotch Verdict: Miss Pirie and Miss Woods V. Dame Cumming Gord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Hellman, Lillian. *Six Play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 [6] Kazan, Elia. *A Life* [M]. Boston: Da Capo Press, 1997.
- [7] Rollyson, Carl. *Lillian Hellman: Her Legend and Her Legacy* [M]. New York: St. Martin's, 1988.
- [8] Sarmiento, William E. "Lillian" Is a Tour de force [J]. *Lowell Sun*, 1986: 4.
- [9] Titus, Mary. Murdering the Lesbian: Lillian Hellman's *The Children's Hour* [J].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991: 77-101.
- [10] 陈向普. 社会与时代的产物——从玛丽的视角审视莉莲·海尔曼的《儿童时光》[J]. 当代戏剧, 2020(03): 37-40.
- [11] 刘晓露, 熊力游. 话语权力观照下的主体身份建构 [J]. 求索, 2012(1): 130-131+112.
- [1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3]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二 [M]. 朱生豪,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 [1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15] 张欣. 《儿童时光》的历史改写与经典戏仿 [J]. 外国语文, 2016(5): 19-24.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 翻译与接受研究

刘 岩 王铈博

(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 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 其中部分作品出现了诸多外语译本, 传播海外。文章主要以在雅虎、谷歌、日本科学研究赞助事业数据库、IRDB、CINII、J-STAGE、维基百科等学术科研资料库, 以及在推特 Twitter、亚马逊等日本社交购物平台上收集的相关数据为基础,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情况进行调查与研究。一方面考察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概况与接受现状, 另一方面对作品的翻译策略及方法进行研究, 梳理译者相关信息, 以更全面的角度来解读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情况。

关键词: 西南地区; 少数民族作家; 日本译者; 翻译; 接受

A Study on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Works of Southwest Minority Writers of China in Japan

LIU Yan WANG Shibo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many excellent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and works have thus emerged. Some of the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and gone overseas. The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works of those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in Japan. The author collects relevant data on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bases including Yahoo, Google, Japa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Sponsorship Database, IRDB, CINII, J-STAGE, Wikipedia, as well as Japanese social media and shopping platforms like twitter, and Amaz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data, it investigates the

基金项目: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贵州省优化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0GZZD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 岩, 男,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及海外中国学研究。

王铈博, 男,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笔译研究生,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writers' works in Japan. What's more, it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he works, sorting out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in order to elaborate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ose works in Japan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Southwest China;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Japanese translator; translation; acceptance

0.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唐珊, 2020)。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之一, 有着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生于此地的少数民族作家们挥洒笔墨, 将少数民族文化写进其作品之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这些富含少数民族文化的作品传播至美国、日本与欧洲多国。为扩大作品外译规模, 促进海外传播, 需要对少数民族作品的外译情况进行梳理与总结, 把握翻译与传播现状, 为我国优秀作品的海外传播提供基础信息。国内针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研究较多, 但主要集中在典籍传播与民俗方面, 赵蕤(2020)、刘岩(2021)等对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西南地区 and 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述评, 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学者针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所进行的研究。文章旨在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并以此为基点, 考察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

本文主要从翻译和接受两个方面考察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翻译方面主要考察标题的翻译, 采用何种翻译方法与策略, 是否客观、准确地翻译了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特定含义的词汇; 接受方面主要考察每个作品在日本的图书馆馆藏量和社会评价, 以及所有相关的书评信息, 通过综合分析以上信息可以管窥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接受情况。

1.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翻译

1.1 作品译本统计

笔者整理了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本情况, 如表1所示。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出版的作品共有23部, 共25个日译本, 作品被收录的少数民族作家有6人, 其中藏族作家人数最多, 有阿来、扎西达娃和色波3人, 彝族有吉狄马加1人, 白族有张长1人, 佤族有董秀英1人。从地理位置分布上来看, 云南有张长和董秀英2人, 其余4人均是四川籍作家。

在日译的作品中, 藏族的作家及作品最多, 共20部作品, 具体有阿来的两篇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以及3篇短篇小说——《蘑菇》《鱼》《阿克顿巴》, 扎西达娃的11篇短篇小说——《江那边》《沉寂的正午》《去拉萨的路上》《没有星光的夜》《古宅》《世纪之邀》《夏天酸溜溜的日子》《冥》《风

马之耀》《朝佛》《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色波的4篇短篇小说——《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幻鸣》《竹笛·啜泣和梦》。此外，还有董秀英的《佤山风雨夜》，张长的《最后一棵菩提》及吉狄马加的诗集《身份》被翻译成日语并出版。在23部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其余的全部为中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或刊物中，这说明被日译的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文本量不多。可以看到西南少数民族的6名作家中有3名是藏族，他们的作品及其日译本同样也占了大多数。这说明日本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很高的关注度，大多集中在藏族作家身上，对于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仍然缺乏关注。

1.2 出版机构及时间

从作品的出版时间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均为短篇小说，在21世纪出版的有阿来的两部长篇小说，吉狄马加的1部诗集和3篇短篇小说。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收录刊物主要是苍苍社出版的《季刊中国现代小说》，未来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选》与JICC出版局出版的《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3本杂志与书籍。另有一部刊载于青土社杂志《ユリイカ》的作品《去拉萨的路上》，这部作品也同时被收录在《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选》和《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当中。阿来的长篇小说刊载于近代文艺社出版的《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和勉诚出版社出版的《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吉狄马加的诗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则是由思潮社所出版。

近代文艺社成立于1982年，主要的出版物为文艺类书籍、写真集、词典、随笔等；思潮社主要出版诗歌作品、现代诗及诗歌评论；未来社是学术系出版社，主要出版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书籍，主要领域为思想、民俗、宗教、教育等；JICC出版局是宝岛社的前身，作为一个综合出版社，出版范围广泛，主要包含时尚类、娱乐类、漫画类、文学类等书籍与杂志。

表1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一览表

序号	作品中文名	作品日文名	作者	译者	出版时间
1	最后一棵菩提	最後の菩提樹	张长	川口孝夫	1989
2	佤山风雨夜	アワ山の嵐の夜	董秀英	川口孝夫	1989
3	江那边	江の向こう岸	扎西达娃	川口孝夫	1989
4	沉寂的正午	酒売りの少女ナゼン	扎西达娃	川口孝夫	1989
5	去拉萨的路上	ラサへの路で	扎西达娃	川口孝夫	1989
		ラサへの道にて	扎西达娃	池上貞子	1989
		ラサへの道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6	没有星光的夜	星のない夜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7	古宅	古い館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8	世纪之邀	世紀の招き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9	风马之耀	風馬の耀き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10	朝佛	巡礼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12	西藏，系在皮绳结 上的魂	チベット、皮紐の結び目に つながれた魂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1
13	夏天酸溜溜的日子	夏の酸っぱい日々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1990
14	冥	冥	扎西达娃	牧田英二	2003
15	圆形日子	円形の日	色波	牧田英二	1991
16	在这里上船	ここから船に乗る	色波	牧田英二	1991
17	幻鸣	幻鳴	色波	牧田英二	1991
18	竹笛・啜泣和梦	竹笛、啜り泣き、そして夢	色波	牧田英二	1991
19	蘑菇	松茸	阿来	牧田英二	1992
20	鱼	魚	阿来	牧田英二	2001
21	阿克顿巴	アクトンバ	阿来	牧田英二	2002
22	空山	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	阿来	山口守	2012
23	尘埃落定	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	阿来	西海枝裕美 西海枝美和	2004

2.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标题翻译与命名策略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翻译，日本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加译和音译等方式，对于部分作品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于自行收录作品并编纂的小说集等须自主命名的情况，译者们也基于文化传播、概括全文等方面的考量进行了命名。笔者将每个作品根据翻译与命名方式进行分类，从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和命名策略的角度逐一进行分析。

2.1 作品标题翻译策略

从收录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书籍来看，采用直译方式的作品有：《去拉萨的路上》《古宅》《世纪之邀》《夏天酸溜溜的日子》《冥》《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鱼》《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幻鸣》《风马之耀》《没有星光的夜》。除《去拉萨的路上》和《没有星光的夜》以外，日语内容和原文都可以一一对应，没有增减。以上作品采取直译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文信息，例如“风马”是藏族的传统挂饰，有布印风马旗、纸印风马片及各类经幡，对于这类文化负载词，相较于煞费苦心地在标题中阐释，不如直接采取异化策略译为“風馬”，既精简又忠实于原文；第二，便于读者理解，因为上述作品的标题中除少数词汇外，在日语中均能找到相对应的词汇，采取直译既便于译

者翻译，也方便读者理解。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作品《去拉萨的路上》有3个版本的翻译，分别是牧田英二所译的《ラサへの道》、池上贞子的《ラサへの道にて》和川口孝夫《ラサへの路で》。从语法角度上说，表达“路上”这一含义所需要的日语助词可以是“にて”也可以是“で”。“にて”是“で”的古语形式，两者在此语境下的含义没有差别，可根据适用场合与个人语言习惯而选用不同的助词。但牧田英二所译的《ラサへの道》省略了助词，因此后续既可以是表达动作发生场所的“で”，又可以是表达方向提及的“へ”，亦可以为表示空间移动场所的格助词“を”给人留下了想象空间。

同为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所著的《没有星光的夜》被译为《星のない夜》，译者牧田英二将“星光”直接译为了“星”，在《スーパー大辞林3.0》中对于单独的一个“星”字的解释是“恒星・惑星・彗星・衛星などすべての天体の称。一般には、太陽や地球・月以外の天体をいうことが多い。”这说明在日文中单独的一个“星”字没有“星光”的意思。虽然“星のない夜”直译为中文是“没有星星的夜”，与原文标题十分接近，但在词汇上不完全对等。在《没有星光的夜》中两次提到星星的句子分别是“一轮明月悠然升起，悬在黑魑魑的树梢上；静静的高原之夜，极深的苍穹中没有半点云彩与星光；”“天上没有一颗星辰，只有一轮圆月孤寂地高悬着。”两句中分别使用了“星光”与“星辰”，这说明文章标题的“星光”只是“星光”或“星辰”的意思，没有特殊指代。之所以不将“星光”一词直接译为“星の光”，是因为“星の光”只是单纯地指星星的光芒，意义不免有些狭窄，译为单纯的一个“星”则会使意义更加丰富，减少因为过于强调星光而产生误读标题的现象。

此外，《朝佛》《蘑菇》采用的是意译，《朝佛》被译为《巡礼》，《蘑菇》被译为《松茸》。“巡礼”的日文解释是“その宗教に固有の聖地・霊場を巡拝すること”（スーパー大辞林3.0），意为参拜某个宗教的圣地或灵地，对于不了解日本的读者来说，倘若直接异化使用“朝佛”一词可能会让其不知所云，而将标题归化使用“巡礼”则既可以让读者知晓其含义，又能以“朝拜圣地”的意义来介绍作品。而另一部作品《蘑菇》被译为《松茸》则是将标题意译得更精准化。在生物学分类上，蘑菇与松茸是一类特指的真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使用“蘑菇”一词来泛指大部分的真菌，而在《蘑菇》一书中所提到的“蘑菇”正是松茸。此外，“蘑菇”表示泛指含义时在日语中的对应词汇是“キノコ”，所以，译者将《蘑菇》译为《松茸》是一种将标题精准化的行为。

采取音译方式的作品仅有《阿克顿巴》这一部作品。《阿克顿巴》被直接音译为《アクトンパ》，采用了翻译上的异化策略。

采取加译方式的作品有《空山》《尘埃落定》和《竹笛·啜泣和梦》3部作品。

《空山》和《尘埃落定》是阿来的作品，长篇小说《空山》被译为《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是一种明显的加译。小说内容分为“随风飘散”和“天火”两部分，“随风飘散”写了私生子格拉与有些痴呆的母亲相依为命，受尽屈辱，最后含冤而死。“天火”写了一场森林大火中，巫师多吉看到“文革”中周围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中的“風と火”这一翻译是在原题目的基础上，加上了对小说的内容概括，而“チベット”则是阐明小说故事发生的场所。如此一来，就可以让日本读者在没有简介的作品宣传时就能对该作品有一个简单的认识，给完全不清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本读者提供了遐想的空间，能起到一定的意料之外的传播和宣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不是单独出版的，而是由日本勉誠出版社出版的“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同時代小説”系列中的第一本，该系列所有作品的标题翻译同《空山》一样，均由“原标题+故事概括”构成。这种翻译方法既保有原标题，又加入一点预告性质的内容，很能吸引读者。

阿来的另一篇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讲述了一个权势很大的康巴藏族土司，酒后乱性与一位汉族女子生下了一个白痴儿子，而这个白痴儿子见证了藏族土司制度的衰落。对该书的翻译也同样以“原标题+故事概括”的方法译作《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在标题的基础上加入了小说的主线内容，即“土司制度の終焉”。

《竹笛・啜泣和梦》被译为《竹笛、啜り泣き、そして夢》，将原标题中的“和”译为“そして”，“そして”是“そうして”的口语简略形式，其释义为“前に述べた事柄を受けて、それに引き続いて起こる事柄を述べる。それから”（スーパー大辞林 3.0），也就是说“そして”包含“然后”“还有”等递进意义。在原文中，先后提及了竹笛、啜泣和梦，从提及顺序上看是递进关系，但原文提到“于是，他把竹笛、啜泣和梦一起扔给了他的后人”，这说明文章并没有明确指出竹笛、啜泣和梦是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在原标题中没有包含递进意义，而“そして”的使用为日译版标题赋予了此层意义。

除了上述翻译方式，笔者还对选择的翻译策略做了归纳，《风马之耀》《阿克顿巴》《尘埃落定》和《空山》的日译版标题中，都直接以音译的形式使用了“风马”“阿克顿巴”“落定”“空山”这些非日语词汇，所以这在翻译策略上属于异化。而《朝佛》的日译版标题是《巡礼》，在日语中并无“朝佛”一词，将其译为“巡礼”是一种明显的归化策略。其他作品并无明显的归化或异化痕迹。总体来说，除了难以区分的作品以外，采用异化策略的作品占大多数。

2.2 作品标题命名策略

译者没有采用作品原标题，或者译者对自己的译文进行编纂，编成一部新的文集时，有必要对作品标题进行命名，如《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是由吉狄马加的

诗组成的诗集,《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是由牧田英二翻译的色波和扎西达娃的小说编纂而成的中短篇小说集。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是吉狄马加的诗,由渡边新一翻译并编纂成诗集。吉狄马加的诗集也在国内出版,名为《吉狄马加诗选》。笔者对比发现两部诗集的目录并不完全相符,这说明《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这一作品存在译者自行收录编纂的部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是日语中的外来语,来自英语中的“identity”一词,意为“身份”“同一性”等,该词汇来自诗集中的一部名为《身份》的作品。

《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是色波和扎西达娃共著的小说集。虽然国内的百度百科词条显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过《风马之耀》小说集,但是笔者在各大数据库均未能找到譬如封面、目录等相关的书籍信息,且该日译本标题在原标题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信息,因此,笔者将其列入自主命名的类别。该日译本标题的命名策略为“代表性作品+收录作品共同属性”。“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是收录的短篇小说《风马之耀》的日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風馬”一词使用了异化策略,而且后面加上了其发音“ルンタ”。在藏语中“风马”的发音为“隆达”,所以这里“风马”一词的翻译同时使用了直译与音译的方法,直接采用汉语的文字与藏语的发音。牧田英二(1991)在《〈风马之耀〉译后记》中对西藏文学有过定义,指出“真正的西藏文学”至少符合3个条件:第一,作者是藏族;第二,用藏语写作;第三,题材具有反映藏族生活内容的民族特征。显然,本书收录的作品虽然是藏族作家描写藏族生活的作品,但由于是用汉语写作,不符合“真正的西藏文学”的标准。牧田英二在同一文章中还提到“新西藏文学”,他虽没有对“新西藏文学”作具体定义,不过文章中如是说道:到底怎样写西藏,藏族和汉族的青年作家们苦恼了若干年,摸索了若干年,终于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中找到了什么。其文章中列举的作品正是本书收录的作品,所以“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是本书收录作品的共同属性,至于“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则意在表达这些藏族作家正大胆积极地探索新的写作方法。

2.3 日本译者概况

翻译过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本译者有西海枝裕美、西海枝美和、山口守、渡边新一、川口孝夫、池上贞子以及牧田英二。上述译者中,牧田英二和川口孝夫翻译的作品最多,山口守、西海枝裕美、西海枝美和翻译了阿来的两部长篇小说,渡边新一翻译了吉狄马加的诗集,池上贞子翻译了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去拉萨的路上》。

牧田英二是著名的中国学学者,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日本广播协会(NHK)广播中文讲座讲师,在该节目上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专栏，专门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日本拥有很多读者与听众，影响力十分巨大（范露、王晓梅，2019）。她著有《中国边境文学 少数民族的作家及作品》，与杨立明共同编著了《新选中国现代文》《例文中心初级中文》《留学生的心声》，3次与杉本达夫、古屋昭弘共同编著《便携日常汉日日汉词典》，与杉本达夫共同编著了《王冠日汉词典》。牧田英二的研究成果及论文主要集中在汉语教育上，也有部分论文涉及中国文学。牧田英二翻译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最多，且均为藏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渡边新一是日本中央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诗歌文学，主持了《进入中国的日本文学的翻译方式——从夏目漱石到村上春树》的研究课题，参与研究《中国同时代文学潮流概况的基础研究》，发表了《关于唯美派诗人邵洵美的诗》《彝族的诗人——吉狄马加》《某位诗人的上海生活——山本初枝与鲁迅》《度过不遇晚年的诗人》等文章，曾翻译出版过方方的《落日》和刘庆邦的《神木》等作品。

山口守是日本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关注巴金和台湾文学，编著有《讲座台湾文学》一书，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以女性作家张辛欣为中心》和《巴金书简研究》。除翻译过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以外，还翻译过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和《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白先勇的《台北人》、张系国的《星云组曲》等作品。山口守除了对中国文学有所研究以外，还部分涉及社会运动的研究，如曾参与了田中光主持的“关于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全球化扩散组织的思想史研究”的研究课题。

池上贞子是迹见学院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对张爱玲有颇多研究，发表了《从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开始》《张爱玲文学中“绢”的形象和“恋衣”》等相关论文，著有《张爱玲：爱·人生·文学》，著有诗集《黄的搅乱》《同班同学》；与张国（口述）合著《中国人的生活 生涯好日》《中国是这样的国家！素颜的“汉流”生活》；与余振领、三宅登之合著《华丽初级中文》，翻译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作品。

川口孝夫的相关资料较少，仅查找到本文中涉及的译著《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选》。西海枝裕美毕业于京都外国语大学，曾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文学，在中国发表了《浅谈鲁迅小说中的紫色形象——围绕着〈过客〉中的女孩的形象问题》《在异国中学课堂里的〈故乡〉——以新加坡与日本为例（修改稿）》两篇论文。此外，西海枝美和曾就读于帝塚山大学，在学期间多次前往中国留学。

3. 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接受情况

本节主要聚焦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接受情况，收集整理图书馆馆

藏信息，分析日本社会对于作品的宣传及社评情况。通过以上步骤分析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接受程度。

3.1 馆藏情况一览

笔者收集整理了所有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版的馆藏数据。结果显示，除了2019年出版的吉狄马加的诗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以外，其余所有作品、书籍和杂志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均有馆藏记录。具体数据分别为：《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73处馆藏，《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115处馆藏，《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150处馆藏，《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15处馆藏，《ユリイカ》489处馆藏，《季刊中国現代小説》5处馆藏。除日本的本土杂志——《ユリイカ》的馆藏量高达489本以外，其余书籍中以《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的馆藏量最为丰富，而阿来所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的馆藏量仅为15处。《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早在2004年就在日本翻译出版，其中文原版小说《尘埃落定》虽获得了中国小说界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但其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却不容乐观。

3.2 社评概况

3.2.1 社交媒体数据

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留言数量不多，全部作品的相关留言仅有70余条。其中，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与扎西达娃、色波合著的小说集《风马之耀》各占20余条，其余作品或书籍的推特留言数量都未超过10条。此外，这些留言大多是出版社或读者对于书籍的推销和宣传，内容同质化严重，很多都是同一条留言的多次转发。例如，在关于《空山》的20余条推特留言中，有三分之一附有亚马逊商城的购物链接，一半以上附有各平台的链接。

另一方面，推特留言展示出日本读者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接受度很高。在所有推特留言中不乏赞美之辞，没有发现负面评价，例如“昨日から「風馬の耀き」を読み始めました。半分も読んでいませんが、ザンダワの『星のない夜』や『ラサへの道』等の復讐譚は傑作ですね。良い本を進めて頂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v〃）”之类的赞赏性留言有数条。对所有留言进行词频分析后发现，表示“好”的词汇“いい”共出现5次，表示“钦佩”的词汇“すごい”也出现5次，表示正面评价的“好き”出现3次，“面白い”出现2次。除了推特平台以外，日本的读书网站“読書メーター”上还有3条对《空山》以及5条对小说集《风马之耀》的读者评价，无一例外均为好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虽然大部分日本读者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关注与了解程度低，但是阅读过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本读者均十分接受与认可这些作品。

3.2.2 购物平台数据（以“亚马逊”为例）

上文中提及的所有作品（连载在杂志上的作品除外）均在日本最大的网络销售平台“亚马逊”上销售。笔者无法直接查询这些商品在“亚马逊”平台的销量，但收集了这些作品的排名情况。这些数据能反映日本读者对于这些书籍的购买热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日本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接受程度。

从表2可以看到，在总体榜单上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书籍排名普遍偏后，且多数书籍的排名会随着出版时间变化而变化。出版时间越早，其排名就会越高，仅《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两本例外。《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出版于2012年，在所有书籍中出版较晚，仅早于2019年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但是它的总榜排名却在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书籍中位列第二，此外它还在“外国文学”榜单中排名第447位，而其他书籍都没有入选该榜单。究其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因为《空山》这部作品推出的日译版不是单独出版，而是与其余9本一起推出，这在宣传与筹备上占据很大优势；其次是因为其译者是十分有名的中国学学者山口守，一方面翻译的质量有很高的保障，另一方面作为著名学者的译著，他自然能够带动一部分人去购买和关注这部作品；最后，宣传力度大，上文提及关于《空山》的推特留言数量最多印证了这一点。与之相对，《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排名靠后，令人意外。上文中提到其中文原版小说《尘埃落定》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日译版本也早在2004年就翻译出版，但仅有15处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馆藏量仅高于《季刊中国現代小説》的5处，其在亚马逊畅销书籍的总榜排名也仅略高于2019年出版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除总榜以外，以上信息在中国文学榜和中国文学研究榜的数据里也有所展现。在这两个榜单中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版书籍排名均不拔尖，这说明，抛开其他书籍不谈，日本读者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关注程度也不高。

表2 亚马逊畅销书籍排行榜数据

书籍	总榜	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現代少数民族文学選	582117	295	1217
風馬（ルンタ）の耀き—新しいチベット文学（発見と冒険の中国文学）	1228735	685	2675
空山：風と火のチベット	1153751	639	2504
塵埃落定：土司制度の終焉	2062529	1075	4230
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2585543	无	4750

3.2.3 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

经过笔者的筛选与整理，在上述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中，日本学者仅对阿来、

吉狄马加与扎西达娃有所关注。山口守发表过《汉语文学的可能性：以阿来为例》《作为离散的母语——阿来的汉语文学》与《华语语系 Sinophone 到母语之外 Exophone: 以黄锦树、利格拉乐阿乌和阿来为例》3 篇文章；甲斐胜二发表了《读阿来的〈鱼〉》一文；渡边新一发表了《彝族的诗人——吉狄马加》；饭冢容的《中国近现代小说的二十年》中列举了阿来与扎西达娃两名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此外，牧田英二的《〈风马之耀〉译后记》虽然没有对具体作家进行分析，但对藏族文学做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研究的关注仍旧不足。

4. 结语

综合上文可以看出，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被译为日文并出版的作品有 23 部，共有 25 个出版译本。在作品标题的翻译上，日本译者大多采用了直译法，同时也有部分作品使用了音译和加译的方法。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由于中日文字同源，许多词汇直接相通，大多数作品的翻译策略并不能简单区分为异化或归化，因此仅有少数几部作品的翻译明确使用了异化和归化策略。

此外，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不容乐观。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次作品翻译高潮，但仅仅持续了两年，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地有新的日译作品出现。在所有的日译版作品中，当数阿来的《空山》最为成功，作为一本较晚才被翻译的作品，它在所有西南少数民族作家日译作品中取得了最好的传播效果，不仅拥有最高的馆藏数据，还有最高的社评总量。不过即便如此，整体来看，《空山》的数据依旧比较惨淡，这与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不被关注是分不开的。除了阿来的《空山》之外，其余作品的日译版在日本的传播更是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学者（作者和译者）都没有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仅有的 25 部日译本全是日本译者所译。

少数民族典籍日益备受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关注情况与传播情况却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因此，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关注，加大对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对外传播力度，补齐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短板，对整个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十分重要且实际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饭冢容. 中国現代小説の二十年 [J]. 中国, 2005(20): 501-519.
- [2] 甲斐胜二. 阿来「魚」を読む [J]. 福岡大學人文論叢, 2017(49): 377-412.
- [3] 山口守. 漢語文学の可能性：阿来を例として [J].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紀要, 2014(87): 124-126.
- [4] 孙若圣.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新時期小説の翻訳とその展開 — 形づくられた中国の文化的イメージ [D]. 兵庫県：神戸大学, 2021.
- [5] 小川利康. 日韓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文学受容の比較研究 [R]. 東京：早稻田大学, 2015.
- [6] 范露, 王晓梅. 阿来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 [J]. 智富时代, 2019(01): 148.

- [7] 范露, 王晓梅. 关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日译介与传播的几点思考 [J]. 现代语言学, 2019, 7(2): 100-110.
- [8] 黄立.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 [J]. 中国出版, 2016(21): 64-67.
- [9] 李伟荣. 安乐哲中国典籍英译的价值: 一个翻译史的视角 [J]. 翻译史论丛, 2020(01): 48-61+144.
- [10] 李莹, 孙会军. 《长恨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2): 66-73.
- [11] 刘岩, 韩婉茵. 以云贵川为研究区域的日本博士论文统计分析与内容研究 [J]. 地域文化研究, 2021(02): 86-94+155.
- [12] 刘岩, 王晓梅, 李哲. 《阿诗玛》在日本传播的历时性思考 [J]. 国际传播, 2019(03): 90-96.
- [13] 刘毅. 《射雕英雄传》在西方的译介传播: 行动者网络、译者惯习与翻译策略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02): 58-65+159-160.
- [14] 牧田英二, 汤晓青. 《风马之耀》译后记 [J]. 民族文学研究, 1991(4): 90-93.
- [15] 秦雪, 张顺生. 《三国演义》泰勒英译本词汇误译研究 [J]. 翻译论坛, 2019(1): 74-77.
- [16] 唐珊. 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 [J]. 人民论坛, 2020(05): 136-137.
- [17] 汪荣.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J]. 民族文学研究, 2019, 37(4): 67-76.
- [18] 许明武, 赵春龙.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研究热点述评——兼论其民译、汉译与外译研究融合路径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8(06): 58-64.
- [19] 赵蕤, 沙马拉毅. 民间文学视阈下的日本彝学研究历史、现状与思考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 41(09): 170-177.

概念整合理论下《废都》中本源概念英译的认知过程研究

周慧敏 刘 彬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 概念整合理论主要强调心理认知过程在阐释文本结构中的重要性。《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 葛浩文的英文版翻译使其广泛走向大众视野, 其中大量的本源概念是该文本的一大特色。从概念整合理论出发, 选取《废都》中有代表性的本源概念的翻译, 运用概念整合网络的构建, 重点分析在对小说中本源概念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如何进行心理空间网络的匹配与构建, 试图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图直观地传达出译者的心理认知过程。

关键词: 《废都》; 概念整合; 本源概念英译; 认知过程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Indigenous Concepts in *Ruined Cit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ZHOU Huimin LIU Bin

Abstract: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main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process in interpreting the text structure. *Ruined City* is a novel written by Jia Pingwa, in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the Indigenous Concepts are a major feature of the text. Starting fro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selects some representative Indigenous Concepts of the novel. Appl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how the translator matches and constructs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network in the process of Indigenous Concepts translation, trying to convey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or intuitively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1 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概念隐喻英译研究”(编号: CX20210929)、湖南省教改项目“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校外语课程教学模式研究(编号: HNJG-2020-0477)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湖南省形象外宣翻译研究(17YBA3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周慧敏, 女,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刘 彬, 男,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

through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diagram.

Key words: *Ruined City*;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digenous concepts translation; cognitive process

0. 引言

《废都》是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创作的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于1997年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继翻译了贾平凹的《浮躁》，葛浩文多年后又翻译了《废都》，并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废都》是贾平凹读者众多的作品之一，但也颇具争议，其中融合了大量陕西方言和特色文化等地域元素，生动展现了地方文化，突出作品的地方生活性（黎璐，2019）。但是如何翻译这些极具地方文化的本源概念成为挑战。近年来随着葛浩文《废都》英译本的出版，对于该小说的英译研究才逐渐出现，但多数集中在研究文本中特色方言的英译。赵红（2019）对《废都》中陕西方言词汇的英译方法做了研究，在文学翻译原则的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一些专门对方言翻译的原则；李贺园（2018）以提莫志克的换喻理论为基础，对《废都》中陕西方言词汇的英译进行了研究；黎璐（2019）建立了方言词汇语料库并运用场景——框架理论分析了《废都》方言词汇的翻译。

笔者注意到这些对于小说中方言翻译的研究，多数是分析总结已经完成的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或是研究一些影响翻译的因素，然而在对特色本源概念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整合过程以及文本产出的语义认知过程却很少得到关注。因此本文从概念整合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在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对于小说中特色的本源概念整合网络的构建，以及译者如何通过构建的心理认知网络，更好地对于本源概念英译进行语义以及相关文化的传达。

1. 本源概念和概念整合理论

本源概念由研究者何元建（2010）首次提出，他认为本源概念（*indigeneous information*）指某一语言使用者的团体，在本身的建设进程以及思维方式等的发展过程中酝酿出的特色概念，对于另外一个语言社团来说是外来陌生的。也就是说这一特有概念不仅仅包含一些方言的表达，也包括一些含有当地特色的特殊语言表达，总的来说它的范围相较于方言来说更广。对于其翻译，也就是对于英语使用者的语言团体而言，它是外来的，所以对于小说中本源概念的翻译，译者一方面要正确传达出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又要不失这些本源概念的文化内涵，将其深层文化内蕴传递到目的语言社会中，所以在对本源概念的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心理整合变化过程的研究很有必要。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其翻译的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其小说中本源概念翻译的处理，其动态思维过程的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揭示译者在汉英翻译

过程中的心理认知提供一定借鉴。

概念整合理论受到莱考夫 (Lakoff) 和约翰逊 (Johnson) 在 1980 年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的启发, 当时他们认为隐喻是一个中心问题, 可以完全解释人类如何理解世界, 隐喻曾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 但在莱考夫看来, 隐喻是一种从源域到目的域的概念整合与投射 (Lakoff & Johnson, 1980)。文旭、肖开容 (2019) 认为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概念整合理论, 福柯尼耶 (1997) 把心理空间定义为一种“部分结构, 随着人们的思考、分析、概括等思维活动而扩展, 使得话语和思维结构可以进行精细划分”。福柯尼耶 (2003) 认为概念整合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能力, 它能产生新的意义、全局识别力和概念压缩, 有助于记忆和操纵其他意义的分散范围, 操作的本质是在输入心理空间之间进行信息构建匹配, 并有选择地从这些框架中选择信息投射到一个新的“合成”心理空间, 然后动态地发展出整合结构。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包括两个输入空间: 输入空间 1 (input space 1), 输入空间 2 (input space 2); 一个合成空间 (blended space); 一个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 和层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 (文旭、肖开容, 2019)。福柯尼耶和特纳 (2002) 指出, 概念整合网络最基本的类型有简单网络 (Simple Networks)、镜像网络 (Mirror Network)、单域网络 (Single-scope network) 和双域网络 (Double-scope network)。

通过上述介绍可知, 概念整合这一过程存在于人们内在的心理空间中, 人们有能力在心理空间之间对相关信息进行构建, 对部分信息进行匹配, 再有选择地投入到合成空间中, 因此这一过程也适用于翻译这一双语转换的过程中, 尤其是对于隐喻含义丰富的本源概念语料。本文将重点讨论译者如何通过概念整合网络的构建实现翻译过程的转变。通过概念整合理论来分析小说中对于本源概念的翻译, 译者的心理整合过程能够直观动态地呈现翻译的认知过程。本文将对相关本源概念的英译和译者的心理整合过程进行剖析, 确定这些本源概念特色表达是属于哪一类概念整合网络类型, 揭示译者如何通过概念整合网络构建出认知意义, 并翻译成对应的译文。

2.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对《废都》中本源概念翻译的认知阐释

2.1 简单网络

简单网络是一种最基本的概念整合网络, 主要包含 4 个空间。输入空间 1 是实体与角色的关系框架, 而输入空间 2 包含不同元素, 两个输入空间通过框架与元素的关系连接。整合空间整合了每个空间中的框架、属性和元素, 使它们成为有意义的结构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例 1

原文: 汪希眠老婆说: “我知道, 那里有两句话: 清涧的石板, 瓦窑堡的炭,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你一定是米脂人！”（贾平凹，2012: 115）

译文：The wife of Wang Ximian said, “I’ve heard it said that Qingjian is famous for its flagstone, Wayao Fort for its coal, Mizhi for its women, and Suide for its men. You must be from Mizhi.” (Goldblatt, 2016: 148)

原文大意为汪希眠的老婆根据一句陕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谣判断柳月属于哪个地方的人。这句民谣告诉人们，陕北这4个地方以这四大宝贝闻名，即石板，煤炭，美女和美男子。汪希眠的老婆最后说柳月一定是米脂人，因为米脂盛产美女，而柳月又长得美丽动人，因此一定来自米脂。译者翻译时直接在不同的地名与其盛产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简单型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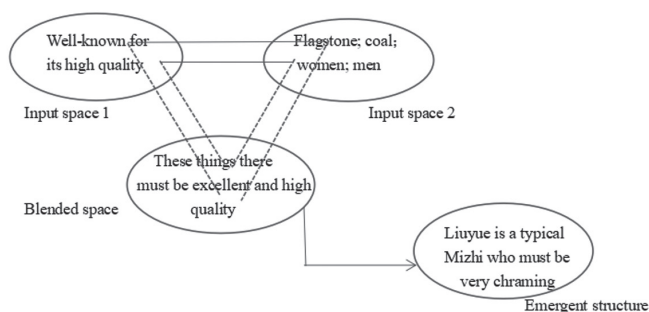


图1 例1 概念整合网络图

如图1所示，输入空间1是这些地名与其盛产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即“well-known for its fine quality”；输入空间2是盛产的这些实体，包括“石板，炭，美女和美男”；整合空间合成了输入空间中的实体与框架的关系，即这些地方的人或者物品一定都质量上乘，因此深层的层创空间即为柳月是正宗的米脂人，因为其长得非常标致。简单型网络能够直白明了地传达出原文本源概念的语义内容，对于外来的语言团体来说，能够直观地理解文本的字面含义。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图，也能够清楚看出译者在翻译整合过程中的心理认知。

例2

原文：牛月清说：“男人再能挣钱，婆娘不会过日子，也是白搭。何况他耙耙没齿，我匣匣还敢没底？”（贾平凹，2012: 80）

译文：“I have to. If not, we’d be poor no matter how much he earned,” she said. “Zhidie is like a rake with no teeth, and I can’t let the spending get out of control”. (Goldblatt, 2016: 54)

这句话是牛月清在抱怨，虽然自己的老公庄之蝶是个大作家，他们不愁没钱，但是女人也要会过日子。“耙耙没尺，匣匣没底”是一句比较古老的俗语，“耙耙”在以前的农村很常见，就是用竹子做成的用来搂树叶或草的东西，“匣匣”

也就是盒子，用来装东西。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就是说男人在外奔波，就像搂柴草的耙耙一样，挣钱，然后拿回家交给女人保管，女人就像装东西的匣匣一样，要把钱保管好、用好。不怕耙耙没齿齿，就怕匣匣没底底，意思是男人就像搂柴火的耙耙一样，本事再大，日积月累也会把齿齿磨秃了，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怕家里的女人像个没有底的匣匣一样装不住东西。就是说如果女人只会胡支乱花，不会勤俭持家过日子，再多的钱也会花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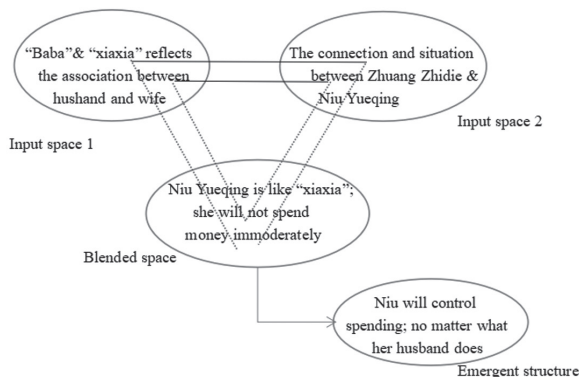


图2 例2 概念整合网络图

如图2所示，两个输入空间包含不同的组织框架，输入空间1包含“耙耙”和“匣匣”暗指的夫妻之间的联系，输入空间2包含牛月清和庄之蝶这一对夫妻之间的联系，输入空间1和2被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合成空间将输入空间1中的基本元素与输入空间2中的角色相匹配，即表明：妻子牛月清会像“匣匣”一样，不会胡乱开支，花钱没数，会勤俭持家过日子。深层的层创结构也就意味着不管丈夫庄之蝶怎样，妻子牛月清会好好控制住钱的开销。所以在翻译时，译者对此句话进行了简单网络的认知构建，译出了能表达作者本意的译文，也使读者对原文传达的意思一目了然。

简单网络不是特别适合意义以及文化内涵丰富的源语，通过以上例子对简单网络以及对应的特色表达的分析发现，简单网络只有一个输入空间具有组织框架，另一个输入空间仅仅是实体元素，所以简单网络一般只适用于实体关系与元素这一类型的关系中。本源概念往往是复杂的，不是单纯包含明确实体与其关系的语料，但是可以用简单网络来对相关的具有组织关系和实体之间的特色表达进行描述，如上文相关例子的分析，因为在小说中有相关的表达以及可以用简单网络进行描述，所以对其分析不可缺少。

2.2 镜像网络

福柯尼耶（2003）认为镜像网络共享一个组织框架，由于镜像网络的两个输

入空间不包含任何冲突的框架, 因此不仅容易提取对应对象, 而且方便重要关系的压缩。时间和空间关系通常出现在这样的网络中。

例 3

原文: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 二十七八抱养娃娃。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奔奔。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务花。七十七八振兴华夏。
(贾平凹, 2012: 276)

译文: His hair is a mess as a teen; At twenty, a babe in his arms is seen; In his thirties, a promotion gives life a sheen; In his forties, a muddled and downcast mien; In his fifties, retired and back home to stay lean; In his sixties, to raise fish and flowers he's keen; In his seventies, he helps China achieve a glorious scene. (Goldblatt, 2016: 151)

这几句类似于打油诗的本源概念表达其实从时间的跨度上概括了一个人的一生, 从十几岁到七十几岁, 每一句话都大致概括出个人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以及作为。这类打油诗讲究押韵, 读起来朗朗上口,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意识到这几句话全都押尾韵, 因此在翻译时也压了尾韵。这一本源概念主要是各个年龄段与该年龄段状态的匹配, 因此作者在自己的译文空间中, 很容易做到形式的对等, 根据原文的表达逐一进行对齐即可。关于概念对等, 译者只需要从相关的形式对等中提取相关表达的主要描述方法以及手段, 即可轻松实现概念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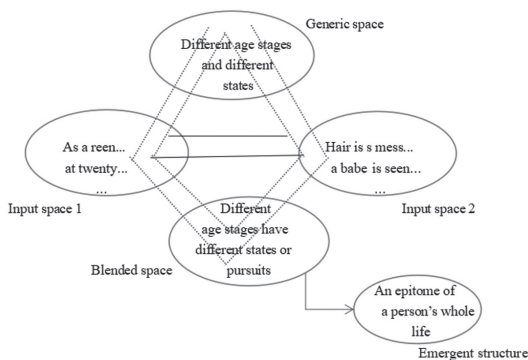


图 3 例 3 概念整合网络图

如图 3 所示, 输入空间 1 为主语不同的年龄阶段, 从十七十八到七十七八的年龄跨度, 另一个输入空间为不同阶段主语的不同状态, 在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和合成空间都有共同的结构, 即“某人多少岁时, 怎么样”, 用来描述某人的状态以及处境。这种情况下时间可以被压缩, 我们能够比较这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状态, 因此翻译时译者也将某人不同的年龄段译为了“*At twenty, In his thirties...*”等, 输入空间 2 的状况以及状态和输入空间不同的年龄阶段一一对应。同时译者也注

意到了这一本源概念的特殊性，原文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译文也实现了和原文音韵上的对等，并且也是全部押尾韵。首先实现了形式音韵上的对等，对于概念上的对等，译者只需根据原文译出该年龄段对应的状态即可，根据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译出原文内容和逻辑以及内在的压缩结构，即做到了概念对等。

例 4

原文：房子。谷子。票子。妻子。儿子。孙子。庄子。老子。孔子。活了一辈子。留下一把胡子。（贾平凹，2012: 431）

译文：Fangzi (house), guzi (grain), piaozi (money), qizi (wife), erzi (son), sunzi (grandson), Zhuangzi, Laozi, Kongzi. After a lifetime of buzz, leaving nothing but a chin with fuzz, huzi (beard). (Goldblatt, 2016: 227)

同例 3 一样，短短几个词语和一句话类似打油诗的形式，概括出人一生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任务以及不同的追求，前 3 个是人毕生的追求，其次是人生圆满，之后 3 个是脱离物质后的精神信仰，最后是真正留下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译者葛浩文对原文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在翻译从房子到孙子这几个词语时，采用音译法直接使用这几个词的拼音，这样可以保持原文文化以及形式的丰富特点及内涵，因为打油诗讲究的就是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因此在形式上音译法就做到了押韵，包括后面的庄子到孔子，以及最后一句话中的“fuzz”和“huzi”。另一方面，他还在每个音译词后加上其对应的英文单词，也方便读者了解原文特色的表达，对于其翻译进行深层次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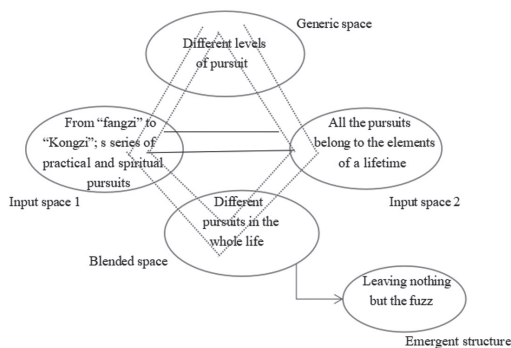


图 4 例 4 概念整合网络图

通过图 4 可以看出，输入空间 1 为“房子”到“孔子”的一系列实际人生追求和精神追求，输入空间 2 为这一系列的追求或者事物构成人活这一辈子的元素。在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和合成空间都有共同的结构，即构成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以及所有的追求，所以合成空间为“一生中所包含的追求”，深层的层创结构也

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用人一生的时间来追求的事物。但是最后只留下花白的胡子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蕴含着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终会消散。因此,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可以直观体现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心理整合过程的变化,表现出译者在面对特色本源概念外译时,其内在心理对于中国本源概念的传达与阐释。

镜像网络如同镜子的反射,在这种翻译类型中,所有的空间都共享一个框架,因而对于文本中本源概念的翻译,译者很容易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概念对等和文化对等,所以此种网络类型对于源语意义以及文化内涵丰富的文本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因此镜像型概念整合网络的描述可以使读者对于译者的心理整合过程一目了然,同时对于译者动态心理空间的描述,也有利于读者和译者共同反思对于源语文本的描述到底有没有实现形式和概念对等。

2.3 单域网络

单域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有不同框架,但经过选择和整合,只有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被投射到合成空间,而且这种网络类型尤其在隐喻含义丰富的本源概念中能够体现出来(陈奕芳,2018)。

例 5

原文:现在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找一个科长,不如直接去寻了他局长。

(贾平凹,2012:281)

译文:These days it's easier to see the King of Hell than to deal with underlings.
(Goldblatt, 2016: 407)

例5来自民间一句典型的俗语,比喻求一些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办事,比求一些领导还要难。在这句话中,本意是指现在人际关系的复杂情况,往往与更小的官职上的人更难打交道,跟科长见面或者沟通不如直接去找更大的官职人员,比如局长。在现实中,“阎王”就是指一些领导或负责人,“小鬼”就是下面那些小手下或小角色。真正的大人物,其实面色和善又好沟通,办事效率也快,反倒是一些无名小卒狗仗人势,他们明明是下属,却常常狐假虎威,其实就是逼迫你给他们一点好处,让他们从中享受一下优越感。这种小人物还特别擅长“变脸”,你要是稍微有点权势,他们会立刻戴上另一套面具,笑容可掬地对待你。这里将地府中的交际情况和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做了对比,把“科长”比作“小鬼”,把“局长”比作“阎王”。

根据图5,两个输入空间有完全不同的框架,输入空间1是“地府中人际关系情况”,输入空间2是“目前的官场情况”,概念网络中的整合空间提取了输入空间2中的框架以及输入空间1中的元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了“the King of Hell”和“underlings”来译输入空间1中的“阎王和小鬼”的元素,并运用输入空间2中的框架,类属空间为输入空间1和2中的共同点,也就是地府中人际关系和目前官场中人际关系的相同点,合成空间说明目前官场的人际交往

中小的官职人员往往更难对付。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图可以直观地表达出译者心理整合网络的状态以及构建,而且译者的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出本句话的语义内容和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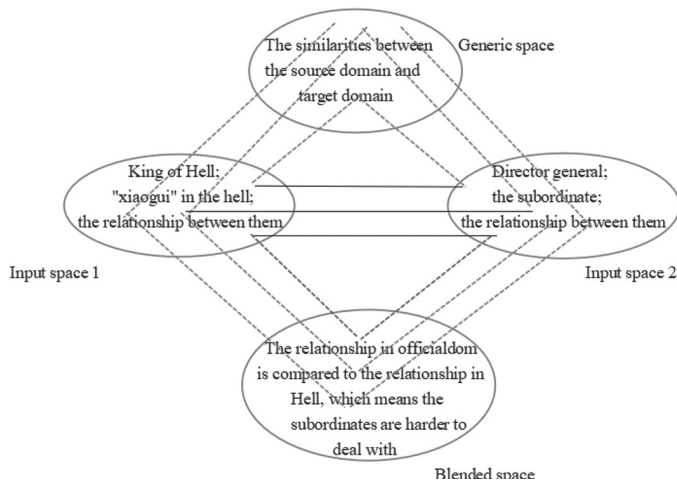


图5 例5 概念整合网络图

例6

原文: 那丈夫说: “话这么说了, 我是粗人, 咱也就月亮地里耍锄刀, 明砍!”
(贾平凹, 2012: 395)

译文: “Well, how should I put this? I’m not the cultured type, so let’s not beat around the bush. (Goldblatt, 2016: 522)

“月亮地里耍锄刀, 明砍”, 是一句方言歇后语, 本意是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不拐弯抹角, 不遮遮掩掩。“砍”字本身就表达了有力度和准度的率直和果断, 直接而且尖锐, 在文中意为要丈夫和周敏两个人打开天窗说亮话, 有什么就说什么。译者以自身的翻译空间为取向, 在面对这一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本源概念时, 对文本有了基本的理解之后, 更多关注如何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本源概念的含义, 因此结合对相关文化内涵的理解, 译者直接将这句话译为了“let’s not beat around the bush”, 简洁明了, 并没有译出所谓的“耍锄刀”或者“明砍”。即便译者用了大篇幅文字解释“耍锄刀”或者“明砍”的意义, 读者还是会一头雾水, 因此译者直接将其表达的深层含义译出, 更有利于读者的认知与理解。

根据图6, 两个输入空间有完全不同的框架, 输入空间1为“‘They will go straight to the point’”, 输入空间2为“‘like not beat around the bush’”, 类属空间中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点为“‘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kind of behavior and the allegorical saying’”, 整合空间即为通过“‘their conversation will be clear and brief’”。以译者翻译空间为主要导向, 译者并没有过度解释方言歇后语的内涵,

而是直接将本源概念表达的深层次意义翻译出来。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图可以清晰读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心理网络的构建，因此便于更加深入了解译文的动态形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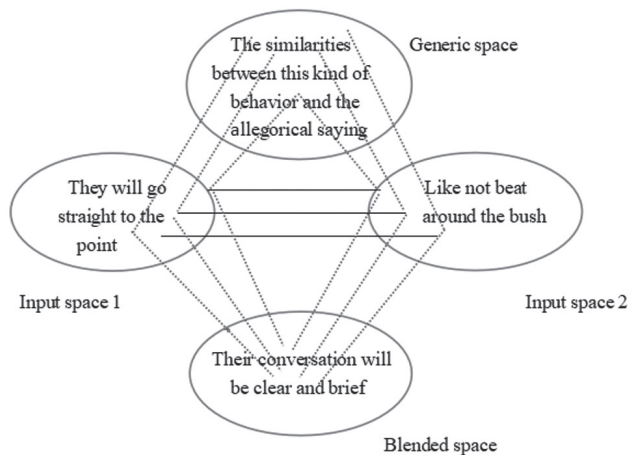


图6 例6 概念整合网络图

单域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都包含各不相同的框架，整合空间是对其中一个框架中的内容进行整合加工，所以译者对于输入空间框架的选择决定了其想实现源语中本源概念的意义与译语的何种对等，因此这种整合网络的构建比较适合源语文本中特有本源概念的翻译。对于读者来说，通过概念整合网络图可以清晰地读出原文本中特有的本源概念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另一方面通过译者的翻译也能够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于输入空间框架的选择以及对于合成空间的心理认知加工过程。

2.4 双域网络

福柯尼耶和特纳（2002）认为，双域网络中的两个输入空间包含不同的组织框架，合成空间从每个空间中提取部分框架，组成新的框架并在整合空间中进行加工。

例7

原文：她是从没吃过亏的人，要强惯了，碌碡拽在半坡，是退不下来。（贾平凹，2012: 88）

译文：As someone who has been a proud person all her life, “she can’t just back down, like a stone rolling downhill.” (Goldblatt, 2016: 121)

“碌碡”，又称“碌轴”，类似于石碾，是一种用来碾压的农具，外形类似圆柱体，中间略鼓起，用来轧谷物，在中国安徽、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农村大量使用。

原文意为, 景雪荫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 没有吃过亏, 就像碌碡一般, 因其主要部分是光滑的石头做成, 所以把它放在半坡, 是阻止不了它滚下来的。前半句点明了她的个性, 后半句又用了“碌碡”这一农具的特性加以说明, 突出了景雪荫的特性。因此, 在对这一本源概念进行翻译时, 译者要从两个输入空间的每个框架中提取结构, 在准确理解这一农具的基础上找出与源语中本源概念意义与文化都对等的译文, 并且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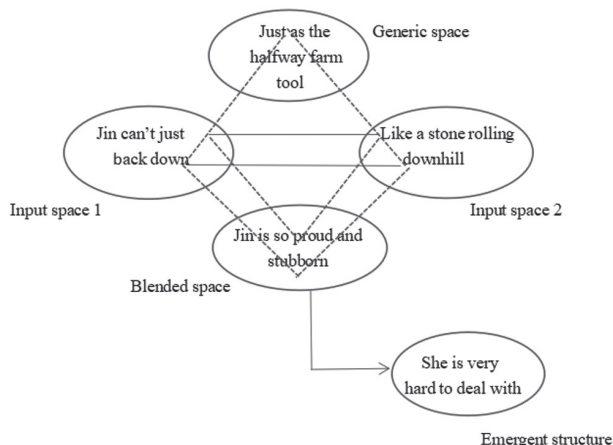


图7 例7 概念整合网络图

如图7所示, 输入空间1和2为对景雪荫性格的对比描述, 类属空间中两个输入空间的共同特点就是景的性格就如这个拽在半坡的农具一般, 因这一农具本身主体就是石头所做, 拽在半坡的话, 即使不是“碌碡”, 只是一块石头, 也会朝下坡滚去。因此这个农具也是一样, 其中间就是一块石头, 所以和其他石头一样会“rolling downhill”。译者没有花大篇幅去解释这一农具, 而是使用了提喻的修辞手法, 用部分指代整体翻译出来, 因此整合了两个输入空间的结构后, 合成空间即为“she is so proud”, 深层的层创结构即景很难应付, 这样的事情更是会让她抓狂。

例8

原文: 黄厂长给庄之蝶说: “她是瞧你也来了就张狂了, 真是土地爷不能当神, 婆娘家不能当人!” (贾平凹, 2012: 236)

译文: “She’s getting brassy because you’re here,” Huang said to Zhuang. “This is a case of an earth deity unworthy of being a god, and a woman unfit to be called human.” (Goldblatt, 2016: 343)

这是黄厂长对庄之蝶评价自己老婆的话, 因为其行为有些张狂, 所以言语中透漏出对自己媳妇行为的不满, 在外人面前贬低自己的老婆。其中也看出黄老板

的大男子主义与其老婆的家庭地位。原文中的“土地爷”是众神中地位最低的人,那么对应的“婆娘家”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最低下的人,用“土地爷”和“婆娘家”的对比来暗指女人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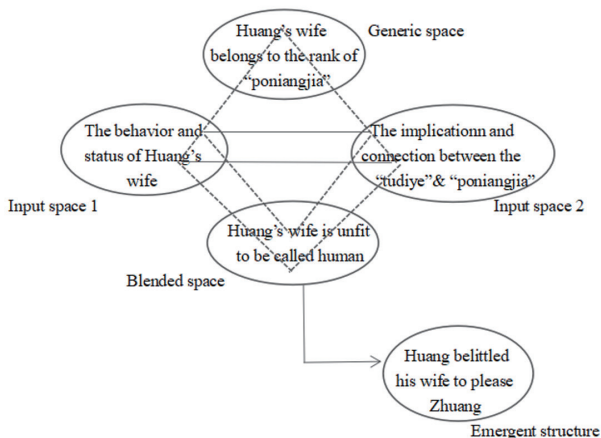


图8 例8 概念整合网络图

如图8所示,两个输入空间包含不同的组织框架,输入空间1包含黄厂长老婆的行为及其家庭地位,输入空间2包括土地爷和婆娘家的暗指与联系,类属空间意为黄厂长的老婆属于“婆娘家”的位置行列,合成空间具有两个输入空间的对应项。这种整合融合了输入空间1中的基本信息,提取了输入空间2中的基本联系,从而赋予隐喻意义,即“黄厂长的老婆不能被称之为人类”。在翻译时,译者经过心理网络空间的整合与构建,译出了准确传达语义的译文,如“earth deity”“unfit to be called human”,准确传达了陕西地方语言的特色,深层的层创结构也就意味着黄厂长在外人面前为讨好别人而极力贬低自己的老婆。因此,通过译者翻译时概念整合网络的构建可以看出,译者对此处翻译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保留了本源概念的特色,另一方面准确传达出了原文的语义内容。

双域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都包含不同的框架,合成空间是从每个框架中提取结构而整合的,因此每个框架中的结构对于译者来说,如何取舍,如何进行整合就成为关键的一步。此类翻译虽稍显复杂,但也最能使译者译出源语中本源概念与文化都对等的译文。因此,对于较为复杂的源语中本源概念的翻译,双域网络不但可以揭示译者对于合成空间的心理整合过程,而且对于源语中本源概念的解释也最为透彻,读者可以根据概念整合网络图读出原文作者的心理认知机制。

3. 结语

上述分别从不同的概念整合网络对小说《废都》中不同本源概念的翻译进行

分析,主要运用了单纯网络、镜像网络、单域网络以及多域网络框架。不同的本源概念翻译在不同的概念整合网络框架中都形象传达出译者在进行双语转换活动中的动态心理过程在概念整合网络的形象指导下将译者翻译的认知过程表现出来,一方面有利于译者译出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理解的译文,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对小说中特色的本源概念包含的特色文化信息及其英译有更深刻直观的理解。

总体而言,概念整合网络的构建对于语义的阐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从《废都》中本源概念的英译出发,具体分析面对不同本源概念的表达,译者在构建不同的整合网络的同时,对原文的认知阐释也不尽相同;但是总体来说能够用比较直观的方法展示出译者对于本源概念翻译的语义构建过程。研究一方面扩展了对于《废都》中本源概念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有利于译者在概念整合网络的指导下对相关本源概念、方言以及文化负载词等英译进行更加直观与准确地认知阐释。

参考文献:

- [1] Fauconnier, G.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 Fauconnier, G. Conceptu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3(02): 2-7.
- [3] Fauconnier, G. &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130-133.
- [4] JIA P W. *Ruined City* [M]. HOWARD G, Translated.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6.
- [5]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 [6] 陈奕芳. 概念整合理论下闽南歇后语的语义认知阐释 [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89-94.
- [7] 何元建. 论本源概念的翻译模式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42(03): 211-219+241.
- [8] 贾平凹. *废都*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2.
- [9] 李贺园. 换喻视角下的汉语方言英译——以《废都》中陕西方言英译为例 [D]. 安徽大学, 2018.
- [10] 黎璐. 从场景——框架理论看《废都》方言词汇翻译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02): 15-19.
- [11] 文旭, 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2] 赵红. *陕西文学方言翻译研究——以《废都》为例* [D].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9.

占语前缀 pa- 的来源研究

黄先民

(云南红河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 占语 (Cham language) 属于南岛语系西部占语支, 是生活在越南南部地区以及柬埔寨的占人及附近部分山地民族交流所使用的语言。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占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受到周边孟高棉诸语的影响十分强烈, 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同海岛南岛诸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占语在构词法上仍保留南岛诸语的特征, 其中动词前缀 pa- 是占语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构词成分。本文就占语中 pa- 前缀的来源进行探讨, 并对其变异形式与对周边亲属语言的影响进行阐述。

关键词: 占语; 词缀; 前缀 pa-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Prefix *pa-* in Cham Language

HUANG Xianmin

Abstract: Cham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western Cham language, a branch of the Austronesian family. It is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Cham people living in southern Vietnam and Cambodia and some of the nearby mountain ethnic groups.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n the mainland, the Cham language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urrounding Mon-Khmer languages during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 of Cham language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n islands. Cham language still re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morphology, and the verb prefix *p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orphological component in Cham languag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prefix *pa-* in Cham language, and explain its variation and influence on the languages of relatives around it.

Key words: Cham language; affix; prefix *pa-*

1. 缘起

占语支诸语 (Chamic languages) 是分布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唯一的南岛语群。占语支诸语中, 无论从使用人口和历史影响来看, 占语都是最重要的语言。占语存在两大方言: 分布于越南 Phan Rang 与 Phan Ri 地区的为占语东部方言 (East

作者简介: 黄先民, 男, 云南红河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东南亚语系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占婆及东南亚古代碑铭研究。

Cham, 又称 Phan Rang Cham); 分布于柬埔寨境内的主要为占语西部方言 (West Cham)。两者在语音、词汇、文字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占语的名称, 部分国内学者惯用“占婆语”这一称呼; 但究其本身, 笔者发现, 占人将自己的文字称之为 akhar cam, 将自己的语言称之为 sap cam; 暂未发现使用 akhar campa 或 sap campa 的情况。因此, 关于该语言的正名, 笔者建议应规范使用“占语”一词。

同属于占语支的主要语言还有 Chru 语 (或译“初汝语”, 越南语称之为 tiếng Chu Ru), 主要分布于越南林同省南部与宁顺省部分地区, 该语言存在 Noang 与 La Dang 两种方言。Haroi 语 (或译“赫罗依语”, 另见吴安其译“哈罗伊语”) 主要分布在越南平定省与富安省一带, 其亦使用婆罗米占文书写, 同占语的近似程度较高。Rade 语 (或译“埃地语”, 越南语称之为 tiếng Êđê) 主要分布在越南的西原地区。关于 Rade 语的方言情况, 历来说法不一。热曼·登与张文生认为 Rade 存在 6 种方言: Êđê Kpă, Êđê Adham, Êđê Blô, Êđê Ktul, Êđê Dliê-Ruê, Êđê Mthur (Rômál Dêl & Trương Văn Sinh, 1974)。而依江涅辛在研究中表明 Rade 语存在 7 种“土语”: Mdhur, Adham, Blô, Kodrao, Bih, Krung 与 Rđê Kpă (Y Čang Niê Siêng, 1979)。但上述两种分类均缺乏对各方言的具体描写, 可靠性存疑。1986 年与 1996 年, 在法国远东学院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联合考察的支持下, 段文福提出了 Rade 语存在 9 种方言的说法, 并在《埃地语方言词汇》(Từ vựng các phương ngữ Êđê / Lexique des dialectes Êđê) 一书中以详细的词表方式列出, 即: Kpă, Adham, Krung, Ktul, Mdhur, Drao, Blô, Êpan 和 Bih (Đoàn Văn Phúc, 1998)。除此之外, 占语支中还有 Jarai 语 (或译“嘉莱语”, 另见吴译“加莱语”), 主要分布在越南嘉莱省、昆嵩省; Roglai 语 (或译“拉格莱语”, 另见吴译“洛嘉莱语”), 主要分布在越南庆和省和宁顺省西部山地地区。中国海南省的回辉话 (Tsat) 与印尼的亚齐语 (Acehnese) 亦属于占语支。

关于占语支诸语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杜冠明依照谱系理论给出如图 1 树状图 (Thurgood, 1999):

占语属于南岛语系诸语中的一种, 其构词法也遵循南岛语系的普遍特征规律, 即大量使用前缀 / 中缀与后缀来进行词的派生。在今天其他南岛语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例子。以印尼语与马来语为例:

印尼语 (Bahasa Indonesia):

ajar 教, 教导, 教诲, 教养: bel-ajar 学习; meng-ajar 教书, 讲课; meng-ajar-i 教唆; meng-ajar-kan 教给, 教导; arja-an 教诲, 训导; peng-ajar 教师; peng-ajar-an 教学法; pel-ajar 学生; mem-pel-ajar-i 专研; ter-pel-ajar 有知识的; pel-ajar-an 课程, 工科; ber-pel-ajar-an 受过教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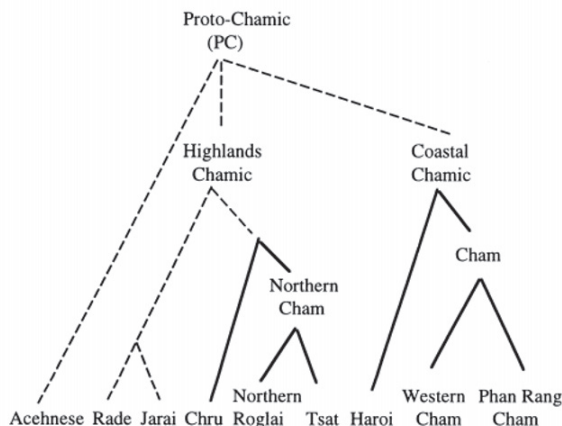


图1 占语支诸语关系示意图

makan 吃, 进食: me-makan 吞食; di-makan 被吞食, 毁掉 me-makan-i 大量地吃; me-makan-kan 喂食; ter-makan 被吃光, 无意吞下; pe-makan 食用者, 捕食者; makan-an 食物

马来语 (Melayu):

hitung 计算: ter-hitung 被计算的, 可数的; hitung-an 算术

rapat 密切的: me-rapat-kan 使接近; me-rapat 行近, 接近

虽然占语中的词缀远不如印尼语和马来语丰富, 但仍是其构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如下例子说明:

占语 (Cham language):

thau 知道: pa-thau 使知道, 告知; mâ-thau 知晓

luak 搜寻: pa-luak 差人打探, 试问

liéng 享用: pa-liéng 献祭; mâ-liéng 服侍, 供奉

galung 蜷缩: pa-galung 使翻滚, 敲击 (鼓点); ta-galung 翻滚

从上述例子可知, 在为数不多的词缀中, pa- 是占语构词法中非常普遍且重要的前缀。而关于这个前缀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 还不得而知。因此本文尝试对这一前缀的来源进行试探性的解析, 并介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作为区域强势语言的一个重要成分, 其对周边同支弱势语言产生的影响。

2. 前缀 pa- 的历史来源

2.1 正字法

在说明语源问题之前, 首先要澄清一个正字法的问题。实际上现代占语中存在两个在语音层面完全等价的字母: 占文分别称之为 pa-asit (意为“小 pa”, 占

文写作 p) 与 pa-praong (意为“大 pa”，占文写作 F) (当行文需要区别 pa-asit 与 pa-praong 时，我们用 p 表示 pa-asit，用 P 表示 pa-praong)。在占语中，用 pa-praong 书写的前缀 pa- 在数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甚至让人产生派生词词缀只能用 pa-praong 来书写的错觉。而事实上，从正反两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反驳的例子，如：

ceng 阻挡：pa-ceng 掩盖，护卫；dung 揪住：pa-dung 下坠

Padak 连续的；Payér 传递；Po 神灵；Pok 端起

占语中绝大多数 pa- 前缀用 pa-praong 书写，但同样存在个别词用 pa-asit 书写的情况；另一方面，pa-praong 字母绝大多数时候只用来书写这个前缀，但亦有个别词不包含 pa- 前缀却也使用 pa-praong 书写的例子。出现这种分化的选择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从现存的刻有古占文的碑铭来看，古占语时期是不存在这种分化的，所有的 pa 都使用同样的一个字母书写。在公元 4 世纪晚期的 Dong Yen Chau 碑铭中，pa 的形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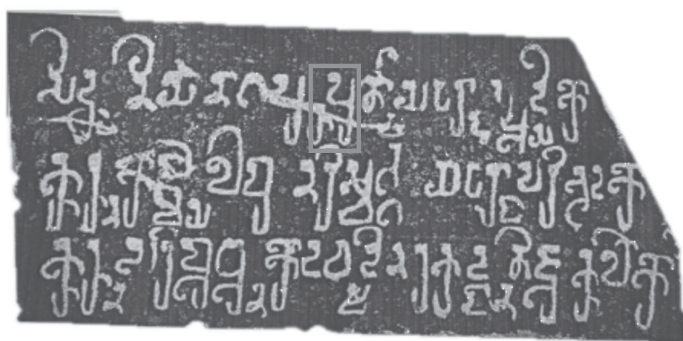


图 2 Dong Yen Chau 石碑

(1) *Siddham! Ni yang nāga punya putauv. Ya urāng sepuy di ko*

稍晚的碑刻之中，虽然字形上由于受到古高棉文的影响而作出了较大的调整，但是仍然只能发现一种 pa。如公元 9 世纪的碑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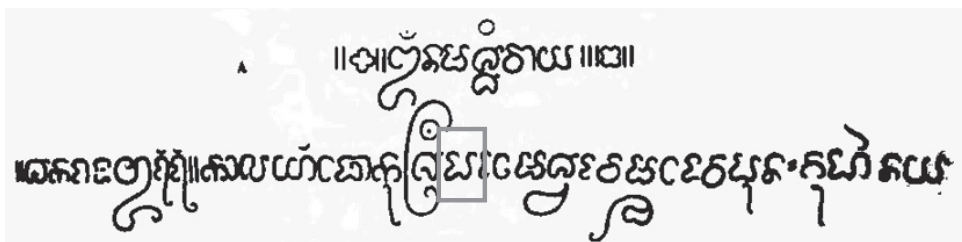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元 9 世纪占婆碑铭

(1) *Oṃ namas sivāya*

(2) *Sakarāja 788 kālā yāng Po Ku Srī Paramesvaravarmmadeva punah guhā nay*

法国学者雅克给出的古占字转写对照表中, 同样只存在一种 *pa*, 且将其归在了 *pa-asit* 一栏, *pa-praong* 一栏留白 (Jacques, 1977)。

种种材料都指向了一个问题: 在古占文时期 (即碑刻占文时代), 不存在 *pa-asit* 和 *pa-praong* 的对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古占文时期, 尤其是早期碑铭占文, 多采用梵文、占文夹杂混合的方式书写, 其字母书写体系亦直接取自梵文。所以这也足以解释为何古占文同梵文一样区分 *śa*、*sa* 和 *sa* 三个“咝音”, 但却只存在一个 *pa*。但为何在后来占文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 *pa*, 仅就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材料来推测, 还不得而知。从占婆皇家材料所使用的语料来看, 至少可以肯定在占文手书时期 (公元 15 世纪以后), 便已经出现了 *pa-asit* 和 *pa-praong* 的对立 (但也有混用的情况), 如:

paak 暴躁的; *Pa-ak* 抛弃

pak 何处; *Pak* 四

tapay / taPay 兔子

如前所述, 占语前缀 *pa-* 并非全部由 *pa-praong* 书写, 所以在本文中, *pa-* 所代表的是语音转写, 而非具体的字母转写。

2.2 词法功能

在探讨前缀 *pa-* 的语源之前, 还应该了解其语法功能, 具体体现在词法功能上。前文已提到, 占语同其他南岛诸语一样, 词缀在词的派生过程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南岛语中常见的词缀包括 4 类: 前缀、中缀、后缀和环缀。对于占语而言, 其内部只存在前缀与中缀。在穆萨所著的《占文文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am) 一书中, 关于前缀 *pa-* 的描述被作者置于“复合词”一节之下 (Moussay, 2015)。作者认为:

a. *pa-V_{intransitive}* > (*pa-V_{causative transitive}*) 即通过前缀 *pa-* 可使不及物动词转变为其对应的及物动词, 并赋予其使动意。如:

daok 坐: *pa-daok* 安置, 使坐下

thau 知道: *pa-thau* 告知, 使知晓

ndik 上: *pa-ndik* 使抬升

matai 死亡: *pa-matai* 杀死

hadiip 活着: *pa-hadiip* 重生, 使复活

dar 记住: *pa-dar* 叮嘱

占人有俗语: *pa-lue*^① *cei yauk ralaoh, tak sang blaoh caok taok cei palao*. “骗叔叔割茅草盖屋, 屋子盖好把叔叔踢走 (喻忘恩负义)。”这里的 *palue* (哄骗) 一词来自于 *lue* (诱引)。

b. *pa-V_{active / passive}* > (*pa-V_{active}*) 即一个主动或被动形态的动词加上前缀 *pa-* 后成为一个主动形态的词, 且这个派生词与原词存在语义因果联系。如:

blei 买: *pa-blei* 卖

mabuk 醉: *pa-mabuk* 使其醉倒

heng 辣: *pa-heng* 使变辣

mbak 咸: *pa-mbak* 使变咸

ngap 做: pa-ngap 使做
tuei 跟随: pa-tuei 尾随
yamân 甜: pa-yamân 使变甜

anaih 小: pa-anaih 使变小
cadu 宽松: pa-cadu 使变松弛
cateng 绷紧: pa-cateng 使变绷紧

占人有俗语: *takrâ praong ngap pa-anaih, takrâ ligaik ngap tuei jalan*. “成大人先缩小, 欲通达者则随其途(喻人格是成功的关键)。”这里的 pa-anaih (使缩小) 一词派生自 anaih (小的)。又有: *ma-in saong pasang urang yau urang pa-ghang apuei pong*. “与别人的丈夫幽会好比在燃烧的草垛旁烤火。”这里的 ghang 本意是“散发光热”, 而派生词 pa-ghang 则意为“烤火取暖”。

c. pa-N > (pa-N)_{verb} 即一个名词词干加上前缀 pa- 之后, 会构成一个主动或被动语义的动词。如:

await 段: pa-await 折成段
awan 枝干: pa-awan 分枝
bu 粥: pa-bu 煮粥

mbuw 味道: pa-mbuw 使有味道
ngan 名字: pa-ngan 命名

如例句: *hajieng saong dahlak ew pa-ja pa-ong ai*. “因此我直呼你为哥哥。”这里的 pa-ja pa-ong 词干都为名词: ja “人”; ong “爷爷”; 派生后构成词组“直呼其名”。又: *klak phun gambak di dhan klak gep pa-tian tuei urang parat*. “抛弃骨肉追随外邦人好比舍本逐末。”这里的 pa-tian 派生自名词 tian, 本意为“心”, 派生后的动词为“同心”; 句中化用为名词“骨肉”, 指有血缘亲属的人。

d. pa-V_{passive} > (pa-V)_{intransitive} 即一个被动语义的动词在前缀 pa- 的作用下构成了一个不及物动词。如:

abih 完成: pa-abih 使完成
drah 迅速: pa-drah 使迅速

gem 粘贴: pa-gem 使粘贴
siam 美丽: pa-siam 使美丽

如有: *ngap pa-drah nao*. “做快一点!” 又: *apuei suai pa-dam*. “火灭得很慢。” 又: *dahlak meng makah pa-deng asulam*. “我自麦加来传播伊斯兰教。”

虽然穆萨对 pa- 的词法功能做了详尽的分析, 但不难看出, 其分类十分混乱。不同小类中存在功能交叉重叠的情况: 尤其是 a、b 两点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完全可以将其合并为 pa-V > (pa-V)_{causative}, 即动词词干在前缀 pa- 的影响下变成了其关联语义的使役动词; 也可能形成同源词干有因果语义联系的派生动词, 如 blei 买: pa-blei 卖。而穆萨在 b 点中谈到的动词主动态和被动态, 这个特征在占语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占语不存在像印尼语和马来语那样广泛的被动前缀 di- 和 ter-, 甚至连类似于印尼语和马来语里 oleh 引导的被动语态介宾结构都没有。通常情况下, 同等语义的一个被动语义句子, 在占语中多以主动的形式体现。作者过分地强调动词的主动义与被动义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再者, 作者给出的例词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 yamân 甜: pa-yamân 使变甜; heng 辣: pa-heng 使变辣; mbak 咸: pa-mbak 使变咸; anaih 小: pa-anaih 使变小,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 原词干为动词

的这种说法都难以让人信服。在 d 点中,作者又一次谈及被动形态的动词词干在前缀 pa- 的驱使下形成了不及物动词。然而作者给出的例句却并不能反映这点:*dahlak meng makah pa-deng asulam*。“我自麦加来传播伊斯兰教。”该句中,pa-deng(传播)一词之后明显带有直接宾语 asulam(伊斯兰教)。且在一定程度上,d 点和 a、b 两点也是存在交叉重合的。

关于前缀 pa- 究竟在占语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看如下的例子来阐释说明。

ac 灰心: pa-ac 抛弃	aek 饥饿: pa-aek 禁食
blei 买: pa-blei 卖	blek 转向: pa-blek 使翻转
daok 坐: pa-daok 安置,使坐下	gap 恰合适的: pa-gap 调控
hacih 干净: pa-hacih 打扫	jieng 变成: pa-jieng 创造
matai 死亡: pa-matai 杀死	ong 爷爷: pa-ong 直呼其名
sa 一: pa-sa 统一	tok 娶: pa-tok 嫁

通过上表,可将 pa- 的功能归为两类:一是词干为名词或形容词时,前缀 pa- 使之转变为语义关联的动词,如:ac 灰心: pa-ac 抛弃; aek 饥饿: pa-aek 禁食; gap 恰合适的: pa-gap 调控; hacih 干净: pa-hacih 打扫;二是词干为动词时,前缀 pa- 使之增加使动意,即体现为动词的使役形式(causative),如: daok 坐: pa-daok 安置,使坐下; jieng 变成: pa-jieng 创造; matai 死亡: pa-matai 杀死。也可能形成同源词干下具有因果语义联系的派生动词,如: blei 买: pa-blei 卖; tok 娶: pa-tok 嫁。在占语中还存在极个别例外(可能语源上存有其他来历),如: nai 女子: pa-nai 对女子的尊称,公主。

2.3 pa- 的来源

在原始南岛语(下文简称为 PAn)层面,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存在 *pa- 这样一个前缀。最早瑞士学者布兰德·斯泰特提出了所谓的“共通印尼语”(Common Indonesian)的概念,并指出判定一门语言是否属于这个范畴的标准之一,便是是否存在同给定的词缀共通的成分;在他给出的词缀中就包含了其认为来自 PAn 的 pa-,并且还注明了 pa- 的性质为“使役形式”(causative formative)(R.Brandstetter, 1916)。斯塔罗斯塔也同样提出了 PAn 中存在的一些词缀,其中亦包含 *pa-,并注明了其功能是“从非静态动词中派生出使役动词”(Derived causative verbs from nonstative verbs)(Starosta, 1995)。杜冠明认为现代占语的 pa- 来源于 PAn 中的 *pa-,但是却历经了原始占语(下文简称为 PC)的 *pə- 阶段(G.Thurgood, 1999:301),如有 PC: *pə-blɛy(卖)。即: Cham: pa- < PC: *pə- < PAn: *pa-,并直接指出了该前缀的功能为“使役前缀”(causative)。同时他指出, PAn 中的 *pa- 在后期存在如下演化: PAn: *pa- > PC: *pə- > W. Cham / PR Cham: pa-, Rade: m-, Jarai: pə-, Chru: pə- / per-, Roglai: pa-, Haroi: pə-, Paiwan: pa-。不仅如此,南岛语中的前缀 pa- 还对应孟高棉语族中 Bahnar 语的 bə-。实际上在原始孟高棉语中也存有表使役语义的一个前缀 *p(V)- (Sidwell, 2008:257-263)。早期的占语学者

就认为占语中的使役用法来自孟高棉语 (Aymonier, Cabaton, 1905)。但该说法并不可取, 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原始时期南岛人与孟高棉人密切交流造成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很多南岛语中的词似乎与孟高棉语存在“同源”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非常早期的语言借词现象, 已经无法说清究竟谁出现得更早。

往后的重拟工作中, 白乐思认为 PAn 中存在两个使役前缀 *pa- 和 *paka- (斯塔罗斯塔认为 *ka- 是用以引导起始动词 (inchoative verb) 的标志) (Blust, 1999); 之后希麦尔曼与沃尔夫 (Himmelman & Wolff, 1999: 65)、黄美金 (Huang, 2000), 齐莉莎与黄美金 (Zeitoun & Huang, 2000) 都明确地指出了 PAn 中的 *paka- 前缀是由 *pa- (使役前缀) 和 *ka- (引导状态动词的前缀) 这两个独立的词缀复合构成的, 因而不能将 *paka- 拟定为一个单独的前缀。其后, 白乐思 (Blust, 2001) 又在过去的基础上, 在 PAn 层面重拟了 3 个使役前缀: *pu-, *pi- 与 *pa-。根据白乐思的解释, *pu- 的重拟依据来自台湾南岛诸语中的位移使役前缀 (the causative of motion) mu-, 如在台湾邵语 (Thao language) 中, inay “这里”: munay “来这里”。*pi- 的重拟依据同样来自台湾南岛诸语中的位置使役前缀 (the causative of location) pi-, 如在台湾排湾语 (Paiwan language) 中, ivavaw “上方”: pivavaw “使之置顶”。因此白乐思在 PAn 层面新重拟的 3 个使役前缀就分别承担了以下功能: *pu- 位移使役前缀、*pi- 位置使役前缀、*pa- 一般使役前缀 (general causative)。阿德拉尔则认为白乐思重拟的 *pi- 不应该单独设类, 因为 *pi- 的来源可能同样始于 *pa- (Adelaar, 2001)。按照阿德拉尔的说法, 即有: PAn: *pi- < *pa- + *-i-。*-i- 在 PAn 中体现为“位置词缀” (locative affix), 在现代南岛诸语中仍有保留, 如印尼语中, cinta “爱”: cintai “对某物产生爱念”。吴安其 (2009) 同样也提到在原始马来-他加洛语存在一个使动前缀 *p-, 同时也是派生名词前缀。这个原始的 *p- 在他加洛语中体现为 pa-, 如, sūsu 乳房: pa-susūh-in 喂奶 (使役形式); kīta 看见: pa-kīta 叫看。但是 pa- 还可以是动词前缀, 使其名词化, 如: tālo 打败: pa-nālo 胜利。在印尼语中体现为 per-, 如, tinggi 高: mem-per-tinggi 加高; kuat 强: mem-per-kuat 加强。而 per- 中的 r 来源于 PAn 的中缀 *-r-, 那么按照吴的说法就有: per < *p-r-。又在巴拉望语中体现为 po-, 在亚齐语中体现为使动前缀 pɔw-。而吴认为亚齐语中的 pɔw- 正是 PC 中 *pa- 的来源。

南岛诸语中都普遍存在着使役前缀, 它们之间还保留很好的对应关系, 因此说占语中的 pa- 来自于 PAn 是不存在较大问题的, 并且 PAn 中的 *pa- 经过 PC 的 *pə-, 再回到现代占语中的 pa-, 这一路线也是清晰明显的。经过白乐思的重拟与阿德拉尔的修订, 在 PAn 层面应该存有两个确认无疑的使役前缀: *pa- 与 *pu-。其中 PAn: *pa- > PC: *pə- 没有任何问题, 但 PAn 中的 *pu- 是否在 PC, 或者说是在原始马来-占语 (下文简称为 PMC) 中有所保留, 亦或产生了对应的形式, 需要我們再做进一步研究解释; 二是如何解释 Cham: pa- < PC: *pə- < PAn:

*pa- 中 PC: *pə- 的出现。对上述两个问题解释清楚后, 方能对现代占语中使役前缀 pa- 的来源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知。

就第一个问题, 在我们能找到的语料范围内, 没能发现 PC 或是 PMC 中有 *pu- 存在过的痕迹。假设 PAn 中的 *pu- 果真进入了 PMC 这一支, 那么在 PC 阶段该前缀应该是维持 *pu- 的形式。需要注意, 虽然 PAn: *u > PMP: *u > (> early-PC: *u) > PC: *ɔw (PMP: 原始马来波利尼西亚语), 但该音变存在一个条件, 长元音的 ɔw 一般只存于重读音节 (stressed-syllables) 中, 在非重读音节 (unstressed-syllables) 中的 u 将维持不变。占语中的前缀总是处于轻重格 (iambic) 模型下的前置音节 (presyllable) 中, 所以必定是弱读形式 (将在下文谈到)。如此 PC 阶段将存在 *pu- 形式。但遗憾的是, 事实上现代占语中以 po 或 pu 音节起始的词都非常少, 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梵语借词, 如 Pokja 敬重、pukar 种类、putra 君王。所以就目前的结果来看, 很难证明 PAn 中的 *pu- 进入了占语诸语。

至于为何 PAn 中的 *pu- 没能进入到占语诸语, 可以试着从沃尔夫 (1973) 的 PAn 动词系统形态核心重拟表中找寻答案。沃尔夫将 PAn 中的各种词缀视为“独立的”动词语态标记, 具体如下:

语态	非过去	过去
施动 (actor)	*<um>	*<inum>
直接被动 (direct passive)	*-en	*<in>
处所被动 (local passive)	*-an	*<in>an
工具被动 (instrumental passive)	*i-	*i-...<in> (?)

上表中 <um> 等表示中缀

根据沃尔夫给出的动词语态标记, 那么处于非过去直陈式下的使役前缀 *pu- 很有可能来自 *p-um- 这样一个组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PAn 中的使役前缀 *pa- 和 *pu- 两者等同起来, 因为它们的来源并不相同: *pu- 是一个复合的词缀, 在语源上同 *pa- 有所区别。处于印支半岛上的占语诸语由于长期受到周边南亚语群的影响, 丢掉了 PAn 中近乎所有的动词语态标记 (Blust, Chen Y.X., 2017)。我们仅能够从杜冠明 (1999) 的重拟中找到前 PC 阶段占语诸语中曾存在过动词语态标记的蛛丝马迹, 如: PC: *minum / *minam < PMP: *um-inum 喝; Haroi: mətah < PMP: *um-utaq 呕吐 (PC: *patah, 这里 PC 中的 *patah 并不能够对应 PMP 的形式, 但同语支 Haroi 语里的 mətah 似乎能够契合)。因此 PAn 中的施动标记 *-um- 很有可能在 PMP 向 PC 过渡阶段就已经完全丢失, 所以 PC 乃至现代占语中的 pu- 前缀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个问题, 如何解释 Cham: pa- < PC: *pə- < PAn: *pa- 中 PC: *pə- 的出现。杜冠明 (1999) 认为, 占语从 PMP 到 PC 再到现代占语, 语音上反映了从双音

节 (disyllable) 到半重音节 (semisyllable) 的演变趋势。杜冠明将占语中的这种半重音节称之为轻重格 (iambic), 因为占语总是“头轻脚重”的, 区别于重轻音节 (enclitic)。首音节 (initial syllable) 中的元音在这种演化趋势中会弱读, 甚至直接脱落。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占语正字法并不能体现这一点, 如: gaha 宫殿、hambar 缠绕、tada 沙丘。其中每个词前后两个音节中的 a 在语音层面绝非等价, 因为首音节中的 a 总是被弱读, 所以我们建议在严格记音转写时, 采用 gāha、hāmbar、tāda 这样的方案来体现两个相同元音 a 之间的语音差异。另需注意占文中有 3 个辅音字母 (mâ, nâ, nyâ) 本身就表示了内含元音 (或基元音) 是弱读的, 我们应当在转写上同前面的规则相区别, 如: mâta 眼睛、nârah 世界、nângar 绳索。另有一种情况即首音节中的元音直接脱落, 多见于重读音节起始辅音为 h 的情况。首音节中的元音脱落后, 起始辅音同重读音节辅音 h 结合, 产生了占语的送气辅音组。如下表 (Thurgood, 1999:64):

PMP	Malay	PC	Aceh.	Chru	NR	Tsat	
*paqit	pahit	*phit	phet	phi:ʔ	phi:ʔ	phi:ʔ ²⁴	苦的
*paqat	pahat	*phat	phuət	pha:ʔ	-	pha:ʔ ²⁴	凿
*taqu	tahu	*thəw	thəə	thəu	thəu	tiauʔ ⁴² -i	知道
*taqun	tahun	*thun	thon	thun	thut	thun ³³	年

如果 PAn 或 PMP 中的首字母是元音, 那么该元音在 PC 中往往会被一个塞音 ʔ 代替。如: Cham: ia < PC: *ʔiar < PMalayic: *air < PMP: *wahir 水; 表示聚落的前置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占语中的 ia trang (芦苇地) 在早期进入越南语时变成了 Nha Trang (芽庄) 而不是 Ia Trang。占语诸语中 Rade 语的单音节化最为彻底, Rade 语中的两个起始元音字母 a 和 ê 似乎分别来自占语中的 a 和 i (?)。但作为起始字母的 a 与 ê 在 Rade 语中的实际读音为 ʔ 和一个非常弱的 ə。越南学者阮明获将后者记作 ǒ (Nguyễn Minh Hoạt, 2018)。无论是 ə 还是 ǒ, Rade 人都否认其为一个独立音节。所以从 *pa- 到 *pə- 实际上是占语诸语内部语音规律的变化。至于现代占语中的 pa-, 同样是因为正字法的缘故, 内部的 a 并不能代表在口语中的实际音值。

3. 占语与 Rade 语的使役动词前缀对应

上文说到南岛诸语, 包括占语支在内, 都普遍使用前缀 p(V)- 来表示动词的使役形式, 具体在占语中的体现为 pa-。另有 Rade: m-, Jarai: pa-, Chru: pa-/per-, N.Roglai: pa-, Haroi: pa-, W.Cham: pa-, PR Cham: pa-,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Rade 语采用 m- 来构成使役形式。根据潘文馥的描写, Rade 语中有: drao 药 ~ mdrao 医治, juăt 习惯 ~ mjuăt 成习惯 (不及物) ~ bi mjuăt 使成习惯 (及物) (Phan Văn Phúc, 1993)。因逻萨没有直接谈到 Rade 语中的 m-, 但是他认

为 Rade 语中的 m- 受到了占语前缀 mâ- 的影响。按照其说法, 占语中的 mâ- 与词干结合派生出一个表示能力的动词, 如 tian 心脏 ~ mâtian 怀孕, gru 教师 ~ mâgru 学, baoh 卵 ~ mâbaoh 下蛋 (Inrasara, 2011)。段氏心描写的 Rade 语派生构词方式中给出了如下示例, 包括: bǒ 满的 ~ mbǒ 使充满, brǔn 弯曲 ~ kbrǔn 使弯曲, jě 近的 ~ mjě 使走近, êa 水 ~ m'êa 稀释, dua 二 ~ mdua 翻倍 (Đoàn Thị Tâm, 2012)。段氏心的举例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了, 一是 Rade 语中的前缀 m- 不只是构成了动词的使役形式, 如: êa ~ m'êa。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例词: tao 管辖 ~ mtao 国王, tian 心脏 ~ mtian 怀孕, drao 药 ~ nai mdrao 医生 (新谷忠彦, 1981)。二是动词的使役形式也不是单由前缀 m- 构成, 还包括前缀 k-, 如 brǔn ~ kbrǔn。几年后段氏心在另一篇论文中对之前自己给出的列子进行了解释, 并归纳了 Rade 语中的词缀 (phụ tố)。Rade 语中的前缀 m-, 既可以结合词干构成一个使动语义的动词, 如: bǒ 满的 ~ mbǒ 使充满, jě 近的 ~ mjě 使走近又可以结合词干派生出一个与词干语义相关联的动词, 如: êa 水 ~ m'êa 稀释, dua 二 ~ mdua 翻倍, tian 心脏 ~ mtian 怀孕 (Đoàn Thị Tâm, 2017)。

就上述来看, 两位学者的解释都不全面。一方面 brǔn ~ kbrǔn 这一组中的前缀 k- 是否也具有使役语义, 是否可以视作与 m- 平行的一个动词前缀; 另一方面, tao 管辖 ~ mtao 国王, mtô 教 ~ nai mtô 教师中的 m- 是否也可以视为上述情况中的前缀, 但为何派生出的新词不像段氏心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动词, 而转化成了名词。Rade 语中的前缀 k-, 段氏心的解释为: 置于行为动词前, 派生出语义相关的工具名词, 如: đal 插入 ~ kđal 楔, tuăk 勾 ~ ktuăk 钩 (Đ.T.T., 2017)。显然段氏心认为的 k- 解释不了她所给出的例子。

关于 Rade 语中的前缀 k-, 杜冠明怀疑其来自越南南部 Bahnaric 语支中 Chrau 语的前缀 ta- (Thurgood, 1999)。我们没有查到 Chrau 语的语料, 但同属 Bahnaric 语支中的 Sre 语 (越南称之为 Co-ho 语) 里的 ta 表示“移动; 使消除” (Dournes, 1950); Sedang 语里的 ta 为实意动词“放置 (put)”, 也可位于另一动词前表示让“行为产生” (Smith, 2000)。我们尚未发现杜冠明所说的前缀功能, 杜冠明自己也承认 Bahnaric 语支中存有的动词使役前缀为 bə-, 其他一些学者也提到了南亚语中剩下的动词使役标记变体只有 Khasi 语中的 pn-/pyn- (Singh 1906), Khasi 语 Jowai 方言中的 pɪn (Bareh, Curiously, 2010) 以及 Pnar 语中的 p^ha? (Choudhary, 2004)。所以我们很难认同杜冠明关于 Rade 语中前缀 k- 来源的猜想。

我们认为 Rade 语中 k- 的来源可能很简单, 即继承了占语中的虚词 ka (为了, 使得)。占语中的 ka 在进入 Rade 语之后, 根据 Rade 语内部语音演化规律变成了 k, 并黏着在了动词词干上, 构成了一个表示“使役语义”的特殊前缀。

另一方面, 既然 Rade 语中的前缀 m- 同占语中的前缀 pa- 相对应, 那为何会

派生出名词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发生了语义迁移。Rade 语中的 mtao 确实对应占语中的 patao（国王），从词源上看 patao 来自 pa + tao。tao 意为“指定，管理”，那么 patao 就成了“使之管理”，进而再由这个语义派生出了“管理者”即“国王”。同样的道理 Rade 语中的 mtô 应该来自 PC 中的 *pa-to。*to 意为“知晓”，则 *pa-to 意为“使其知晓”，进而到“使其知晓者”，最后派生出“教师”这一语义。而 PC 中的 *pato 在占语中被梵语借词 gru 所取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占语中看不到 pato 一词。

4. 余论

前文所述，现代占语中的动词使役前缀 pa- 是继承了 PAn 中的 *pa-。而白乐思与阿德拉尔等人提出的 PAn 中的 *pu- 并没有进入到 PC 之中，自然在现代占语中也没有体现。在形态学（morphology）上，前缀 pa- 附着在动词词干上，构成该动词相应的使役形态。有时该使役形态语义还会派生出相关语义的名词语义，让该词名物化。

此外 Rade 语中的前缀 m- 同占语的 pa- 有着很好的对应关系。但 Rade 语中前缀 m- 的来源不仅仅是占语的 pa-，同时还接纳了占语前缀 mâ-，另有部分来自 Rade 语自身。

注释：

① G.Moussay 原书中为 paluo，根据正字法规定，本文改为 palue。

参考文献：

- [1] Adelaar, A.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Asia and Madagascar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 Barih C.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Jowai and Rymbai Dialects of Khasi [D]. Shillong: North Eastern Hill University, India. 2010.
- [3] Blust R, Chen. The pitfalls of negative evidence: “Nuclear Austronesian”, “Ergative Austronesian” and their progeny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7(18): 577-621.
- [4] Blust R.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J]. *Oceanic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1999, 42(2): 31-94.
- [5] Blust R. Notes on Pazeh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J]. *Oceanic Linguistics*, 1999(38): 321-365.
- [6] Blust R. Historical morphology and the spirit world: The *qali/kali- prefix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J].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1(519): 15-73.
- [7] Brandstetter R. An introduction to Indonesian linguistics [M].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6.
- [8] Choudhary N.K. Word Order in Pnar [D].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2004.
- [9] Dournes J. Dictionnaire Srê (Kôhō) - Français [M]. Sai Gon: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1950.
- [10] Đoàn Thị Tâm. Hệ thống từ ngữ chỉ thân tộc trong tiếng Ê-đê [J]. *Báo cáo khoa học Hội thảo Ngôn ngữ học Việt Nam*, 2009.

- [11] Đoàn Thị Tâm. Một vài đặc điểm ngữ nghĩa và văn hóa của lớp từ chỉ thân tộc trong tiếng Ê-đê (so sánh với tiếng Việt) [J]. *Từ điển học và bách khoa thư*, 2011(6): 130-136.
- [12] Đoàn Văn Phúc. Một vài vấn đề âm vị học đồng đại các ngôn ngữ Chamic [J]. *Nghiên cứu Đông Nam Á*, 1998(2): 62-71.
- [13] Đoàn Văn Phúc. Từ vựng các phương ngữ Êđê / Lexique des dialectes Êđê [M]. Nxb. TP. Hồ Chí Minh, 1998.
- [14] Himmelmann Nikolaus P. & John U. Wolff. Toratan (Ratahan) [J]. *Languages of the World / Materials*, 1999(130).
- [15] Huang Lillian M. Verb classification in Mayrinax Atayal [J]. *Oceanic Linguistics*, 2000(39): 364-390.
- [16] Jacques C. Essai de translittération raisonnée du cam par le groupe de recherches cam [J].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7 (64): 243-255.
- [17] Moussay G.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am [M]. Nxb. Văn hóa văn nghệ, 2015: 175-177.
- [18] Nguyễn Minh Hoạt. Từ loại danh từ tiếng Ê-đê [M].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2018.
- [19] Phan Văn Phúc, Tạ Văn Thông. Ngữ pháp tiếng Ê-đê [M]. Nxb. Giáo dục, 2011.
- [20] Phan Văn Phúc. Cấu tạo từ tiếng Ê-đê [D].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1993.
- [21] Romal Dêl, Trương Văn Sinh: Vài nét về các ngôn ngữ Malayô - Pôlinêdia ở Việt Nam [J]. *Ngôn ngữ*, số I, H., 1974.
- [22] Sidwell P. Proto South Bahnaric: a reconstruction of a Mon-Khmer language of Indo-China [J]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0(501).
- [23] Singh U. Nissor. Khasi / English Dictionary [M]. Shillong: Eastern Bengal and Assam Secretariat Press. 1906.
- [24] Smith K. Sedang dictionary with English, Vietnamese and French glossaries [J]. *Mon-Khmer Studies*, vol.1 2000.
- [25] Starosta S. A grammatical subgrouping of Formosan languages [J].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5(3): 683-726.
- [26] Starosta S., Andrew K. Pawley and Lawrence A. Reid. The evolution of focus in Austronesian [J].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1982, 2(75): 145-170.
- [27] Thurgood G.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 [28] Wolff John U. Verbal inflection in Proto-Austronesian [J]. Quezon City: *Philippin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Special Monograph*, (1973(4): 71-91.
- [29] Y Ắng Niê Siêng. Klei hriămh boh blũ Êđê / Rade vocabulary [M]. California, Manila, 1979.
- [30] Zeitoun Elizabeth & Lillian M. Huang. Concerning ka-, an overlooked marker of verbal derivation in Formosan languages [J]. *Oceanic Linguistics*, 2000(39): 391-414.
- [31] 新谷忠彦. ラデ語ベトナム語日本語 [M]. 東京: 東京外大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1981.
- [32] 吴安其. 南岛语分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西风东渐”：欧化潮流影响下的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

朱炬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武重奉是 20 世纪初期越南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其短暂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红运》作为其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以诙谐幽默且极尽讽刺的手法，讲述了主人公红毛春从市井之徒摇身一变成为“上流名人”的发迹史。小说真实再现了 20 世纪初期处在世界大变局和东西文化交织冲击下的越南社会实况。小说中无厘头的人物设置和荒诞的故事情节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潮流冲击下越南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本文以武重奉《红运》为例，试分析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在复杂环境下的现实与矛盾。

关键词：欧化运动；武重奉；越南文学；《红运》

Vietnam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isation Movement

ZHU Juyu

Abstract: Vũ Trọng Phụng is a well-known Vietnamese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works in his short life. *Số Đỏ* is a masterpiece of his novel, which adopts humorous and ironic techniques to tell th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Xuân Tóc Đỏ'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hilistine to a "high-class celebrity". The novel truly reproduc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Vietnamese societ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nonsensical character setting and absurd plot of the novel aroused us thinking about many social problems in Vietnam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trends. This article takes Vũ Trọng Phụng's *Số Đỏ* as an example to try to analyze the reality and contradictions of Vietnamese society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words: Europeanisation movement; Vũ Trọng Phụng; Vietnamese literature; *Số Đỏ*

作者简介：朱炬宇，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越南文史研究。

0. 引言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正处于殖民统治和封建压迫的双重冲击之下。法国殖民政府对越南施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剥削,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同时,跟随殖民统治一齐而来的还有各式的欧化“潮流”。欧化的“潮流”不断冲击着越南社会的各个方面,并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本文试从越南著名小说家武重奉的长篇小说《红运》为切入点,从讽刺文学的视角出发,以作品的创作背景、人物刻画、情节发展为依据,试探析《红运》背后所展现的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现实和欧化“潮流”影响下的复杂社会矛盾。

1. 武重奉与《红运》

武重奉是越南近现代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文风犀利,眼光独到,善于捕捉生活细节。《红运》是武重奉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其运用讽刺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小说情节丰富,极具矛盾与冲突,文字富有张力且充满画面感,无厘头的情节和对话充斥其间,将西化“潮流”冲击下的越南社会矛盾平铺于读者面前。

1912 年,武重奉出生于越南河内一个贫民家庭,7 个月时便丧父,家庭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身上。15 岁时,武重奉便因家庭困难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谋生,由于接受了法属殖民地时期的新式教育,所以武重奉能熟练地使用法语和国语字。武重奉先后在餐厅和印刷厂工作,随后转向新闻业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在同一时期,武重奉还与《日新》《午报》《海防周报》和《河内报》等报业合作。3 年后,他的第一篇报道《陷害人》发表在《日新报》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其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写作风格,人们开始关注武重奉这个名字。幽默、讽刺和现实主义成为了武重奉小说的代名词,凭借其文学天赋和一些报告文学的成功发表,武重奉在 20 多岁时便被称为“北圻报道文学之王”(Phan Cự Đệ, 2013: 418)。武重奉不仅是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还翻译了大量书籍。1936 年,武重奉迎来了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顶峰时期,这一年他发行了 4 部小说,分别是《暴风骤雨》《决堤》《红运》和《妓女》。

武重奉生活在脏乱不堪的河内银钱街(36 古街中的一条),越南河内古街因流量大,人员复杂,商贸往来频繁,一直被视为越南社会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从小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武重奉对越南底层民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触感和更直观的感受。武重奉的文学创造是亲民的、现实的、批判和讽刺的。作为河内底层生活的亲历者,武重奉在文学创作中不似其他作家那样以自上而下、从外向内的顺序来了解社会底层生活的全貌,而是以“局内人”的身份,将自身的切实体会加以幽默讽刺的文学手法展示于读者面前,将底层社会的“经络”与“血肉”和盘托出,将上层社会和潮流之下的“腥臭”与“腐朽”公之于众。

命运好似对可怜的人更加不公。和父亲一样,青年时期的武重奉便罹患肺病,

最终在贫苦和悲观中死去，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在短暂的 26 年人生中，武重奉创作了近 40 篇短篇小说、7 部戏剧和 9 部长篇小说，其中《红运》被认为是他最成功的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越南文坛，许多人评论说武重奉就像一颗璀璨的流星，闪耀在越南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舞台中央，但与他的人生一样，其文学生涯也同样一波三折。在越南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武重奉独特的讽刺手法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围绕其作品也引发了许多争论，一时间推崇者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反对者则声称其文学是淫秽的，低俗的（Lại Nguyên Ân, 1997: 23）。武重奉的文学之所以看起来“不登大雅之堂”，是因其塞满了太多社会生活中“假丑恶”。武重奉的文学是悲观的，是写实的，是对越南底层民众生活的现实性描摹，正因其反映的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所以才显得如此“真实”。尽管经历了质疑和批判，但武重奉的作品仍因其诙谐幽默的写作手法、针砭时弊地探求社会现实、极具讽刺性的文笔深受后世读者欢迎，因此武重奉也被称为“越南的巴尔扎克”。

在武重奉创作的众多文学作品之中，《红运》作为其长篇讽刺文学的代表作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2021 年，由北京大学夏露副教授翻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运》中文译本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红运》还被译为英语、捷克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红运》自 1936 年 10 月 7 日起在《河内报》第 40 期发表，1938 年首次印刷，并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现如今《红运》中的许多人物对话和谚语已经成为越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可见其在越南的影响力。但在 1975 年之前和 1975 年至 1986 年之间，由于政治原因，越南禁止发行《红运》以及武重奉的其他作品（Phan Cự Đệ, 2013: 419）。

《红运》虽然是虚构作品，但也发挥了作家擅长纪实文学的优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越南以河内为代表的都市西化图景（夏露，2017）。《红运》讲述了主人公红毛春，从一个被众人认为是卑微的没有前途的市井之徒，乘着越南欧化运动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上流名人”的故事。小说极具幽默和讽刺意味，人物的刻画也都各具特色，情节跌宕起伏，每一章节都以一个故事为主线，章节之间也相互呼应，且都生动再现了“体育”“欧化”“荒诞”“无厘头”等关键词。在笔者看来，《红运》的成功绝不是偶然，其“怪诞与荒谬”的文本刻画背后是对社会现实的无情嘲讽和无奈铺陈。出生于贫苦家庭，成长于社会底层的武重奉对当时越南社会的不公与黑暗看得更加真实，体会更加深刻。他深谙传统越南社会的风貌，但随着殖民统治和小资产阶级欧化运动的到来，越南传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 世纪初期的越南，随着殖民统治一起到来的除了先进的生产力，还有欧化物品、欧化服饰、体育和欧化观念等一系列物质与精神的“舶来品”。这一系列欧化的产物冲击着越南社会的肌理，“荼毒”着每一位越南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欧化的东西都是糟粕，欧化的产物中也有先进的生产力、先

进的和实用的物品，但为何《红运》所描写的欧化运动却如此的不堪和被人诟病？笔者认为，是因为这场欧化运动对越南这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带来的影响是弊大于利的，至少在那个时代的越南，欧化运动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红运》中，整个越南的欧化运动是被迫的，是由外力强行施加的社会化变革；其次，这次欧化运动是不受选择的全盘接受，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越南，各个阶层都被欧式精神和物品所吸引，以追求欧化为美，这就导致东西文化在 20 世纪初期的越南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加之被殖民统治的影响，从而造成越南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质疑和否定，人人以欧化为“美”。

武重奉笔下的“欧化”是丑恶的、鄙俗的。《红运》之中所塑造的红毛春是欧化的忠实追随者，是投机主义的最生动诠释。《红运》中“荒诞与无厘头”的背后是越南社会在东西方文化矛盾中激烈对抗的“产物”。在欧化的潮流中，各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是迷茫与不知所措，面对新式的文化和器物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选择。武重奉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强烈谴责越南城市小资产阶级社会荒谬堕落的欧化运动，极力批判当时打着“文明”“进步”和“社会改革”之名盛行的“欧洲化”“体育”“思想解放”运动，指出其实质是以盈利为目的和公然践踏一切传统道德的“丑恶”运动。但《红运》只专注于在道德和日常生活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其中所反映的越南社会问题是广而不深的。比如，在揭穿假装“受欢迎”的江湖骗子红毛春的同时，武重奉或多或少流露出对劳动群众的蔑视，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感召力和对社会问题谴责的深度（Nguyễn Huệ Chi, Trần Hữu Tá, 1984: 307）。

《红运》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其中描摹的小说情节再现了 20 世纪初期越南社会在殖民和封建双重统治之下的复杂现实与矛盾，引发了人们对西方潮流冲击下越南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笔者认为，《红运》所刻画的人物和情节，以及荒诞幽默和极具讽刺的行文，实质上是在构建一张网罗越南社会的“网”。每一个生活在越南土地上的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联结点。《红运》是编制这张网的“连线”，它连接了越南封建统治与法国殖民资本，同时也连接了越南底层群众和上层精英，催化剂就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欧化运动。但这张“网”是不牢固的，是残破不堪的，究其原因就在于每个联结点之间存在着感知层面的断裂和表述层面的冲突。简单说来，就是 20 世纪初期的越南社会及各阶层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鸿沟”。

2. “潮流”与传统的碰撞

20 世纪初期，越南已全面沦为殖民统治半封建社会，武重奉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亲历者。越南自古以来便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直至 1918 年，法殖民地政府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新政并于 1919 年取消了越南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推

行法文教育和欧洲文明，欧化运动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影响越南。法殖民统治和欧化运动所带来的潮流与越南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激烈碰撞，导致 20 世纪初期的越南社会充斥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欧化运动对越南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欧化运动对越南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越南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思想观念一直秉持内敛和保守的态度，在两性关系中，更是强调忠贞和纯洁。但 20 世纪初期，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越南社会受到了法国文化与欧化运动的影响，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助推下，社会各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由于殖民地政府所带来的欧式思潮和生活方式，使得越南民众在思想观念上所保持的儒家特性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越南的年轻人被欧化运动带来的所谓“积极、活跃、开放”所吸引，因此许多越南青年染上了一些所谓“欧化欢愉”的不良嗜好。越南青年在婚恋与两性关系中也愈发“自由与开放”。

在小说《红运》中，经常能够看到这些情景，例如红毛春的出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第一次“宣战”。

红毛春在跟一个卖甘蔗的姑娘坐着说悄悄话。他们是在谈生意？不，他们是在调情。

“老是嬉皮笑脸的，没个正经！”

“又装可怜？”

“这倒是真的。我要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可能被贴金描红供起来。”

红毛春和路边卖甘蔗的女主角眉来眼去，相识才没几次的寒暄就变成了“不一般”的熟络，这不禁让人质疑，是怎样的社会竟会如此的“开放”。之后，红毛春由于在网球场被人控告不法行为，被当场抓住并送往警局，但同时海关副关长夫人（第一任老公是一位法国海关副关长）也在场，红毛春的这一系列行为让副关长夫人意识到越南人不但愚蠢而且可怜，她对外甥说：

年轻人谁不会犯糊涂？放了他（红毛春）才对，把年轻人抓起来干嘛？

真是可怜，造孽！就这么狠心把人家赶走了。

副关长夫人的两任丈夫已先后离世，但她现在仍然保持着对逝去丈夫的忠贞，于是，她成为拯救红毛春的贵人，同时也将自己的“忠贞”献给了由市井之徒摇身成为“上流名人”的红毛春，这是多么的滑稽与讽刺。武重奉《红运》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极度渴望自由的婚恋关系，并对欧化潮流所带来的“自由思想”近乎上瘾般地痴迷，每个人物都从骨子里透露出与这个传统社会的格格不入。副关长夫人的孩子阿福，是一个极具讽刺意义的人物。副关长夫人请算命先生为阿福算命，算命先生说阿福是老天爷给的孩子，是佛子，注定有不一样的大造化。可笑

的是，武重奉笔下的阿福确实“与众不同”。

你们留心看看就知道了！他有时候喊着“不要”。

他鬼名堂多着呢！

特别是看他在奶妈背上，把奶妈当马骑，真是过分。

简直跟他妈一样，要我说可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一个小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武重奉笔下欧化潮流中的越南社会已经荒诞到了何等地步。这所谓的欧化“自由思想”就算到了今日，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可见欧化潮流对越南的茶毒之深。

2.2 欧化服饰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奥戴一直被视为是越南女性的国服，许多外国人对奥戴的印象大多是洁白、立体。但由于欧化运动的影响，商品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对越南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越南女性的衣着审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MARTINA THUCNHI NGUYEN, 2016: 98）。在《红运》中有一段关于红毛春在欧化时装店工作的记述和参加葬礼时的着装描写，通过这两段文本，我们能大致了解欧化运动影响下对越南日常社会的冲击。

红毛春被拉到一个模特面前。设计师说：“无袖和无领的衣服意味着‘青春’！”

“你必须熟悉设计师设计的各种款式”。从此欧化运动就靠你的聪明头脑了。

这里，这套是‘贞洁’，是为那些不准备再嫁的寡妇设计的，因此衣服包裹的比较严实端庄，衣领像张开的荷叶一样。

这是红毛春初次到访文明夫妇（欧化时装店老板）时装店时的经过，传统的越南奥戴是有袖有领的，但在欧化的裁缝看来，只有无袖无领才是青春，暴露才是纯真，这即使放在今天的越南社会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可见欧化运动的“大胆与新潮”是何等的“前卫”。再者，与此相对的是为不愿再嫁的妇女所设计的服装，因为她们不愿再嫁，要为死去的丈夫守住贞洁，所以她们的衣服是严实的、是端庄的，这似乎是欧化运动向传统社会习俗的回响，但实则呢？试问真正恪守贞洁的妇女谁又会踏进欧化时装店半步呢？

在鸿老太爷的葬礼上，阿雪穿着一身“纯真”套装。

那是一件很薄很透的奥黛。

她还戴了一顶很漂亮的丧帽。

因为感觉流言蜚语玷污了自己的名誉，她特意穿了这套“纯真”套装，想昭告天下，她绝对没有失去贞洁。

在庄严肃穆的丧礼上，这样的穿着被视为“纯真”和“庄重”，看来信奉“文明”欧化运动下的人民和社会，已真正病入膏肓了。

《红运》笔下的越南服饰、越南民众的思想观念以及商品化的越南女性，都将矛盾指向了这场标榜为“文明”的欧化运动。小说《红运》就是设定在这样写实而又复杂的背景下。《红运》描绘的时代“精神”是对充满彷徨与迷茫的社会价值的探索。20 世纪初期的越南社会，广大民众对时代变迁是有预感的，毕竟完全新颖的欧化模式与传统的儒家社会相较，在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虽说广大民众对时代变迁有敏锐嗅觉，但对那个时代的实用价值的认识却模糊不清。作品中，上流人物和欧化运动的信奉者有一个统一的标尺，那就是：“不时髦的就是老土，必须被淘汰”。对他们来说，在那种情况下流行的东西只能与法语和“文明”的欧化运动有关。

《红运》的魅力在于其幽默的形式和强烈的时代感，《红运》就好似那个特殊年代潮流与传统激烈碰撞的产物，突兀到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整个欧化运动宣扬“‘荒谬’的就是新的，不时髦的就是老土，老土需要被淘汰并相应地改造”。正如小说的主人公红毛春一般，小说中绝大多数人物本质上已经超出了现今金钱分类思维的框架，被分为好坏两类，而区分的标准则为是否“文明”，是否是欧化运动的忠实粉丝。在那个“文明”的时代，潮流与传统碰撞的畸形产物有许多，但简言之就是“品德好者不富，富者品德差”。

3. 讽刺中的人间世

武重奉是越南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擅长运用讽刺手法进行文学创作。讽刺与批判常常相伴而生，对于文学而言，批评的主题应该有价值，应该或多或少地包含人生经验的主要领域。讽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艺术，其中没有“超验”的东西，没有“遗忘人世与为人世遗忘”的东西。能够产生这种“物我皆忘”境界的人生经验，就以其内在的崇高，而处于讽刺的范围之外（阿瑟·波拉德，1992: 11）。因为从小生活在讽刺范围之内的社会圈层，所以武重奉对欧化运动的讽刺与批判才如此令人瞩目。讽刺贯穿了整部《红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小说人物刻画的“格格不入”

《红运》中的人物，乍一看总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武重奉将小说冠以《红运》之名，因为在传统的东方社会，“红”与“鸿”同音，红色代表着好运，红运就是鸿运。小说的主人公红毛春是一个传统的越南男性，却长着一头红发，显得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且十分突兀。红毛春也不负众望，顶着一头另类的红发，一步步从市井之徒成为达官显贵和整个国家与欧化运动的代言人。小说的一开始，红毛春是紧张与彷徨的。刚开始在欧化时装店工作时，他明白了自己在欧化运动中的地位就是一个跑腿的。一开始，对于“文明”的欧化运动，红毛春表现出传统越南人的一面：惊异、反对和无法理解。

在那见空荡荡的商店里，他来回踱步，口中一直反复念叨：“我什么也不是。”

“这是什么鬼东西！有裤子，根本没有上衣！这是什么东西？啊，是‘承诺’……”

红毛春很珍惜在欧化时装店工作的机会，此时他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刚接触“文明”社会的孩童，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但作为一个传统的越南人，他起初对这一切是排斥和否定的，他不认为这是“文明”，他也没想到自己今后会成为全国“文明”欧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此时的红毛春，只想赚钱生存并活下去。

在这场欧化运动中，红发春迅速成为越南人民关注的焦点和全国名人，这一切源于其成为了北圻（越南北部的旧称）的网球明星和全国欧化运动的领头羊。红毛春一改之前的羞涩、胆怯和彷徨，成为一个“自信”与傲慢的“达官显贵”。

红毛春在与暹罗网球选手的对决中，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荣誉，故意输掉了比赛。

这时，一位殖民地政府高官来到了鸿姥爷家。

“禀告两位先生，本官是总督大人的侍从官，应他之命到贵府通知两位，因为你们高贵的牺牲精神，输给了暹罗的冠军，因此政府特别奖励两位两枚五等北斗勋章！”

殖民地政府的公开授勋，使得红毛春更加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功臣，是欧化运动的领军人。红毛春自我认同的改变，是武重奉在小说中讽刺的主线，是当时荒诞的越南社会的缩影。

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还有红毛春的老丈人鸿老爷。鸿老爷虽然在小说中没有过多的描写，但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他经常重复的那句：“知道了，真烦，说个没完！”武重奉笔下的鸿老爷是典型的传统社会的代表，欧化运动带给他的冲击似乎没有其他人那么外显，但却是越南传统社会在欧化运动下的最真实写照。要说欧化运动给鸿老爷带来了什么物化的影响，那大概就是能使其飘飘欲仙的鸦片。小说中，鸿老爷如饥似渴地吸食着鸦片，享受着来自“文明”世界的精神养料，对欧化运动的其他表现则没那么上心，但真实如此吗？我看未必，鸿老爷在红毛春与自己女儿阿雪传出绯闻之后，不似传统儒家社会的大家长那样反对，反而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红毛春这样的“市井之徒”，因为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就是：“不论社会被什么文明运动所主导，在我心里利益和声望至上！”

《红运》就像一个喜剧舞台，无论是谁都变得荒谬可笑。传统社会的人物也以小丑的形式被拉上了舞台。鸿老爷、鸿老夫人、书生（阿雪的未婚夫），都是典型的例子。谈论旧文化的“死亡”是悲惨的，谈论新文化的过渡是先进、时髦的。虽然作者将角色的描写以滑稽、矛盾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反常个性，但并没

有引起读者的仇恨，而是激发了民众对这场“文明”运动的思考。

3.2 “文明”的越南社会与越南妇女

《红运》中对于妇女的刻画极尽笔墨，妇女成为“文明”运动的主战场，成为各种矛盾的导火索，也成为荒诞社会最生动的映射。

小说中的妇女以“欧化自由”为荣，以穿着欧化与思想欧化为幸。由于红毛春成为了社会名人，所以鸿老爷的女儿阿雪，作为欧化运动的忠实粉丝，不想再嫁给传统保守的未婚夫（通判大人的孙子）。她不断地接近红毛春，想引起红毛春的注意。他们相约在蓬莱饭店约会，在蓬莱饭店，他们遇到了黄昏女士，也就是通判大人的妻子。当时崇尚欧化的越南妇女，以“欧化自由与开放”为荣，这究竟是一个怎样“文明”的社会，才会以此为榜样？

再说到那位为两任丈夫守着忠贞的副关长夫人，在红毛春成为社会名流之后，她心甘情愿地与红毛春一起生活，因为现在的红毛春不再是市井之徒，而是欧化运动的领导者，是国家的大英雄，与他生活是一种荣耀。但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副关长夫人还想对外保持一个恪守妇道的形象，于是在红毛春获颁五星北斗勋章的同时，他将另一枚暹罗守节封赐勋章颁给了副关长夫人，以表彰她恪守妇道。

不仅妇女被这股欧化文明浪潮所影响，当时越南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这场“文明”所荼毒。当红毛春获得殖民政府的表彰时，社会各界都发来了祝贺，文中这样写道：

“我谨代表宾馆的各位老板来此祝贺”

“我们代表警界来此祝贺”

“贫僧以佛祖的名义到此施以福寿给……”

“我们擅自代表妇女姐妹……”

全社会都给红毛春发来贺电，足以证明这场“文明”的欧化运动的影响之大。

在这场“文明”运动之中，武重奉洞见的是欧化与传统在越南传统社会的各个角落展开的厮杀，在这场厮杀中，武重奉以幽默讽刺的方式，勾勒出一个“荒诞”的 20 世纪初期越南传统社会的“人间世”，在那个时代的人间世中，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与众不同。

4. 结语

《红运》是武重奉长篇小说的代表作，是 20 世纪初期处在复杂环境下的越南社会真实写照。在 20 世纪初越南社会发生巨变的语境下，武重奉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创造表演的“自由空间”。他的语言、观察、叙述、评论，将《红运》所要表达的意象推入高潮。武重奉的讽刺不是猛烈抨击、否认或根除这场“文明”运动。小说中，每个人物以及每件物品都以一种愚蠢、可笑

的形式暴露出来，这种讽刺始于作家对现代社会的看法，然而，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武重奉用写实的文字揭露，批评这场“文明”的运动，但也用幽默和浪漫的手法对那个时代的现实发出自我的哀叹。“我们”的社会真的需要这场运动吗？这场运动真的“文明”吗？可能也成为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时代反思了。

参考文献：

- [1] Eric T. Jennings.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Disease in Colonial Hanoi by Vu Trong PHUNG and Shaun Kingsley Malarney [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012. (1): 208-210.
- [2] Isabelle Tracol-Huynh. SPECIAL ISSUE: COMMODIFIED WOMEN'S BODIES IN VIETNAM AND BEYOND [J].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2012 (1): 10-51.
- [3] Lại Nguyên Ân. *Vũ Trọng Phụng-tài năng và sự thật*. [M]. Hà Nội: Nxb Văn học. 1997.
- [4] MARTINA THUCNHI NGUYEN. Wearing Modernity: Lemur Nguyễn Cát Tường, Fash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National Costume. [J].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2016(1): 76-128.
- [5] Nguyễn Huệ Chi. & Trần Hữu Tá. *Từ điển văn học tập II*. [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1984.
- [6] Phan Cự Đệ. *Văn Học Việt Nam (1900-1945)* [M]. Hà Nội: Nxb Giáo Dục Việt Nam. 2013.
- [7] 阿瑟·波拉德著. 论讽刺 [M]. 谢谦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11.
- [8] 夏露，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以武重奉及其小说《红运》为个案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142.

老挝革命爱情小说《夜宿深林》 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

杨雅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 占梯·伦沙万是老挝著名的革命文学作家, 1999 年凭借其短篇小说《夜宿深林》荣获东盟文学奖。该小说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 描述了老挝苗族青年亚哲与女主人公麦洁在执行革命任务的途中共同克服阻碍、消除隔阂而相爱的故事。占梯·伦沙万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时代性色彩。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分析《夜宿深林》, 将作品与作家的生平经历、时代背景相联系, 有利于剖析其创作意图、思想含义及所隐含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老挝文学; 占梯·伦沙万; 社会历史批评

A Study o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Lao Revolutionary Love Story *Staying Overnight in the Forest*

YANG Yazhu

Abstract: Chanthy Deuansavanh was a famous writer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Laos. In 1999, he won the ASEAN Literature Prize for his short story *Staying Overnight in the Forest*. From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the novel describes the story of a Hmong youth and the heroine overcoming obstacles and barriers together and falling in love on the way of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tasks. The works of Chanthy Deuansavanh usually contains a strong color of the period. It is helpful to analyze the creation intention, ideological meaning and hidden social significance by using the social historical criticism method and connecting the work with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 words: Lao literature; Chanthy Deuansavanh;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0. 引言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 主要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

作者简介: 杨雅竹,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东南亚文化研究。

用(王先霈、胡亚敏,2005:63)。本文从社会历史批评的一般评价尺度:真实性、倾向性、社会功能3个方面对《夜宿深林》进行解读,将小说文本同20世纪老挝的社会历史情况相结合,关注作家的生平轨迹、创作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以剖析占梯·伦沙万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所展现的深层的思想含义与社会意义。

1. 占梯·伦沙万与《夜宿深林》

占梯·伦沙万是老挝解放区文学^①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0年出生于老挝川圹省,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进行革命文学创作,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创作了长篇纪实小说《生活的道路》,该书于1970年首次印刷,后经6次重印,1975年在中国出版,2020年被译为英文出版。1999年凭借短篇小说《夜宿深林》荣获东盟文学奖,2007年斩获了湄公河文学奖。占梯·伦沙万不仅在个人文学创作方面硕果累累,还推动了老挝文化事业的发展。2002至2010年他担任老挝作家协会主席,期间组织创办过多种报刊,促进了老挝文学界的繁荣。他精通老、中、越、泰等多国语言,将不少中、越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老挝国内,推动了中老、越老之间的文化交流。

《夜宿深林》最早于1995年发表在老挝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文艺》上(陆蕴联,2011:184),1999年当选东盟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以客观的笔触讲述了一段动人的革命爱情故事。故事发生于1960年老挝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小说的女主角麦洁同志是一个年轻、漂亮、矜持的老挝传统女性,同时也是万象妇女协会的会长,万象省委派她与苗族青年亚哲一同执行革命任务,亚哲负责保卫任务。面对陌生的同志,麦洁最初对亚哲还有些许防备。但是,在前往根据地的路途中,他们翻越崎岖的山岭,淌过湍急的河水,躲避滂沱的暴雨,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亚哲总能化险为夷。他身上正直善良、沉着冷静的气质令麦洁逐渐放下了防备。亚哲不善言辞,却始终默默守护着麦洁的安全,一切都令麦洁感到安心。在一起面对深幽丛林的种种未知危险后,脉脉情愫在二人的心间渐渐晕染开来,但是由于内心的矜持与组织的规定,双方都默契地将这份感情深藏于心。直到1960年8月贡勒大尉发起军事政变,亚哲收到指令将奔赴战场进行支援。面对生死未知的战争,二人终于鼓起勇气互诉衷肠,将埋藏心底的爱意吐露。离别前,亚哲将自己的贴身小刀送给麦洁作为守护,而后他毅然奔赴战场,在战役中英勇牺牲。小说故事情节简单,艺术修辞较少,这是老挝解放区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占梯·伦沙万依然用自然流畅的语言和深沉的笔调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他刻画了一个正直善良、为革命牺牲个人爱情的苗族青年形象,二人之间纯洁高尚、超越生死的革命爱情令人动容。将这部作品置于作者个人经历以及老挝社会文化这一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阐释作品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

2. 真实性——现实语境下的人物与背景

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能否展示出社会生活画面，映射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基本条件之一。

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来看，作者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与其个人生平遭遇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往往会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与源泉，《夜宿深林》中的两个典型人物——麦洁和亚哲的形象塑造无不体现着作者自身经历之影。女主人公麦洁年轻漂亮、含蓄内敛，有文化、有能力，迎合了那个时代老挝社会对传统优秀女性的定义。作者对麦洁的形象及其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使人物性格鲜明，符合逻辑，从中传递出来的情感也是真挚感人的。而男主人公亚哲自幼丧失双亲，成为孤儿，后投身革命事业，与作者的坎坷经历不谋而合。占梯·伦沙万在5岁时父亲因革命行动被殖民者逮捕关押，母亲在逃亡的途中去世，他年仅13岁时就加入了革命斗争，接受党的教育，在党的洗礼下成长。由此观之，男主人公亚哲影射作者本人，与他的人生经历高度重合。

从时代背景的真实性来看，小说以老挝抗美救国斗争这一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这在老挝历史上是个重要而特殊的时间点。《夜宿深林》在开篇与结尾处明确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书中提到亚哲的父亲在1953年的川圹三角战役中牺牲。这一战役与现实相对照，1946年法国殖民者重返老挝，老挝就展开了抗法战争，一直到1954年《日内瓦条约》签订后，法国从老挝撤军，老挝得以独立。独立后老挝采取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但此后，为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扩散，美国开始入侵老挝，在老挝国内扶植了一批亲美势力。随着美国干涉的不断加剧和王国政府右派势力的加紧勾结，这时的老挝面临着和平和独立无法实现的危机，所以，和平、中立便成了当时老挝人民斗争的主要目标（申旭，2011：230）。

“1960年8月9日，第二伞兵营在发动军事政变后，麦哲和省保卫部队的同志一同奉命前往万象第500营驻扎，支援万象保卫战。”（ຈັນທິ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71）

小说最后麦哲所奔赴的这场战役，其原型正是由老挝中立主义者贡勒大尉为确保老挝的和平独立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作者所交代的时间、地点、状况都能与在老挝发生的历史事件一一对应，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它以真实的时代背景为依托，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加之细致的人物心理活动刻画，所带来的真实感十分强烈。

3. 倾向性——歌颂革命与呼吁民族平等

占梯·伦沙万的作品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赞扬革命的正义性是他作品的一道主旋律。在行路过程中，麦洁从最初小心翼翼地提防到渐渐被亚哲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品质所感化。麦洁觉得亚哲打破了她对苗族人的认知，而她将这一

切功归于革命的引领：

“说着，亚哲将枪上了膛并来回踱步张望着四周。麦洁回到了原处，但这回她并没有休息，她的视线悄悄停留在亚哲身上。原来革命能把人教育得如此之好，麦洁渐渐对眼前的这位军人产生了敬意，她觉得他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68）

这种对革命赞扬的倾向与伦沙万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由于参与革命行动被殖民者逮捕，此后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流浪到苗族村落，成为苗族地主的佣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一过程中，村落的苗族乡亲们给了他许多关心与帮助，但由于地主的百般折磨与压迫，他最终选择出逃。13岁时，他加入了老挝“伊沙拉”革命军队，从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他接受了革命前辈的教育，到越南留学，回国后又继续投身革命事业，多次参与地下行动（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07: 458），革命将他从封建压迫的牢笼和桎梏中拯救出来。他对革命与社会斗争有着真实而深刻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人生轨迹与革命的进程交织重叠在一起。因此，在小说中他不断强调着是党的教育将亚哲培养为一个正直善良、令人尊敬的人，对革命的赞颂，已成为他身上自觉肩负的一种使命。

除了歌颂革命的正义性以外，《夜宿深林》还展现出作者对民族平等的一种追求。小说的主题是革命与爱情，但占梯·伦沙万童年的遭遇以及当时老挝社会存在的民族矛盾却使他自觉地关注民族问题，尤其是关注苗族人民的生存境遇。小说在介绍亚哲的时候刻意强调了他的苗族身份，麦洁初见亚哲之时对他的提防之心一部分来源于对于陌生人的不信任，而一部分也源自于他的少数民族身份，作者在书中道出了当时老挝社会对苗族的刻板印象：

“常人都会认为，少数民族缺乏教育，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知道用手脚劳作。可实际上他们有着无数美好的品德，麦洁同情怜悯着亚哲并对自己最初行路时的过度提防与戒备感到愧疚，她对他态度强硬又不愿相信他的为人……透过摇曳的火光，麦哲看着他的脸庞安详地睡去……”（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69）

老挝的主体民族是佬族，由于历史原因，佬族在经济、政治方面相较其他少数民族更为优越的现象一直存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后，对老挝国内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剥削政策，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粗陋”“没文化”是麦洁对苗族人的最初印象，她的看法映射了当时的老挝社会对于苗族人的普遍看法。在之后的叙述中，作者力图打破这些片面的看法，麦洁被丛林中的动物惊醒，看到亚哲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她对亚哲的不良印象逐渐消解。在写到麦洁对亚哲有了态度上的转变后，作者又一次对亚哲的优秀经历进行了插叙，强化了苗族青年的正面形象：

“亚哲与麦洁在组织中各司其职，有着各自的任务。亚哲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做事踏实，在每月的总结会上，他常常被同事推举为先进分子。”（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67）

占梯·伦沙万尝试借助文学改变老挝社会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偏见，《夜宿深林》一文描写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革命爱情故事，主角的民族身份对情节发展并不会构成影响。但小说中仍多次强调亚哲的苗族身份，着重描述麦洁对亚哲态度的转变，并多次对其形象进行正面刻画，予以毫不吝啬地称赞，从文本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强烈渴望。作者清晰地意识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唯有内部团结才能够抵御外敌的压迫，因此他有意识地在小说情节中强化民族平等的思想。

4. 社会功能——革命爱情观与传统道德观的回溯

《夜宿深林》最初发表于1995年。20世纪80年代末，老挝实行革新开放后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外国投资开始涌入老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也带来了社会生活的转变，在首都万象，随处可见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90年代初期随着更多的现金在城市经济中流转，一种及时行乐主义的态度也开始扎根，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层出不穷（Grant Evans, 2016: 201）。在这种浮躁的社会风气之下，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对老挝传统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夜宿深林》中，主人公端庄、正直、善良、内敛的形象，矜持含蓄的情感表达，纯洁质朴的爱情，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与追求，是对老挝传统道德和革命精神的一种回溯，也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思，对于新时期老挝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革命让二人得以相识，是革命的信念将他们紧密相连。他们的爱情是纯洁质朴、含蓄真诚的，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山盟海誓。虽然在执行任务的途中，麦洁和亚哲就已经互相喜欢，但他们却没有言明，革命在他们心中是崇高而神圣的，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一丝不苟地遵守着组织的规定：

“在保家卫国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无论男女都是同志，彼此间相互信任，情同手足。若有哪对青年男女真心相爱，两人须将情况上报组织，递交个人情况说明与组建家庭申请，若组织同意，就能举行婚礼，反之，若两人未遵守组织的规定私自同居，不仅不能组建家庭，还会受到组织规定的惩罚。”（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67）

他们的爱情观深受革命道德的规训，首先是集体的任务，其次才是个人的感情，因而他们都选择将这份爱情深深埋藏心底，一直到亚哲奔赴战场的最后一刻，两人才终于互诉衷肠，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在分别的前一天，亚哲主动请求与麦洁见面，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亚哲如此忧郁，他垂下头轻声说道：“我就要离开你了，也不知还能不能

再见到你……”

亚哲的道别深深触动了麦洁，仿佛一根针扎进了心房。她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说着：“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我会一直等你，就在这，在万象见你。”

麦洁虽然这样说着，但内心却也隐隐担忧着亚哲的离去。那天是周末，他们有很多时间促膝长谈，畅谈他们想要的未来……（ຈັນທິ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2010: 171）

一面是深爱的人，一面是硝烟弥漫、生死难卜的战场，亚哲毅然决然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最终，他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两人终究只能生死相隔。他们之间从来都是安静而克制的，即使没有告白，也能对彼此心领神会。正是这种隐忍的爱意，如同一缕清风、一道薄雾，悠悠牵动着读者的心。就他们的价值观而言，家国利益总是置于个人私利之前，这种高尚纯洁的革命情感与当时老挝社会一些年轻人追求“金钱至上”的浮躁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作者对西方文化对老挝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的深刻反思。

老挝教育部将《夜宿深林》编入老挝中小学文学教材当中，可见其教育意义深受官方的肯定。小说不仅具有引导人们反对战争、赞扬革命的教化作用，还启发了人们对于爱情、幸福、高尚情操的追求。它不同于传统老挝革命小说简单地以服务政治宣传为目的，而是从崭新的角度去关注老挝抗美救国战争这段历史，反映了战争年代里老挝人民内心世界中的美好追寻。两人的爱情故事无奈因战争画下句点，深刻反映了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左右，作者将这种沉痛的事实展现出来，意在唤起人们对战争的批判与反思，同时也鼓励着老挝人民在严酷岁月和经历中发现尚存的余温与美好，以汲取战胜苦难的精神力量。

5. 结语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老挝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开始改变过去完全依赖越南及苏联的做法，采取务实主义，实行革新开放政策，社会意识形态也趋向宽松。文学创作不再是单纯的正面宣传，逐渐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开始关注人们的个人权利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尹湘玲，2011: 364）。占梯·伦沙万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揭露殖民者与地主阶级的残忍行径，体现老挝人民在殖民压迫之下所承受的沉重灾难。《夜宿深林》同样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进行叙述，但不同寻常的是除了对战争的批判，它还着眼于角色的内心世界，体现了被无情的战争所掩盖的美好与人性。它不仅代表着占梯·伦沙万创作风格的一种转向，也是老挝文学文艺性转向的一个缩影。

注释:

- ① 1954—1975 年期间, 老挝文学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分为两个政治区域的文学, 分别是以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为主流的王国政府控制区文学和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为主流的解放区文学。

参考文献:

- [1] 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ເສັ້ນທາງແຫ່ງຊີວິດ: ຊີວິດຈິງຂອງຜູ້ຂຽນ[M]. ນະຄອນຫຼວງວຽງຈັນ: ໂຮງພິມມັນທາຕູລາດ. 2007.
- [2] 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ໂຮມເລື່ອງສັ້ນຂອງ ຈັນທິ ເດືອນສະຫວັນ [M]. ສະມາຄົມນັກປະພັນລາວ. 2010.
- [3] Grant Evans.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老挝史 [M]. 郭继光, 刘刚, 王莹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 2016.
- [4] 陆蕴联. 2011. 老挝一代文豪占梯·德安沙万其人及其作品的特点 [A].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编. 亚非研究 第 5 辑 [C]. 北京: 时事出版社: (5): 176-193.
- [5] 申旭. 老挝史 [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
- [6] 王先需, 胡亚敏. 文学批评导引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 [7] 尹湘玲. 东南亚文学史概论 [M]. 西安: 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 2011.

翻译与技术的深度交融

——《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述评

宋 杰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一书汇集了翻译与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它阐明了当前和未来技术翻译的相关技术手段,审视了不同的使用者对翻译技术的使用现状,考察了翻译实践中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情况,探究了技术翻译的相关研究焦点和方法论,关注了技术翻译研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未来技术翻译在理论框架的建构、翻译方法的创新、翻译研究的开展等多个方面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翻译;技术

Deep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A Review of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SONG Jie

Abstract: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brings together the newest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It explains the technologies employed in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examines the adoption of technologies by different user groups, looks into the applications of technologies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different contexts, probes into the research foci and methodologies relevant to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and focuses on the overarching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book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Most importantly, it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in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updating translation methods, conduc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lation; technology

0. 引言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翻译活动一直在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上发

作者简介:宋 杰,男,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诗学和认知叙事学研究。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翻译与技术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翻译对技术的依赖性也愈发明显。自 1949 年美国科学家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提出机器翻译思想以来，学界对机器翻译的内涵、本质、翻译流程、翻译对象、技术功能等方面都作了相应的研究。进入新世纪后，计算机、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大数据的发展速度惊人。与此同时，翻译软件不断涌现，翻译工具不断更新，翻译产业蒸蒸日上，机器翻译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引人担忧。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突飞猛进的机器翻译技术对译者、翻译受众、翻译行业、翻译研究者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一书应运而生。该书由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奈子·奥哈根（Minako O'Hagan）博士主编，于 2020 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发行，除编者撰写的绪论外，共收录 31 篇研究性论文。该书汇集了全世界范围内众多专家关于翻译与技术的前沿性议题，是迄今为止有关技术翻译研究的第一部大规模专著，代表了技术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预示着技术翻译引领翻译潮流的时代趋势，标志着翻译学研究领域内技术转向的到来。

1. 主要内容

该书共 32 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三十二章根据不同的议题，被分为 5 个部分。绪论由该书的编者奥哈根撰写，回顾了机器翻译的历史与背景，交代了该书的编写目的和涉及的议题，并简要概括了每一部分的论述内容。

第一部分（第二至六章）阐明了便于理解翻译与技术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的通用技术。第二章对翻译标准变化发展的方式和原因进行了历时性的回顾，涉及翻译、语言和本地化产业各个部门的技术应用情况。第三章论述了翻译科技中可扩展标记语言的重要地位，展示了可扩展标记语言是如何确保翻译工具间的互用性和不同用户设置中未联机翻译工具的可移植性。第四章说明了专门化翻译中术语提取和管理的问题。该章作者指出，翻译机器自动的术语提取和术语管理会对翻译质量造成一定影响。第五章揭示了与建立平行文本相关的技术手段，如收集语料，对语料进行系统划分，对语料的组合方式进行排列以及管理语料。第六章调查了语音技术在翻译工作流程中的发展和使用。该章作者发现，语音技术在计算机辅助翻译场合中的使用受限，因为语音识别系统与语音重复模式下的再现字幕混为一体，从而导致识别的精确性大打折扣。

第二部分（第七至十一章）审视了翻译产业不同领域内使用者对翻译技术应用的现状，其中涵盖大型语言服务供应商、公共组织、自由译者、二语学习者和非专业的翻译从业者。第七章调查了大型语言服务供应商在建立翻译管理系统时对技术的使用情况，主要涉及过程管理与自动化、项目经营与管理、客户管理与贸易、翻译与质量管理。第八章从公共组织这一使用者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中专利合作条约翻译部门的技术应用现状，论述了翻译记忆和术语管理系统如何为专利合作条约翻译部门所使用。第九章的作者基于自身译者和编辑的工作经历，以新西兰中小型企业翻译服务供应商为例，阐释了这些翻译服务供应商如何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同时，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翻译效率。第十章探究了自由译者最初未充分利用技术进行翻译的原因。调查发现，自由译者在最初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网上翻译者论坛，与志同道合者互相切磋，而非刻意寻求翻译客户。第十一章从二语学习者和非专业翻译从业者的视角展开论述，聚焦二语习得过程中技术发挥的重要作用，探索了翻译技术与语言教学中翻译的关系。

第三部分（第十二至十九章）考察了技术在翻译实践中运用的具体情况。第十二章解构了技术翻译、本地化翻译与技术间的关系，强调了本地化翻译实践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第十三章聚焦技术与游戏本地化间的关系，讨论了电子游戏的翻译本地化问题。该章作者关注到游戏硬件和软件的技术性特征，认为只读存储器被非法入侵是游戏本地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入侵行为未经游戏玩家对游戏只读存储器的授权和修改，包括对游戏初始语言的修改。第十四章审视了“非专业翻译”这一现象，探索了其科技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强调非专业翻译与数字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第十五章反思了科技导致视听翻译领域产生的诸多变化。该章作者研究了视听翻译中翻译记忆与机器翻译的应用情况，认为现代化翻译工具和平台的使用加剧了翻译产业供应商间的竞争，并危及专业翻译工作者的职业前景。第十六章关注到技术与口译之间的关系，阐释了“远程口译”需求不断增加的原因。该章作者指出，随着对神经网络的深入研究，机器口译的准确性会得到提高。第十七章关注了技术对手语口译的推动作用。视频转播服务和视频远程口译是目前用于翻译聋哑人手语的主要方式，但该章作者指出，二者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现有技术的使用和挖掘，它们应加快对技术的开发，以完成手语口译中高度复杂的认知任务。第十八章探讨了翻译技术在灾难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该章作者说明了技术翻译能让灾难风险管理不再停留于“反应”阶段，从而涵盖灾前的“减轻”和“准备”阶段以及灾后的“反应”和“恢复”阶段。第十九章调查了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翻译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情况。该章作者指出，译后编辑由最初的“人类辅助机器翻译”模式逐渐转变为“机器辅助人类翻译”模式，体现了翻译过程中“以机器为中心”向“以人为本”取向的过渡。

第四部分（第二十至二十四章）讨论了研究翻译与技术关系时涉及的议题和研究方法。第二十章研究了翻译技术评估，着重探讨了在当代普遍利用技术进行翻译的趋势下，如何凸显翻译技术评估的重要地位。第二十一章对基于工作场所环境下的翻译研究展开调查。该章作者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从教室或实验室移至真实生活中的工作场所，能帮助翻译研究者获取译者的真实翻译语料，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生态效度。第二十二章从作为人机互动的专业翻译的视角探讨了翻

译技术研究的现状。通过实证研究，该章作者指出，看似细微的用户界面设计问题，例如字体的大小、快捷方式的缺失、复制 - 粘贴功能等，都会影响人机互动的效率。第二十三章探讨了翻译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重要研究问题和方法论，认为应在概念建构和实证研究这两个层面对“翻译的社会学”进行研究。第二十四章介绍了眼动追踪技术在翻译研究上的应用，并指出眼动追踪软件能追踪翻译加工的精细度以及译者与翻译技术的相互作用方式。

第五部分（第二十五至三十一章）从机器翻译、翻译质量、符合目标的翻译、可达性、翻译数据的再使用、译者培训、翻译生态学这 7 个方面探讨了技术应用于翻译时出现的问题。第二十五章分析了韦弗提出的机器翻译思想，认为这一思想对之后机器翻译范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章作者指出，无论机器翻译范式如何模仿人工智能，都无法精确预测人类大脑中的“黑匣子”是如何运转的。第二十六章将翻译质量视为翻译与目标文本、比较文本、翻译目标、产业标准和译者的关系。在讨论翻译质量与上述不同因素间的关系时，该章作者指出，人为因素决定了翻译质量，因为翻译质量的衡量取决于人类的价值观，而人类的价值观本身又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第二十七章通过“符合目标的翻译”这一话题，探索了翻译质量具有不确定性的本质原因。该章作者认为，翻译要在项目管理中的“三重约束”（品质、价格和时间）中寻求平衡，虽然翻译服务于多种目的，但译者的职责就是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使译出的目标文本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既定的需求。第二十八章讨论了翻译的知识产权和将翻译作为数据进行二次使用的问题。该章作者指出，翻译知识产权的维护完全倚靠译者自身的道德伦理观念。第二十九章讨论了翻译研究中的媒体可达性问题。该章追溯了媒体可达性的发展历程，发现在翻译实践与技术、翻译研究与技术的互动中，技术对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开展有很大影响。第三十章讨论了技术化进程来临时译者培训的相关问题。该章作者认为，对技术的运用并不是译者唯一重要的技能，通过技术促进译者公民批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也至关重要。第三十一章从生态的视角审视了翻译与技术的最新议题，并基于生态翻译的思维提出了新的翻译研究方法。该章节的论断与翻译生态学的理念一致，其中包含的“后人类”理念有助于理解人类与数字技术间日益紧密的关系。

2. 简要评价

2.1 学术特色

第一，该书研究主题涵盖面广，研究对象与以往不同，研究方法科学多样。首先，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该书收录的论文被分成 5 个部分，但每一部分、每一篇论文始终围绕翻译与技术的关系展开论述，呈现了多种关于技术翻译的研究成果。所有论文的研究主题没有重合，展现了技术翻译研究领域之广，暗示了该

领域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次，在研究对象上，该书体现了较强的时代性和新颖性，不仅选取字幕翻译、听障者手势翻译、游戏本地化等作为具体的研究语料，也关注职业译者、自由译者、语言服务供应商等翻译群体的翻译实践。最后，研究方法是创新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多样性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信效度。总体而言，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是大部分论文一以贯之的研究法则。纵观全书，具体的研究方法既包括语料库法、眼动追踪法、问卷调查法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也积极汲取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第二，该书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前瞻性。首先，论文的 authors 大部分为专门从事技术翻译研究的学者，其中不乏该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权威性不容置疑。例如，第十六章的作者赛宾·布劳恩（Sabine Braun）、第二十七章的作者琳恩·鲍克（Lynne Bowker）、第三十一章的作者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等，都对技术翻译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都是该领域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其次，另有少数几位目前是或曾是资深的译者或翻译技术顾问，他们基于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实战经验，以专业的眼光审视了当前的技术翻译现状，清晰地指出了技术翻译行业存在的问题，为技术翻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专业性的指导意见。例如，第八章的第一作者科尔姆·卡弗里（Colm Caffrey）目前从事翻译专利文件的工作，第九章的作者帕特里克·金（Patrick King）曾在政府部门做过翻译人员，第十章的作者约斯特·泽茨基（Jost Zetzsche）则是一名翻译技术顾问，他们对该书的贡献在于以翻译从业者的专业视角出发，拓宽了技术翻译研究的范围，并对技术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高校或翻译机构，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涉及亚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这充分显示了技术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话题，受到翻译研究界极高的关注。从这点上说，该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研究趋势，具有较高的学术前瞻性。具体到书中的研究议题上，部分章节对某些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相关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前瞻性。例如，当生态问题已引起全世界的重视，生态意识已逐步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践行着“生态翻译”的理念。作为对“翻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克罗宁于第三十一章中，在全球气候危机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思考了“生态翻译”的重要性及其未来的发展，可谓非常及时地响应了翻译界内的热点议题。全球性的生态意识与绿色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学术发展的方向（胡庚申等，2020: 46），如此看来，克罗宁的这篇论文前瞻性地指出了翻译研究，尤其是技术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后续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好的启示性。

第三，该书编排合理、脉络清晰、深入浅出。编排上，从绪论到主体部分再到索引，甚至是参考文献，该书向读者呈现了技术翻译研究的完整面貌，编排得

缜密有序，有利于读者深刻把握该书的思想。在本书的开头部分，编者还对各章作者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包括他们的职业、任职单位、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们的学术思想，进而更好地理解每一章的内容。脉络上，该书虽然内容丰富，涉及到诸多学科领域内的专业概念，出现较多的专业术语，纷繁庞杂的信息似乎会给读者一种凌乱无序的印象，但是，论文的作者们始终围绕“翻译与技术的结合”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索，使得该书的各部分、各章之间具有很强的衔接性、连贯性和逻辑性，整本书的脉络缜密有序、清晰透彻。除编排和脉络上的可圈可点，该书的阐述方式深入浅出，语言措辞通俗易懂，满足了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求。即便书中存在较多关键的专业术语，作者们都提供了详尽的定义和阐释，尽可能地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让读者了然于胸。例如，在第三章探讨技术翻译中可扩展标记语言的重要作用时，作者一开始就对可扩展标记语言进行了详细介绍，帮助对这一专业术语较为陌生的读者快速地了解。可以说，该书在重视学术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可读性。

2.2 学术价值

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其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启发翻译研究走跨学科发展道路。相关学者（Duarte, et al., 2006; Gambier & van Doorslaer, 2016）对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作过一定的探讨，认为单一学科无法深刻揭示翻译背后的深层机制，只有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系统、全面、综合地解决复杂多元的翻译问题。该书显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技术翻译在本质上具有多维复杂属性，其研究的理论视角丰富新颖，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范式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跨越了所属学科的界限。该书的问世再一次说明翻译研究者应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概念、分析法和研究模式，整合多学科资源，深化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路径，系统地解决复杂的翻译问题。

另一方面，该书对反思国内的翻译研究及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蓝红军和许钧（2018: 4）指出，国内译学话语体系存在着“传统话语相对‘失语’、理论话语‘西化’严重、原创话语建构意识不强等问题”。该书的作者们来自的地域分布广泛，但却未见中国学者的身影，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技术翻译研究在国内虽已引起较高的关注度，但在一定程度上未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并驾齐驱。因此，国内翻译学界应在坚持自我的研究立场之上，开拓国际视野，加快翻译研究的国际化，以服务于建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话语体系的工程，提升中国译学话语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2.3 不足之处

诚然，该书也有些许不足之处。首先，部分章节的归属略有欠缺。比如该书第三部分研究的是技术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第十二章“技术、技术翻译与本地化”被纳入其中，但该章主要论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不符合这一部分的

研究主题。又如，将研究焦点和方法论一齐并入第四部分中，导致研究主题的冗杂，编者应将该章的论文按照以上两类情况进行分类，开辟出两个部分进行论述。其次，第二十二章探究了翻译过程中的人机互动，但并未从认知层面揭示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已得到学界的一定关注（Ehrensberger-Dow et al., 2015; Schwieter & Ferreira, 2017），主要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决策过程、情绪的影响，译者对规范的态度、译者的性格等，但是该章仅从翻译中人机互动的研究历史、方法论和涌现的问题这3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未对翻译认知过程涉及的诸多要素进行研究。最后，第三十和三十一章都蕴含着对翻译伦理的思考，但未能详加讨论。如编者所言，该书对翻译与技术间关系的讨论，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即“在技术化时代中，成为一个人、一个译者意味着什么”（O'Hagan, 2020: 17）。若该书能涉及对技术化时代中翻译伦理的研究，对机器翻译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哲学性反思，那么，该书一定会具有更高的思辨性。

3. 结语

《劳特利奇翻译与技术手册》一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为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指导。作为一部研究翻译与技术间关系的探索之作，该书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朝着更为多元化和前沿性的道路发展，是这一研究领域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内的技术翻译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也会更积极地投身于研究技术翻译的浪潮中。

参考文献：

- [1] Duarte, J. F., A. A. Rosa & T. Seruya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t the Interface of Disciplines*[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2] Ehrensberger-Dow, M., B. E. Dimitrova, S. Hubscher-Davidson & U (eds.). *Norberg. Describ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cts and Events*[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 [3] Gambier, Y. & L. van Doorslaer (eds.). *Border Cross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 Disciplines*[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4] O'Hagan, M.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disruptive entanglement of human and machine [A]/M. O'Hag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1-18.
- [5] Schwieter, J. W. & A. Ferreira (eds.). *Th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7.
- [6] 胡庚申, 罗迪江, 李素文. 适应“绿色发展”选择“绿色翻译”——兼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应翻译专业设置[J]. 上海翻译, 2020(4): 46-51, 95.
- [7] 蓝红军, 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译学话语体系建设[J]. 中国外语, 2018(6): 4-9, 15.